

目錄

11 月 28 日學術工作坊

- 文本的空間化與運用
林農堯 項潔.....4
- 現代廣告圖形發生論：《中國商業廣告數據庫》（1840-1940）
陳靜.....7
- 「華人文化數位人文平台」發展與應用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Chinese Cultur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
陳志銘.....16
- 中國古代詩歌自動斷詞、文本標記及其應用
羅珮瑄.....41
- 概念和社會：以「台灣傳記知識本體庫」試定群體結構
**Concepts and Society: Defining Social Groups with Taiwan
Biographical Ontology**
Táňa Dluhošová (路丹妮).....49
- 道的失能：數位人文視野下 中國近代「天道」概念變遷研究
邱偉雲.....52
- 《近代報刊語料庫的建置、運用與韓國數位人文的方向》
宋寅在.....96

目錄

11月29日學術工作坊

-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Italian Translations of *Mengzi* 孟子**
Casalin Federica (費琳)102
- **跨文化流動與主體認同——蔡守「擬西方」博物圖畫研究**
鄭文惠.....119
- **冷戰前期星馬華文禁書與華人文化建構/結構**
莊華興.....130
- **流動中的「根著」：戰後至二千年代的香港文學**
陳智德.....140
- **「福建」作為臺灣文學發展與研究的生產空間及其意涵**
黃美娥.....146
- **中國早期紀錄片《上海戰爭》與《中國電影發展史》
的建構與拆解**
陳建華.....153
- **主體流動與身分認同——當代華人女作家紀錄片探析**
黃儀冠.....158
- **邊緣 / 弱勢女性之情慾主體的影像建構
——以台灣近年幾部紀錄片為例**
郭力昕.....166
- **想象的自我/他者：民國上海電影文化中的南洋敘事**
黃雪蕾.....173
- **《軌道》的台灣想像與台灣人身份認同**
陳儒修.....180
- **國家身份的建構與解構：《花為媒》與《四季花開》的改編研究**
林文淇.....186

11月28日

國際學術工作坊

文本的空間化與運用

林農堯 項潔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系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中心

在人文研究中，閱讀大量的研究素材，藉各種方式記錄、構思、分析及觀察研究議題，是必經的過程。而發掘、確認、分析和觀察蘊含在文本中的空間資訊，則是發現文本脈絡及觀察探索 議題的重要部分。爲了表達空間資訊，需要在文本中標注地名、坐標，然後將地名畫在地圖 上。對於絕大部分的人文學者來說，這類的文本空間資訊的整理不是容易的工作，而把標注好 的文本對應到地圖上更是無從下手。所以一般來說，文本空間資訊的整理,須要人文學者與 GIS 專家的合作才能達成。這對於人文學者來說，不免造成無法獨立作業的挫折和困擾。

臺大數位文人中心在過去三年發展了一個 DocuSky 平臺，它的目的就是希望提供一個足夠親和與有彈性的數位環境讓人文學者能夠獨立處理自己的文本資料，整理、標記、檢索、分析不假手他人。而在這個環境中，能夠有效的處理空間資訊顯然是重要的一環。

在這個報告裏，我們專注在 DocuSky 中空間資訊的部分，在數位人文理論架構下提出一套文本空間化的處理流程：TEMDA (Text-Mapping Display and Analysis)。在標記上 TEMDA 可以結合簡單的 excel 表單或透過 MARKUS 標注

出來的文本，經過簡單的轉換即可以在 DocuGIS (DocuSky 中的 GIS 模組) 上做呈現。DocuSky 和現有的 GIS 軟體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允許使用者透過全文 檢索與地圖互動，所以地圖不再是一個靜態的、只能觀察的坐標群，而是可以及時去探索、過濾、分析的有機體。TEMDA 也提供與 DocuSky 中建庫功能的結合，讓使用者可以在全文資料 庫中對每一個地點提供地理的呈現。

我們會用幾個例子說明 TEMDA 如何運用。希望透過本研究的創建,提供一個解決人文研究中文 本空間呈現問題的可能途徑,加上地理文本檢索可以在空間脈絡上探索問題、找尋可能的研究 方向,同時使用時空整合文本外的重要資源,以提供一個完整的人文研究鳥瞰研究平台。

關鍵字:文本地理訊息系統、時空脈絡、地理文本全文搜尋

現代廣告圖形發生論：《中國商業廣告數據庫》（1840-1940）¹

陳靜

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副教授

背景

19世紀末中國的商業中心，或者說「通商口岸」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全球性的廣告行業，發展出了一種用成熟的口號、精緻的卡通繪畫、創新的字體和句法來銷售機械製造的、品牌化的、可商業交易的大小的商品。廣告成為了現代主義商業文化中流通那些吸引人的商品的有力工具。而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黑白報紙廣告是「日常生活中微小而短暫的文檔」，是「蜉蝣」，我們將之視為圖像發生論 (Graphesis)。這些廣告或「圖像」沈默地傳遞了諸如「現代事物是乾淨的」或「人是哺乳動物」這樣的價值論觀點 (Drucker)。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社會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商業蜉蝣是現代化的、有價值的。白露則認為廣告是由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組成的現代學科秩序的一部分。對普通廣告的支持促成了一個致力於買賣廣告位置的整體商業業態的出現。

我們傾時傾力於中國商業廣告數據庫 (Chinese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Archive) 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黑白繪制的廣告時間跨度長達

¹ 此次发表部分节选自《从图像到知识——民国广告中的知识生产》(Tani Barlow, Jing Chen & Ke Deng)，原文为英文，中文由龚雨、邹羨冰翻译，陈静、邓柯校对。

60 餘年。成熟的廣告於 1919 年首次亮相。當日本宣佈對中國進行全面戰爭後，出版社搬到了內陸，廣告業陷入了中斷。因此我們可以為中國現代廣告劃分時期；他們是有一個時間開端和結束。第二，存檔的廣告清楚地展示了現代中國人富有想象力的經驗。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傳統歷史證據，如地圖、文獻、文學和社會科學，廣告幫助歷史學家解決商品-人在某一特定時刻的關係問題。經由新穎商業文化過濾後的新都市文化生活不同程度地改變了人們，創造性地改造了他們生活的方式。廣告檔案庫可以形象地展示出現代公民是如何享受新商品-對象世界。雖然這些精細複雜的廣告圖像元素並不是真實人物的鏡像，但它們展示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在這裡現代商品、藥品、社會活動（開車、跳舞、清潔或縫紉、施肥）是程式化的。此外，在向石版印刷轉變的過程中出現的黑白廣告圖像是前所未有的。廣告結合了來自《點石齋畫報》、「共和」圖像和現代藝術的繪畫元素。直到 19 世紀末，中國商業廣告才得以如期所願地傳播圖像、以向廣大消費群體銷售機器生產的現代商品。利用我們的廣告數據庫來發掘的不僅僅是 20 世紀 20、30 年代媒體空間如何在社會學上被量化、買賣的，還可以發掘類似 Morishita Hiroshi、C.P.Ling 和 Carl Crow 這些出色的經理人是如何創造性地開創了複雜的廣告運動，而這些廣告在教育學、語言學上是完全創新的，在哲學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簡介

CCAA 旨在通過為傳統學者提供數據來回應和解決學者個體亦或是通過集體合作也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當廣告聚集到一定數量的時候，單個廣告中的

信息聯繫起來，構成了一個信息網絡。因此我們不是總結共性而是選擇傳統存檔材料中所蘊含的信息，比如圖像描述、文本轉錄、有跡可循的地理地址和街道名稱、商品的商業信息等，同時將系統的元數據規範化，將信息轉換成結構化數據，並創建了一個數據庫，使得數據可以計算、比較、關聯，並概括來回應新問題。比如，瞭解一個產品廣告商賣出了多少圖像，知道廣告商購買了多少平方釐米的版面來展示新廣告，發現 1933 年的大眾媒體上版面價格比；所有這些問題試圖為新興的流行商品文化建立商業紐帶。反過來，這意味著我們可以發現規範是如何伴隨著圖釋、圖像和修辭上的某些變化而變化的。例如，即使是小數據也已經為關於廣告策略的觀點提供了足夠支持。那麼（這些數據）又能怎麼樣？這些數據揭示了營銷的背後有著明確的意圖，專門選擇在特定的日期、發佈在特定媒體，從而描述了一種新的合理性。廣告是一種創作風格，但從來不是任意而為的，因為其目的是為了尋求利潤。這一情況使得我們能夠追尋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隱含動機。雖然「資本主義」是最廣泛意義上的全面變革，但它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神的行為。個人、團體、公司、行業主觀決定投資、生產和銷售特定商品。他們積極啟動新的營銷和分銷系統。這裡就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假設，那就是工業化的生產和品牌化的商品不僅改變了視覺景觀也改變了消費者對他們自身、日常生活以及自我能力的認知。

這個數據庫不僅使得進入資本主義機製成為可能，而且其處理數據與傳統圖書館收藏圖書也不同。第一，數據庫中的數據是有限的。CCAA 只專注於外國的、跨國的國際公司的廣告，例如通用電氣和仁丹。我們排除民族品牌有以下兩個原

因。首先，元數據化和數字化所有商業廣告成本高昂且難度很大。其次，民族品牌和國際品牌的相對銷售能力是未知數；學者至今還沒有確定「民族品牌」與「跨國品牌」有什麼關係。Sherman Cochran、Howard Cox、Karl Gerth、William Kirby 和 Madeleine Zelin 這些傳統歷史學家已經有了一個共識。但他們對於國產品牌和跨國品牌之間的分別有不同理解。二，因為書寫商業或資本主義的歷史是十分困難的，所以我們構建了 CCAA 來幫助學者間接或直接地解決問題。比如，我們看到了 1935 年出現了一個相對轉變——化妝品和保健品的廣告多於藥用補藥的廣告——我們就可以聚焦於特定的企業歷史。為什麼是卜內門公司買廣告版面？是否在生產、新產品線、分銷網絡、國民政府採購上也有相對增長？廣告宣傳是否帶來更多利潤？這裡並沒有提供明確答案，且數據本身沒有證明這裡的任何假設是正確的。但是，我們的確知道廣告信息有助於業務操作人員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制定更能理解的、策略性的、有目的性的決定。第三，廣告是一種特殊的類型，因為它一切為了利潤。雖然廣告具有教育意義，並且文化意義豐富，但它不像一首詩或一個小故事，廣告銷售的是產品或服務。最後，CCAA 幫助學者弄清楚廣告商是如何受益於新聞產業的。大多數中國新聞媒體都由外國人創辦，John Major（《申報》和《大公報》（L'Impartial）），中島真雄《盛京時報》等外國新聞媒體在主要市場買賣廣告位置。他們不是慈善家，而是謀利者和投資者。CCAA 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新聞產業的商業終端是如何運作的。

元數據與檔案化如何存檔廣告圖像？這不僅涉及到下面討論到的工作流程的技術和實踐，還涉及到數字化、標注和可視化。它直接涉及核心理論問題，即信

息的可見性。視覺化信息是基礎性的。這正是列夫·馬諾維奇 (Lev Manovich) 教授在他的作品《元數據·我的摯愛》中詳細闡述「元數據」的概念時遇到的問題。馬諾維奇提出，「圖像元數據化」將學者們「研究」或「處理」圖像的老方法轉變為新方法。根據馬諾維奇的新方法：「圖像元數據化」包括 1) 發明圖像描述和分類的新系統; 2) 創建圖像收藏的新界面，使用戶可以利用和解釋數據; 3) 以「超人」的視覺尺度提供新的圖像。馬諾維奇給人類主體和更多的可視性圖像的命名重新調整了視覺圖像與創作者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學者如何處理大規模意想不到的視覺現實的方式。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電腦是如何幫助我們分類並呈現出圖像的，即廣告圖像產生的意義？在這場過程中，建立元數據是至關重要的，正如許多關於建立視覺圖像的成功項目。

馬列維奇的「元數據」理論從兩個方面為 CCAA 開啓了可能性。首先，在這種情況下元數據化強調的是元數據和客觀圖像之間的關係。這些真實或客觀存在的圖像是基礎。他們的共同作用構成了一個提取信息的過程。圖像不再只是圖書館學意義上的「檔案庫」，或僅僅是圖書館學稱為「標注」的目標。此外，不管是名詞還是動詞詞性的檔案/存檔，都與傳統的存檔方法相連，包括以這些原始的、真實的材料為基礎來分類的方法都應該被保留下來。但當提到蜉蝣時，這一系列關於原創性和價值的關聯就不起作用了。作為大量複製和短暫消費品的廣告蜉蝣，其對於學術研究的價值並不源於其存在形式（報紙）的原真性，亦或是其獨一無二的、版本學上的收藏意義，而是其內容所蘊涵的信息以及這些信息與語境（context）的關係。因此 CCAA 強調的是通過對元數據規範的設計和定義，來

從圖像中提取可以使用於學術研究的信息。其次，從概念上講，元數據化更多是關於圖像和界面圖像，這將涉及人與機器之間的相互作用。從數字人文學的角度來看，這個概念連接了數字項目的不同層次結構，從數據庫到界面，然後到用戶反應。元數據化是 CCAA 的重要部分。作為一個圖像對象和研究型在線檔案庫，CCAA 記錄了盡可能多的相關信息例如廣告插圖、品牌標識、文本、以及街道名稱和商號等地理信息。通過對具有規範性、普遍性、一致性的元數據規範進行測試，我們得以能夠將基於 Dublin Core 規範的自定義的元數據模式應用到每一張廣告數字圖像中。這些元數據包括圖像內容的描述性數據、商品的語境數據、報紙的目錄數據、數字文件的技術數據、版權狀況和所屬機構。

描述性元數據主要描述了圖像的文本和圖像內容，包括標題、關鍵字、文本內容和對整個圖像的描述。這可以幫助正在尋求一些基本視覺和文本數據/信息的研究人員能夠接觸到檔案庫並且可以在他們點擊下載圖像之前快速有效率地搜索整個檔案庫。同時因為我們將視覺圖標轉換為文本並轉錄了每個圖像中包含的所有文字文本，這些文本使得圖像可用於文本挖掘和新類型的分析。

我們認為這些圖像既是視覺的又是文化產品，既是經濟的又是社會商品。廣告中每種商品的社會和經濟信息被編碼為以下類別：品牌/名稱、商品類別、公司、代理、公司和代理的地址。其中一些是從圖像的內容中提取出來的，但有些來自外部資源。例如，商品的品牌/名稱總是很容易識別，但公司或代理卻不容易。我們使用碼本來解決這個問題並確保數據一致。但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我們不能僅僅遵循碼本，因為信息在不同的幾十年和不同的報紙上會隨著時間改變。

商品和廣告業的文本信息數據產生以及傳播圖像，並提供關於這些廣告的核心信息。報紙的書目數據涵蓋所有出版信息，包括「卷號」、「發行號」、「發行範圍」、「頁碼」，「出版商」、「發行日期」、「印刷廠」和「編輯」。這些數據提供了背景信息，幫助研究人員找到源報紙和進行相關信息的統計分析，比如統計某特定廣告在一年或多年內在一家或多家報紙上發佈的頻率。「技術數據」則描述了數字化和存檔的技術參數。

CCAA 正在嘗試使用機器識別所有視覺信息的自動識別模式。從技術上來說，雖然我們希望能最終將實現這個功能，但這個功能目前還無法被普遍使用。為了彌補這一點，我們還是使用了更傳統的方法，即用一個或幾個標籤（稱為「主題詞」）對圖像內容進行說明。換句話說，我們使用人的自然語言作為元語言來描述圖像。例如，主題詞中包括 1) 「人/物」包括動物、植物、人及其子類別，如女性/男性，老年/青年/中年人，外國人/中國人，兒童/嬰兒; 2) 文本/圖像，這裡指的是「設計風格」，使我們可以將包裝插圖、語境插圖和文本進行分類; 3) 在我們稱為語境信息的類別下，則包括公司的國籍和地理位置（比如總部設在美國特拉華州，在上海生產，分布在江南地區等）。所有元數據項和關鍵詞還支持檢索功能。

這意味著 CCAA 用戶可以輕鬆訪問完整信息以及抓取廣告中設計視覺元素的線索。他們可以直接搜索「女孩」或無中國人出現的圖像。因為大尺寸圖像文件很大，有些用戶會由於他們的互聯網速度和操作環境的不足而使得訪問受限。描述類別充分地幫助這些用戶實現有針對性的訪問來滿足需求。這是我們開發未來

圖像注釋軟件的第一個必要步驟。我們的立場是圖像和語境信息之間的關係與內容描述一樣重要，因此我們將開發擴展概念網絡的方法把 CCAA 和圖像世界外的範圍連接起來。

最終，CCAA 將存檔在中國五大報紙——上海《申報》、《大公報》、瀋陽《盛京時報》、漢口《漢口中西報》、廣州《越華報》上發行的，超過 201438 張高質量（> 300 dpi）國際品牌廣告數字圖像，以及每個圖像的研究元數據。

目前，我們已數字化並標注完成了從三份報紙中選出的大約 69061 個廣告圖像，其中 15950 張來自《漢口中西報》（1906 - 1937 年），4414 張來自《越華報》（1929-1938 年），53530 張來自《盛京時報》（1906-1938 年）。大公報的 67544 條數據正在進行校對核查。具有元數據的所有圖像將逐漸用於兩個網站：由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Fondren 圖書館（Fondren Library）托管和維護的網站（scholarship.rice.edu）和由魯斯基金（Luce Foundation）和南京大學資助的蜉蝣項目網站（culturalinnovation.art.nju.edu.cn）。

「華人文化數位人文平台」發展與應用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Chinese Cultur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

陳志銘

國立政治大學圖檔所特聘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some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o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for humanists. However, most of them have still not provided a friendly digital reading environment and practicabl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ol to support humanists on interpreting texts and exploring characters'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oreover,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ization technologies for the retrieval and use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is aris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these reasons, this paper presents a Chinese cultur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 (CCDHRP) which was developed b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f Taiwan to support historical China studie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digital archives, digital reading, basic search, and advanced search functions for Chinese ancient books, this platform still provides two novel functions that can more effectively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including an 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for interpreting texts and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ol for exploring characters'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An 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ATAS) embedded in the reading interface of universal typ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 can collect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databases through Linked Data (LD) for automatically annotating ancient texts to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It allows the humanists referring to resources from diverse databases when interpreting

ancient texts as well as provides a friendly text annotation reader for humanists interpreting ancient text through reading. Additionally,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ol provided by the CCDHRP can automatically identify characters' names based on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semi-automatically support humanists to confirm and analyze characters'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from Chinese ancient books based on the social network measures. The CCDHRP not only can stimulate the humanist to explore new viewpoints in the humanistic research, but also can promote the public to emerge the learning interest and awar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Digital Archives, Digital humanities, Chinese culture, 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1. Introduction

Digital humanities (DH) is work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disciplines (*Drucker, 2013*). It includes the systematic use of digital contents and tools in the humanities disciplines and makes possible new kind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DH have received a particular attention in both the humanities and computer science fields. Particularly, academic libraries, such as Research Libraries UK an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f Taiwan, also got started to offer spaces and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DH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librarians and researchers is disclos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librarians to actively collaborate in DH research (*Cassella, 2017; Kamposiori, 2017*). DH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and is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sec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a wide range of humanities disciplines (*Steiner et al., 2014*). Humanities research involves the analysis, comprehension, production, and sharing of a huge amount of digital sources. Moreover, humanists in DH field heavily relied on using digital tools, such as text mining (*Widlöcher et al., 2015*), annotation (*Chen & Tsay,*

2017; Sato, Goto, Kimura, & Maeda, 2016),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Uboldi et al., 2013),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Kallaher & Gamble, 2017),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Brooke, Hammond, & Hirst, 2015) to analyze data from digital sources in order to extract useful information and generate new knowledge. However, although a lot of digital tools have already been developed for supporting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many of these tools do not properly fit the needs of the humanities community due to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r scientific objectives (Picca & Egloff, 2017). Furthermore,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ists hav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ollections, requiring varying levels of support, and every individual humanist has their own particular interests and priorities.

In recent years, increasing effort has been made not only to make digital contents and tools available, but also to create a complete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s (VREs) that provid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for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artefacts (Steiner et al., 2014). Such VREs support conceptualizing, visualizing and analyzing information, as well as humanists can collaboratively work on it. VREs usually do not consist of one monolithic technology, but cover a collection of tools assembled in one place to assist research tasks and processes (Steiner et al., 2014). This study surveyed several current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s in Taiwan and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ULTURA system (Steiner et al., 2014), TextGrid (Neuroth, Lohmeier, & Smith, 2011),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THDL) (<http://thdl.ntu.edu.tw/index.html>), CBETA Research Platform (CBETA-RP) (<http://cbeta-rp.dila.edu.tw/>), and MARKUS semi-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http://dh.chinese-empires.eu/markus/beta/>) and tried to compare their features in order to develop a more practicabl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 to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Among the developed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s, Steiner et al. (2014) presented the CULTURA system and services and the two collections that have been used for testing and deploy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environment. The services of the CULTURA system include personalized

search tools, faceted search tools, annotators, social network visualization tools, and recommenders. Additionally, the TextGrid is a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s services for supporting researchers i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and tools for the analysis of text data and supports the curation of research data by means of grid technology (Neuroth, Lohmeier, & Smith, 2011). The THDL covers about 80% of all primary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Taiwan before 1895. The primary functions of THDL for supporting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include full-text search, techniques and interfaces for classifying and exploring a query result as a sub-collection, term frequency analysis, and referential tools (Chen, Hsiang, Tu, & Wu, 2007). CBETA-RP provides a friendly online reading interface with complete content and handy digital tools. Besides, full text search, dictionaries look up, person and place references, even the statistic of term, and relevant bibliography are also provided in the CBETA-RP, whereas MARKUS is a famous semi-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and supports online text reading. However, most of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s currently developed have still not archived different digital collections on the same platform and provided complete data analysis functions to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This study thus presents a CCDHRP which can simultaneously archive different digit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same platform and provides basic data analysis functions, such as full-text search with a single word or double words, term frequency analysis and post-query classification, as well as advanced data analysis functions, such as 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textual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user behavior analysis, to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Table 1 shows the function comparison of the proposed CCDHRP with five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Scripta Sinica Database presents the richest full-text data collection, CBETA Research Platform merely includes Buddhist texts, and MARKUS semi-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does not show the full-text data collection function. The CULTURA system consists of multiple distinct services

including personalized search tools, faceted search tools, annotators, social network visualization tools, and recommenders (Steiner, Agosti, Sweetnam et al., 2014). Besides, all platforms are lack of automatic segmentation of Chinese word; the automatic annotation function exists in the CULTURA,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and MARKUS semi-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and, each system presents the search function. In terms of external reference, Scripta Sinica Database could connect to Qing Officials Query System,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presents variant databases, CBETA Research Platform merely includes Buddhist text databases, and MARKUS semi-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shows the most external reference resources, containing Wikipedia, CBDB, TGAZ, and ZDict. Merely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and CBETA Research Platform show the function of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merely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presents the function of bookmark notes; and, MARKUS semi-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has the function to add annotations. The advanced features of the proposed CCDHRP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s contain the automatic word segmentation of Chinese text, automatic Chinese text annotation, semi-automati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user behavior analysis based on recoding use process. These advanced features in the proposed CCDHRP will be detailed in later section.

Table 1. Function comparis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s

Function comparis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s	CCDHRP	CULTURA	Scripta Sinica Database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CBETA Research Platform	MARKUS semi-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	--------	---------	-------------------------	--------------------------------	-------------------------	--

Full-text data collection	○	○	○	○	Merely data of Buddhist texts	X
Automatic segmentation of Chinese word	○	X	X	X	X	X
Automatic annotation	○	○	X	○	X	○
Term search	○	○	○	○	○	○
External reference	○	○	Qing Officials Query System	Variants Database	Database of Buddhist Tripitaka	CBDB and Zdict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	○	X	○	○	X
Bookmark notes	X	X	X	○	X	Adding annotations
Social network visualization tools	○	○	X	X	X	X
Recommender	X	○	X	X	X	X
Recording use process	○	X	X	X	X	X

“O” means that a feature is available; “X” means that a feature is not available

2. The Developed CCDHRP

2.1 System architecture

Widlöcher et al. (2015) claimed that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environment to support DH research is needed. Their study emphasized that reading interface,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data mining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otally separate tasks when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environment to support DH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developed a CCDHRP that includes three main parts including the digital reading interface module, ba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analysis function module, and advanced text and social network mining module to support DH research. This study adopted DSpace (Chen, Chen, Hong, Liao, & Huan, 2012), an open-sourc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system, to implement the CCDHRP embedded with emerging digital tools for supporting DH research. Although DSpace has sufficient functionalities for archiving, searching, and managing digital content, the predefined metadata schema needs to be revised to archive digital targets, such as Chinese ancient books. Additionally, the user interface in DSpace for reading digital content is very primitive and clearly cannot satisfy humanities scholars' needs. Therefore, the developed CCDHRP based on DSpace implemented a friendly reader that can simultaneously display the scanned image of Chinese ancient text and the corresponding full-text and integrate many useful reading functions, such as automation word segmentation, 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n the reader. These functions are detailed in the later section. Figure 1 shows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proposed CCDHRP in this study. The components of the system are explained in details as follows.

(1) Digital reading interface module

The digital reading interface simultaneously contains an automatic annotation tool and a manual annotation tool. An automatic annotation tool that can collect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databases through Linked Data (LD) for automatically annotating Chinese ancient texts wa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to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It allows the humanists referring to resources from diverse databases when interpreting Chinese ancient texts as well as provides a friendly text annotation reader for humanists interpreting ancient text through reading. Moreover, this study adopted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jax) and Model-View-Controller (MVC) framework to implement a

manual text annotation tool with four types of multimedia annotations including text annotation, picture annotation, voice annotation, and video annot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ng, archiving, and sharing services to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The manual text annotation tool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digital curation, crowdsourc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 because of existing strong relations among them (Chen & Tsay, 2017). Specially, this tool offers photo annotation functions allowing presenting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annotations on the annotation map and viewing the discussion hot spots on the article content by the number of annotations.

(2) Ba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analysis function module

The basic function module contains the term frequency analysis too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sis tool, intelligent search tool, and user behavior recording tool. For textual corpus studied in DH, a search tool is an obvious necessity. The term frequency analysis tool can help humanist to observe the term distribution state of a term searched by humanist in a collection. Moreover, spatial analysis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imary focus areas for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ities scholars.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sis tool aims to interpret data through spatial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has gotten started to apply **TGAZ API**, which is a read-only interface designed to search the contents of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placename database, to implement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sis tool for supporting the spatial analysis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 The intelligent search tool contains full-text search and metadata search with post-query classification of the humanist's search query. Full-text search aims to help humanist find documents by specifying terms occurred in desirable documents, whereas metadata search aims to help humanist find documents with specific metadata attributes. Also, since a huge amount of humanists' behaviors of operating the CCDHRP are worthily collected, this study thus developed the user behavior recording tool based on Experience-API (xAPI) which is a new generation learning process record standard

developed by 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ADL) (Tin Can API, 2015). “Actor,” “verb” and “object” are the record formats generated by the learning process recorded through xAPI. The actor is the executor of behaviors, and could be an individual or a group, for example, a learner. The verb is the type of motion performed by the actor, for example, answered or logged in. The object interacts with the actor, with activity as the unit, and could be a combination of instruction, experience, or performance with descriptive meanings and figures or tangible objects, for example, course. xAPI provides the flexible design architecture to allow us to self-define the verb names for the recorded learning process.

(3) Advanced text and social network mining module

The advanced text and social network mining module contains the user behavior analysis too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ol, and textual mining tool. The user behavior analysis tool aims at purposively, accurately, and authentically recording humanist’s behaviors while operating the CCDHRP for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by using the xAPI technology. Such records can include details like log-in learning time, system’s operating behavior, text viewing time,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humanists.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ol aims to help humanists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extracted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 via visualizing social networks. The textual mining tool aims to help humanists explore implicit information or knowledge from the Chinese ancient texts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classification, clustering, association rule, and predi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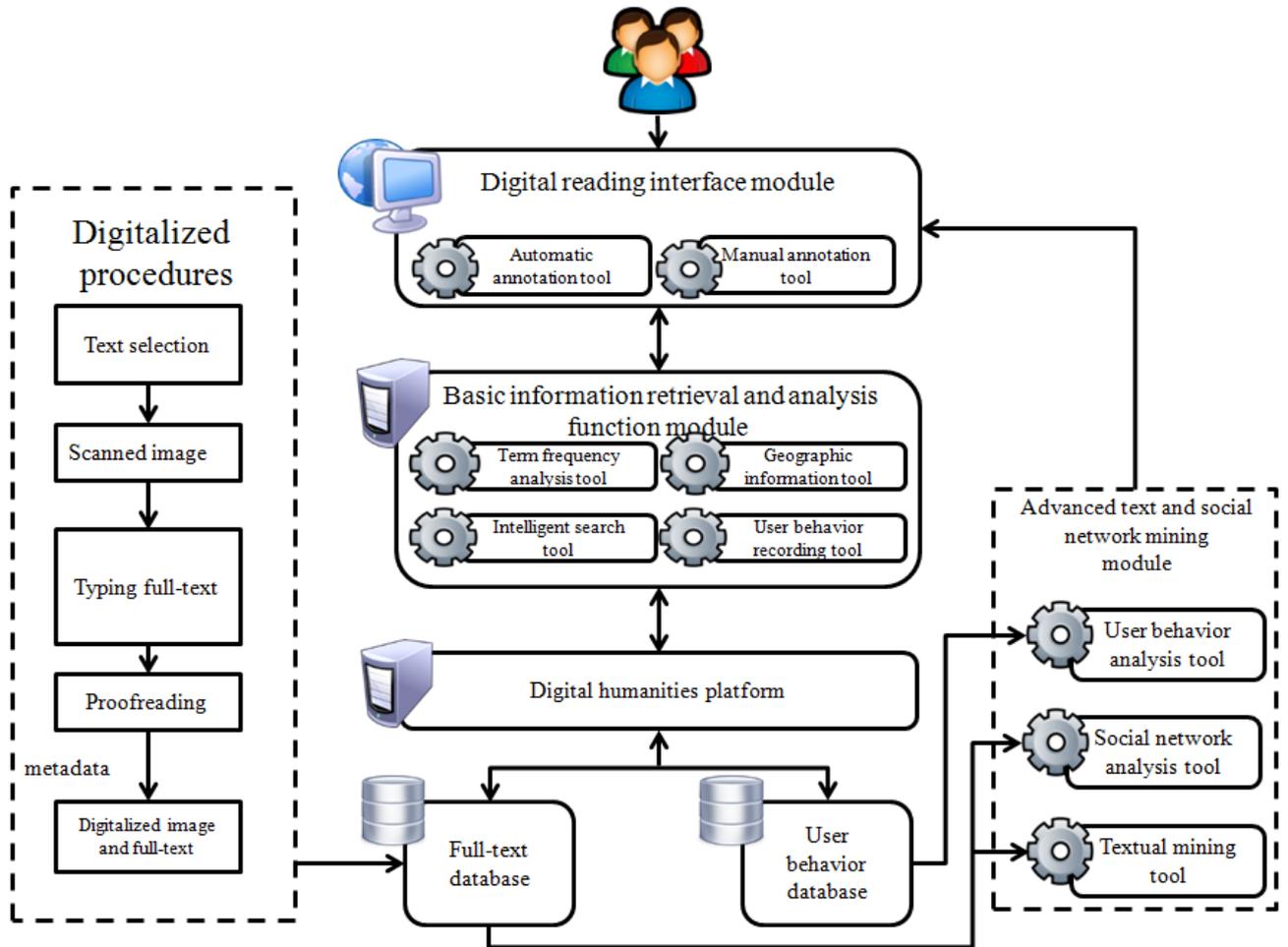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developed CCDHRP

2.2 System's main functions

This section mainly focuses on introducing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developed CCDHRP. Figure 2 shows the homepage of the CCDHRP on Ming Dynasty Chinese ancient texts. The CCDHRP not only can aid the humanist to explore new facets in the humanistic research, but also can promote the public to emerge the learning interest and awareness of ancient texts. Figure 3 shows the full-text search and post-query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humanist's search query. Undoubtedly, a full text search is the easiest way to help humanists find particular items in a large dataset, either in isolation or together with other browsing options, such as faceted search. The post-query classification aims to classify the documents of the resulting set of a query according to several predefined dimensions including year and author in the CCDHRP. Figures 4 and

5 show the comparison charts of term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wo terms simultaneously searched by humanist on year and collection, respectively. This function can help humanist observe the variation of two term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with year or collection.



Figure 2. The homepage of the CCDHRP on Chinese ancient books



Figure 3. The full-text search and post-query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humanist's search query



Figure 4. The comparison chart of term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wo terms searched by humanist based on year



Figure 5. The comparison chart of term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wo terms searched by humanist based on collection

When a humanist enters the reading interface of the CCDHRP for text reading, the system would segment the entire text into more than two terms based on a lexicon-based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system and display these segmented terms with blue highlight. When the humanist moves the mouse cursor to the term with automatic annotation, the system would change the term with red highlight to remind the humanist of available annot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term (Fig. 6). The system would present the annotation content after the humanist clicks on the term with automatic annotation. On top of the annotation, the annotations of five default databases, including Wikipedia, CBDB, TGAZ, Moedict, and EC dictionary, could be mutually referred. It would not be displayed when there is no LD in the database. When a humanist clicks to view the automatic annotation content, the annotations from different LD resources are displayed with default order in the system. The user could rate whether such annotation is helpfulness or not based on self-judging. The humanist would enhance the annotation

score if he rated the annotation as a useful databa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elpless one would be reduced the annotation score. The system would calculate the annotation scores of different LD resources. When the humanist re-clicks the annotation, the annotations from different LD resources would be ordered according to the annotation scores; ones with higher annotation scores are displayed in priority (Fig.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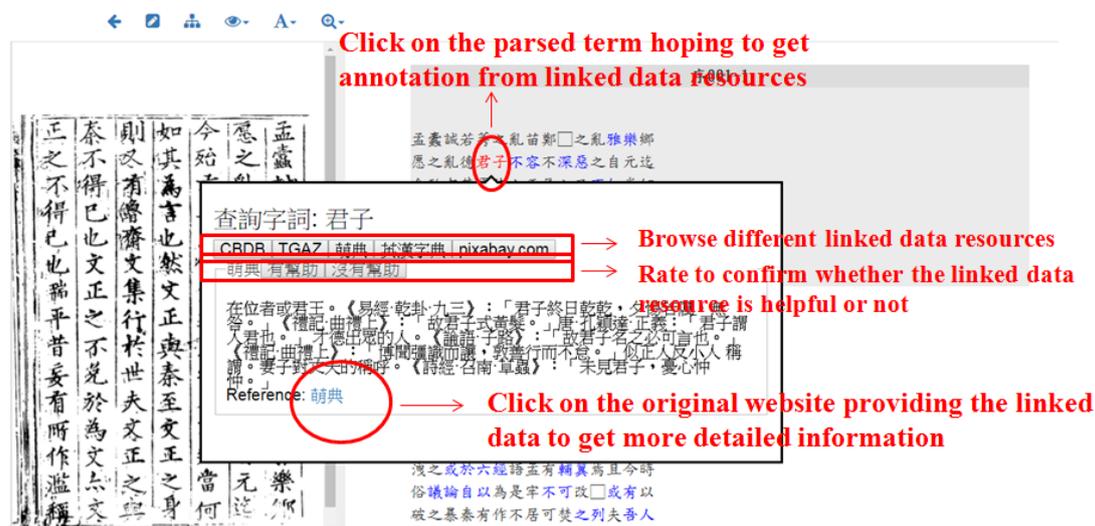


Figure 6. The user interface of reading Chinese ancient text on CCDHRP

Automatic annotation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correctness of word segmentation that some terms might not show automatic annotations. In this case, the humanist could select a term without annotations in the system. When there are annotations for the reference, the humanist could consider adding the term as a new term. After clicking the “Add new term button”, the system would pop out a window for confirmation, and then the term is added to the parser lexicon of the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system Jieba. The system would precede correct word segmentation and automatic annotation of the terms in the next loading to the reader (Fig.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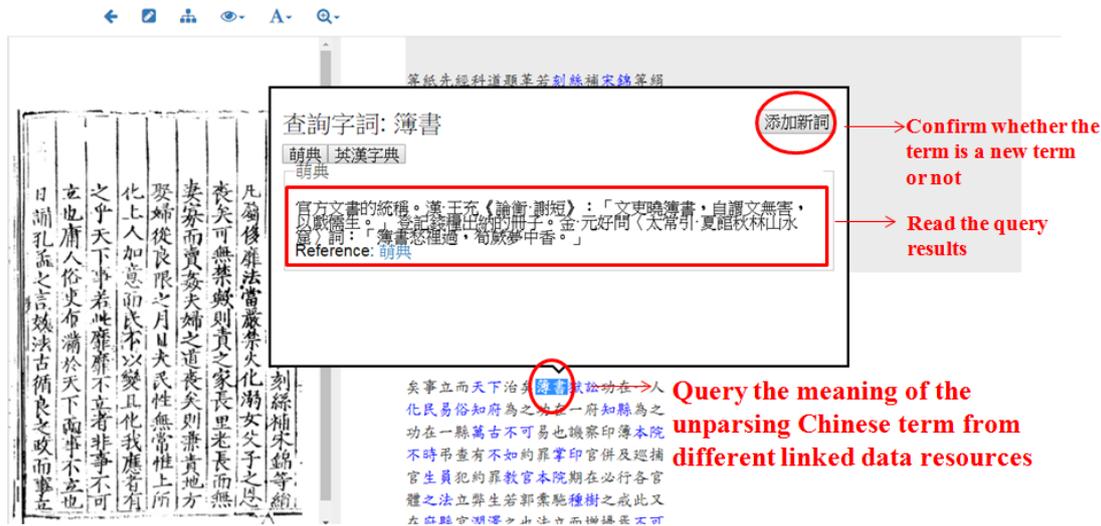


Figure 7. The user interface of adding a new term into the lexicon for enhancing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performance on CCDHRP

Apply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or DH research aims to examin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groups tha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se networks are often visualized to help humanist understand how they tie together and assist in drawing conclusions and raising further questions. Thus, the CCDHRP also develops a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tool (CSNRMT) to semi-automatically assist humanists through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more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exploring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from texts for useful research findings. The CSNRMT developed on the CCDHRP provides a friendly user interface and functions, allowing humanists interpreting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pport of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reading interface, text and external search, and notebook provided by the system, in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process. The overall system interface of the CSNRMT is shown in Fig. 8 and the functions are explained as be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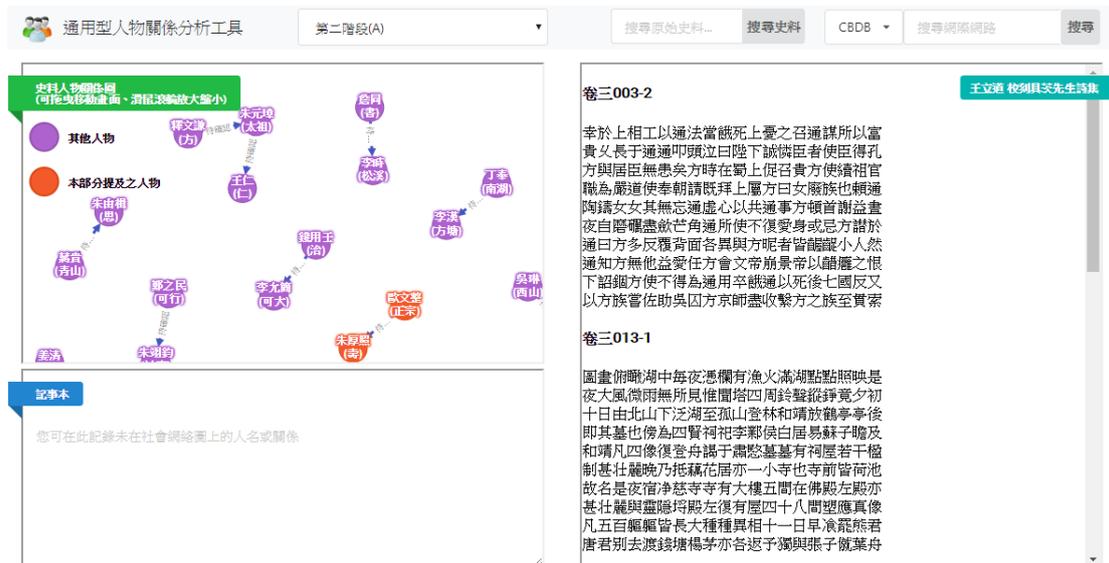


Figure 8. The overall system interface of the CSNRMT

1. The user interface of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Users could view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in texts by using the user interface of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shown as Fig. 9. The orange and blue nodes in the figure are all characters in the text judged by the system. Orange character nodes are characters appearing in the text of current reading text paragraph, and purple character nodes are characters appearing on other text paragraphs. One of character nodes in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is shown as Fig. 10 and each character node will display two character names and the relationship attribute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 names. The system would pre-judge the character's relationship being unknown based on the character relationship analyzer. The edition interface of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is shown in Fig. 11. By clicking on the character relationship line in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trix compiler is started for editing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The edited relationship would be immediately updated on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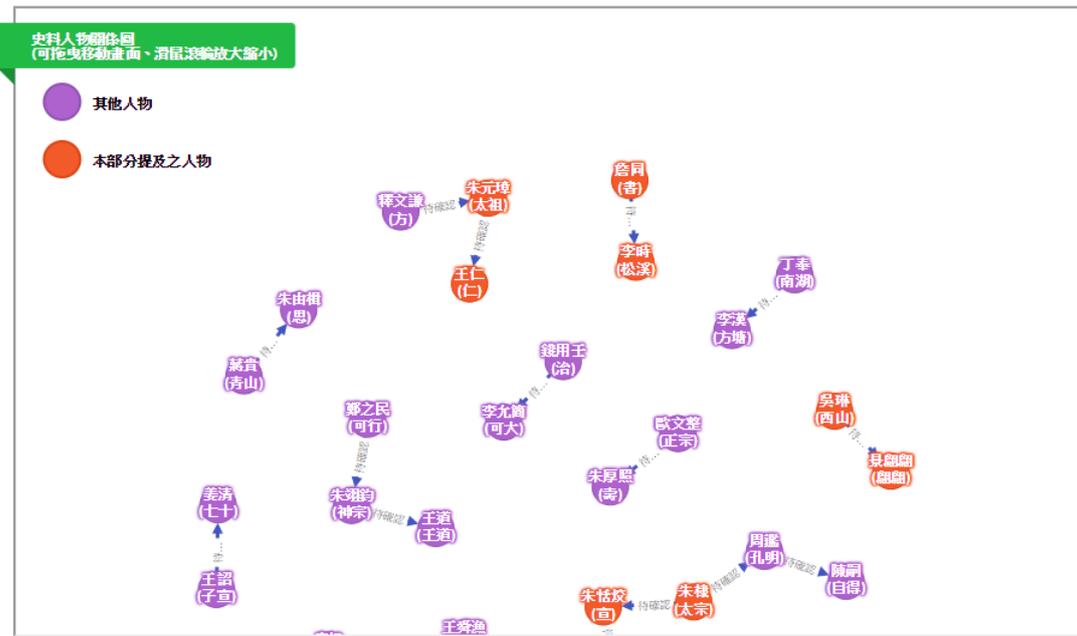


Figure 9. The user interface of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Figure 10. The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harac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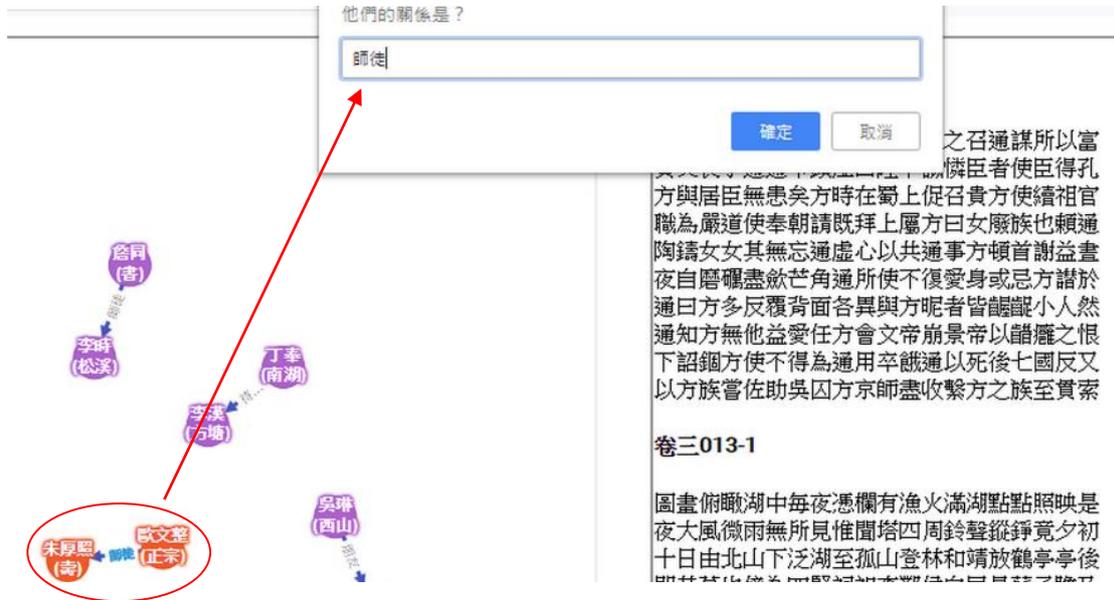


Figure 11. The edition interface of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2. Reading interface of text

The reading interface of text, as shown in Fig. 12, is integrated with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and external search function.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would correspond to the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text paragraphs in the reading interface. When users click on character nodes appearing on the paragraph in the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the location of the character in the text is highlighted on the reading interface for users analyzing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Marking the searched word or paragraph with a mouse could link with the external search function for inquiry. Detailed operation mechanisms are explained in the text search and external search.



Figure 12. The reading interface of text

3. The user interface of text search and external search

The text search allows users searching for characters or vocabulary in texts and highlighting on the text paragraph. The external search allows users searching required information through external databases for interpreting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in texts. It provides various external linkages of character database, online encyclopedia, search engine, and dictionary, such as CBDB, Moedict, Wikipedia, Baidu Baike, Google, Zd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 Variants, and Kangxi Dictionary as shown in Fig. 13. A user simply marks the paragraph word in the text, and the word is automatically filled in the external search box for searching.



Figure 13. The user interface of external search

4. The user interface of notebook

The user interface of notebook shown as Fig. 14 allows users recording found information dur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 expecting that users could reduce the time for switching between windows to complet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under a single interface.



Figure 14. The user interface of notebook

3.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s

In recent years,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ization technologies for the retrieval and use of Chinese culture archives is aris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CCDHRP, which can archive any subject's Chinese culture digital collections and provide several emerging digital tools, to support DH research. The CCDHRP not only provides innovative and forward-looking applications in DH field, but also promotes the public to emerge the learning interest and awar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uture. More importantly, this study tried to develop a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 with practicable digital tools on virtual environment for different humanities disciplines with similar but heterogeneous datasets.

Additional studies are warranted. First, text segmentation that divides written text into meaningful sentences is regarded more important than text segmentation that divides written text into meaningful words when reading Chinese ancient text without punctuations. Therefore, the future work of enhancing the CCDHRP to support DH research more effectively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an automatic text segmentation algorithm to add appropriate punctuations into Chinese ancient texts for promo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of humanists. In this work, the deep learning derived from neural networks, such as the bidirectional LSTM (long short-term memory),

has a very high potential to be appl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Wang, & Zhang, 2017). Second, compared to the 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developed in the CCDHRP, manually collaborative annotations of digital texts can get more correct annotated contents from humanists and allow humanist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with each other. Annotations typically facilitate text review. Most importantly, annotated content can help readers obtain a deeper and broader understanding compared to digital content without annotations. Thus, the future work of this study will develop a collaborative reading annotation system with a reading annotation an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scaffold for improving reading performance in collaborative digital reading environments (Chen & Chen, 2014). Third, opinion leaders in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model were the brokers between mass media and the public as well as were the key person in information transfer (Li, Ma, Zhang, Huang, Kinshuk, 2013). The future work of this study should develop an opinion leader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for characters' social networks based on centrality, structure hole, or PageRank. Finally, developing a dashboard system for real-time analysis of humanists' behavior processes on the CCDHRP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future. If the behavior process records of humanists interpreting text by using the CCDHRP can be real-time analysis, then the CCDHRP can give real-time feedback to provide humanists with more effective information for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References

- Brooke, J., Hammond, A., & Hirst, G. (2015). Gutentag: An nlp-driven tool for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in the project gutenber corpus. In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for Literature*, Denver, Colorado, USA, Jun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42-47.
- Cassella, M. (2017). New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y partnerships: Academic libraries

- and digital humanit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ATUL Conferences*, 1-9.
- Chen, C. M. & Chen, F. Y. (2014). Enhancing digital reading performance with a collaborative reading annotation system, *Computers & Education*, 77, 67-81.
- Chen, C. M. & Tsay, M. Y. (2017). Applications of collaborative annotation system in digital curation, crowdsourcing, and digital humanities. *The Electronic Library*, 35(6), 1122-1140.
- Chen, C. M., Chen, Y. T., Hong, C. M., Liao, C. W., & Huan, C. M. (2012). Developing a Taiwan Library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ith reader knowledge archiving and sharing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DSpace platform, *The Electronic Library*, 30(3), 426- 442.
- Chen, S. P., Hsiang, J., Tu, H. C., Wu, M. (2007). On building a full-text digital librar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D. H. L. Goh, T. H. Cao, I. Solvberg & E. M. Rasmussen (Ed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4822. Asian Digital Libraries. Looking Back 10 Years and Forging New Frontiers,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Digital Libraries*, Proceedings (pp. 49-60). Berlin, Germany: Springer.
- Drucker, J. (2013). *Intro to digital humanities: Introduction*. UCLA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 Web available at http://dh101.humanities.ucla.edu/?page_id=13, Retrieved January 28, 2018.
- Kallaher, A. & Gamble, A. (2017). GIS and the humanities: Presenting a path to digital scholarship with the Story Map app. *College & Undergraduate Libraries* 24(2-4), 559-573.
- Kamposiori, C. (2017). The role of Research Libraries in the creation, archiving, cur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ools for the Digital Humanities. RLUK Report. <http://www.rluk.ac.uk/wp-content/uploads/2017/07/Digital-Humanities-report-Jul->

- Li, Y., Ma, S., Zhang, Y., & Huang, R., & Kinshuk. (2013). An improved mix framework for opinion leader identification in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Knowledge-Based Systems*, 43, 43-51.
- Neuroth, H., Lohmeier, F., Smith, K. M. (2011). TextGrid—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 for the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Digital Curation*, 6(2), 222-231.
- Picca, D., Egloff, M. (2017). DHTK: The digital humanities ToolKit. CEUR Workshop Proceedings, 2014, 81-86.
- Sato, T, Goto, M., Kimura, F., & Maeda, A. (2016). Developing a collaborative annotation system for historical documents by multiple humanities researc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Theory and Engineering*, 8(1), 88-93.
- Steiner, C.M., Agosti, M., Sweetnam, M. S., Hillemann, E. C., Orio, N., Ponchia, C., Hampson, C., Munnely, G., Nussbaumer, A., Albert, D., & Conlan, O. (2014). Evaluating a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environment: the CULTURA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gital Libraries*, 15(1), 53-70.
- Uboldi, G., Caviglia, G., Coleman, N., Heymann, S., Mantegari, G., & Ciuccarelli, P. (2013). Knot- an interfac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humanit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Bi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talian Chapter of SIGCHI (CHIItaly '13)*, ACM, New York, NY, USA, Article 15, 9 pages.
- Wang, X., Wang, M., & Zhang, Q. (2017). Realization of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method. In *Proceedings of AIP Conference*, 1864, 020150-1–020150-6.
- Widlöcher, A., Bechet, N., Lecarpentier, J. M., Mathet, Y., & Roger, J. (2015).

Combining advanced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text-Mining for digital humanities.

The ACM Symposium on Document Engineering, Lausanne, Switzerland, 157-166.

中國古代詩歌自動斷詞、文本標記及其應用

羅珮瑄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文旨在探索中文斷詞技術在古代漢語詩歌研究上的應用，從詩歌史的研究議題出發，設計一套適用於中國古代詩歌斷詞與選音的自動化流程，並與其他中古音韻、地理資訊、人物傳記、典故與辭書等資料庫結合，拓展應用的層面，無論是文學研究裡專門的漢詩格律發展問題、抑或基礎研究如詩歌典故、詩歌詞彙、句法與詩法的比較、註解等，期皆能有所助益。

漢語作為詩歌的載體，相對於印歐拼音語系，其單音獨體的孤立語性質，使漢詩容易形成整齊的節奏，及同音相和的呼應效果；又因漢語具有聲、韻、調的語音元素，其中獨特的聲調叶韻，更易使漢語詩歌產生一種特殊的音樂美感。其構詞不以屈折形態區分詞類，不以固定的語法範疇限定詞序，而是由單字、辭彙、詞序、句構相互間的關係，共同扮演生發語意的功能，因而有極大的靈活性與多元的組合彈性，甚至結合格律規範來變換語序，與散文所呈現出來的樣貌極為不同。

在資訊科技的領域裡，中文斷詞在中文的自然語言處理上，是一項基礎而重要的工作，它是發展其他進階技術——諸如文本標記、事件擷取、進階檢索、問答系統、機器翻譯、語音辨識等等——必須先走過的前置處理。而另一方面，在語言

學的領域裡，分詞、建置語料庫、標記語法等工作，也是一項具有漫長傳統的工作，台灣在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隨著政府與學校、圖書館、民間基金會推動數位典藏時代的研究計畫，除了現代中文與方言之外，古代漢語也進入數位化的研究視野當中，其中以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古代及現代漢語機讀文獻資料之語言分析——文獻語言學之奠基研究(1991.7-1993.6)」和「上古漢語詞彙之蒐集與詞彙庫之建構(1994.7-1996.6)」兩項計畫下所建置的上古（先秦到西漢）、中古（東漢六朝）、近代（唐代以後）漢語語料庫為最大，受限於當時的研究經費、古代文獻數位化的數量和實況、以及不同文獻所需要的文本清理工作的難度，這個大型的漢語斷代語料庫以上古與中古為主，而近代語料庫的完成度則最低²。

對於建置語料庫的工作而言，古代漢語的處理方式也與現代漢語不同，古代漢語語料庫選擇從「語法」的角度來進行，是為了斷代的需求；1994 年開始進行的「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建置計畫，則從「詞彙」的角度，而有所謂分詞規範的研擬。分詞是基於數位典藏的目的，概念切分不同會導致解讀的歧異與混亂，標準一致才能定義並處理知識本體，從而提高搜尋引擎檢索、錯別字更正等應用技術上的準確率。整個討論從 1991 年開始，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會（ROCLING）初步訂定學會共用的分詞原則；1995 年及 1997 年 ROCLING 接受中央標準局委託，進行分詞規範的研擬，並由中央研究院執行；1998 年舉辦分詞規範公聽會；1999 年正式通過為國家標準，編號 CNS14366，名稱「資訊處理用中文分詞規範」。其主要訴求為：將具有獨立意義，且扮演固定詞類的字串視

² 魏培泉、譚樸森、劉承慧、黃居仁、孫朝奮：〈建構一個以共時與歷時語言研究為導向的歷史語料庫〉，《中文計算語言學期刊》第 2 卷 1 期（1997 年 2 月），頁 131-145。

為一分詞單位，從而將中文詞彙區分為信、達、雅三級，同時在自動分詞的技術難度上也是遞增的；信級可提供基本資料交換，達級可以進行一般自然語言處理，如建立詞雙連語言模型等，雅級則可作語法和語意上的抽取，如語音合成、語意分析、機器翻譯等³。

綜言之，台灣數位人文學發展早期的數位典藏時代，基於建置語料庫的需求而進行有關中文斷詞、分詞規範的探索，技術上則以辭書比對、構詞式來擷取辭彙，再輔以人工校正。縱使在分詞規範上提出了信達雅三級制度，並形成相當程度共識，卻仍然有很大程度是仰賴人為的預設定義，對於其他研究領域的應用而言，仍有一定的限制。

需要制定分詞規範的理由，源於漢字一字一音孤立語的特質，如何處理詞彙邊界與歧義性，是第一個門坎。2000 年左右，當台灣的數位人文學發展進入了所謂數位人文時代，在中文斷詞技術上，開始了更多嘗試，2003 年 M. Li 等人(Li, et al., 2003)提出一種非監督式(unsupervised)訓練，藉由訓練 Naïve Bayes 分類器，來解決中文斷詞的交集型歧義(overlapping ambiguity)問題，實驗結果可達到 94.13% 的準確率；而 1999 年 J. H. Zheng 等人(Zheng & Wu, 1999)則以規則式(rule-based method)來處理組合型歧義(covering ambiguity)，並達到 85% 的準確率；2002 年 X. Luo 等人(Luo, et al., 2002)使用類似於自然語言處理領域中解決「詞義消歧」(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的方法，使用 TF.IDF 權重

³ 黃居仁：「CNS14366 中文分詞標準與分詞的實際操作」，

<http://linganchor.sinica.edu.tw/data/file/LC030909LC03.ppt> (2018.11.23.)

計算的公式，重新定義新的 TF 與 IDF 公式，來解決組合型歧義問題，達到 96.58 % 的準確率。

歧義問題是在已知詞彙的基礎上，探索詞彙邊界時所遭遇的困難；中文斷詞技術的另一難題，是如何挖掘未知的詞彙。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陳克健等人於 1997 年提出關於解決未知詞問題的研究(Chen & Bai, 1997; Chen & Ma, 2002; Ma & Chen, 2003)，初期透過統計與人工判斷並用，從斷詞語料庫偵測單一字元之已知詞，並擷取規則以合併這些單一字詞而成為未知詞；後期則將所有種類未知詞的構詞方式以上下文無關文法(context free grammar)表示出來，並搭配疊代式合併排序法(bottom-up merging algorithm)來解決大部分統計特性低的未知詞擷取問題。其他如 2002 年 Zhang 等人(Zhang, et al., 2002)則使用類似詞性標示(part-of-speech tagging)的作法，稱為「角色標示」(roles tagging)，角色指的是在未知詞的組成成分、上下文以及句子中的其他部分，並且依據句子的角色序列來辨識出未知詞。實驗部分針對中國人名以及外國翻譯名等未知詞做測試，並且達到不錯的準確率以及召回率⁴。

近年來的研究主要趨向於機器學習式的方法來處理中文斷詞，均可見企圖擺脫人為干預所帶來的主觀限制，而更訴求統計與演算來呈現詞彙分布，並進而挖掘出更多的未知詞彙。但基於大規模的訓練語料與商業應用的需求，中文斷詞技術在現代漢語的側重遠大於古代漢語，而出於研究需求所進行的古代漢語研究，

⁴ 以上技術介紹，參見林千翔、張嘉惠、陳貞伶：〈結合長詞優先與序列標記之中文斷詞研究〉，《中文計算語言學期刊》15 卷 3-4 期（2010 年 9 月），頁 162-165。

則又重散文而略詩歌(或韻文)，在斷詞技術上均未考慮過漢語詩歌體式和聲韻上獨特的結構，無法回應中國古代詩歌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將漢語詞彙視為一個整體，而缺乏時空發展的脈絡，也不易觀察詞彙生成的過程，作為漢語當中一塊特殊的詩歌語彙，本文嘗試運用既有技術，以詩歌史的研究課題出發，為中國古代詩歌重新設計一套斷詞流程。

「漢詩斷詞分析工具」的研發動機，源自於研發團隊的另一項目「漢詩文獻分析系統」與「漢詩格律分析工具」對漢語詩歌聲韻處理的程序，該項目依據現今流傳文獻中關於永明沈約與初唐元兢詩學之記載，統理出其中具有規範性質的格律內容，結合「小學堂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之中古聲韻材料，建構沈約四病、元兢四病與元兢調聲三術、劉滔二四字不同、近世平仄譜、第四字黏對、五言略頌、新五言略頌等 8 種格律模型、21 種格律規範條件的分析系統，以呈現格律發展史中從永明至初唐的承變關係⁵。面對漢語一字多音與詩歌詞彙的搭配問題，目前這套工具的演算法採取了無罪推定的原則，暫時忽略詞彙邊界和語義的問題，在電腦自動計算過程中，出現二讀以上的情況時，以不與格律規範條件衝突者為優先，來觀察漢詩格律的發展。

當研究推進到可以運用各種交叉運算與統計模型來分析細節的時候，我們意識到在無罪推定原則下所造成明顯的選音錯誤問題，越來越影響我們對於特定格律規範條件生成的時代與作品的論斷，細節上的錯誤已無法用大數據的容錯能力

⁵ 研究成果參見蔡瑜：〈初唐格律發展史觀——以詩格、詩選、詩作交互探索〉，《臺大中文學報》第 59 期（2017 年 12 月），頁 1-54。

來忽略時，必須尋求其他解決的途徑。研發「漢詩斷詞分析工具」來建置漢語詩歌語料庫，在進行選音演算以前，先確立特定語彙的音韻資料，成為一種可能方案。

開發的初期階段，首先根據王力《漢語詩律學》所整合的文獻材料，選擇可規範者以建立漢語詩歌五言、七言、雜言等各自的節律模型，其次運用三種演算法：(1)以正、逆向的長詞優先演算法搭配辭書比對，確認漢詩固有辭彙及其選音模型，最後再進行漢詩衍生辭彙的消歧，從而建置具有時代特徵的漢語詩歌詞庫。(2)以單一唐人選集作為語料庫，進行非監督式斷詞。(3)以《全唐詩》為語料庫，進行非監督式斷詞，再擷取出單一唐人選集的斷詞結果。

第一種演算法所採用的辭書，首先選擇清代康熙年間官方敕編、歷時八年而成的《御定佩文韻府》，根據御制序曰：「嘗謂《韻府群玉》、《五車韻瑞》諸書，事繫於字，字統於韻，稽古者近而取之，約而能博。諸書簡而不詳，略而不備，且引據多誤，朕每致意焉。欲博稽眾籍，著為全書。爰于康熙四十三年夏六月，朕與內直翰林諸臣親加考訂，證其訛舛，增其脫漏，或有某經某史所載，某字某事未備者，朕復時時面諭，一一增錄，漸次成帙。」可見該書乃是集此前詩韻系統韻書之大成，詳加考訂，體制以韻為綱，其下統字、詞、典故、詩例，又以官方之力為之，從而具有詩人創作之際，實務操作上的功能；數位文本方面，四庫全書電子版、中國哲學書電子計劃 (Ctext) 等皆有全文，雖仍需精校，但足以加工成為「漢詩斷詞分析工具」的辭書基礎。其次又加入《漢語大辭典》，作為對照組。該辭典由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組織中國四百多位專家參與編寫，從 1975

年開始到 1986 年第 1 卷出版，歷時 11 年，到 12 卷出齊，歷時 18 年。《漢語大詞典》共分為 12 卷，收詞目 375,000 餘條，包括 22,000 餘個單字，350,000 餘條典故，是一全面性的辭書。

通過兩種不同性質的辭書、三種演算的方式，本文進而比較「漢詩斷詞分析工具」在唐人選集《才調集》上的實驗結果，並反思這套斷詞流程的設計背後，必須回應的數位人文學課題，包含「小數據」的可能、詩歌語彙的邊界、以及對詩歌史與格律發展史研究的具體貢獻。

概念和社會：以「台灣傳記知識本體庫」試定群體結構

Concepts and Society: Defining Social Groups with Taiwan Biographical Ontology

Táňa Dluhošová (路丹妮)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

Abstract

What do the worldviews of a given period consist of, and what is their role? Does knowledge, defined as an ideologically motiv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structure society? Following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 theory formulated by the German sociologist Karl Mannheim (1893–1947)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presentation will introduce an approach which focuses on the particular knowledge, i.e. ideologies expressed in the discourses of actors which form certain social groups and address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Rather tha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e presentation opens up methodologically innovative paths. It presents “Taiwan Early Post-war Corpus,” serving as a basis for rigorous corpus-linguistic analyses. The aim is (1) to identify salient political concepts in that period using keyword analysis; (2) to observe the distribution of meanings of concepts among various clusters of agents as defined by publication patterns through multivariate analyses; and (3) to contextualize the linguistic findings within contemporaneous social structures. “Taiwan Biographical Ontology” is utilized for the last aim of contextualization. Following prosopographical analysis, the presentation thus introduces several possible ways how we can identify and describe specificities of various social groups, such as links between people and various

organizations, classifications of organizations, classifications of positions and prosopographical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groups.

道的失能：數位人文視野下

中國近代「天道」概念變遷研究*

邱偉雲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系副研究員

摘要

「道」之概念自古有之，伴隨著時空推移，以及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主流思想與概念系統的演變，「道」之內涵也隨之不斷的流動。近代中國因為種種內外因素，開始與西方有了密切的聯繫，在思想主流上也逐漸地選擇性吸收西方天演進化論，促使近代中國開始產生一股朝向以「新」為「道」的思想發展方向。「道」在上述的潮流中，受到時空背景影響，與時具進的改變其內容，在中國近代多元現代性的洪流中，呈現出「道的多元現代性」。本文以包含一億兩千萬字政治思想類文獻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為資料來源。先以數字人文方法進行文本探勘，擷取1830至1930年間，以「道」為詞綴的「道之詞族」，其中包含了「道德」、「人道」、「道理」、「大道」、「天道」、「公道」、「王道」、

*基金項目：山東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數字人文視野下中國近代多元現代性話語體系構建研究」階段性成果(2017TB0013)。本文曾以〈天道與人道：中國近代多元現代性視野下「道」之觀念的演變與發展〉為題，在「文與道：漢語世界的文化與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獲得評論人祝平次教授的寶貴意見，爾後參照其意見，將「天道」研究部分獨立出來並進行刪改增補而成本文，在此特致謝意。本研究中「天道」之詞彙資料，取自於「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台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劃辦公室提供檢索服務，謹致謝意。目前正由兩校共同完善、開發數據庫。聲明：本論文為提交「從人文到數位人文：華人文化研究新趨勢與新方法國際工作坊」之論文，論文尚未發表或出版，若未經作者本人同意，不得引用、轉載或轉發。特此聲明。

「治道」等多種由「道」為核心觀念字演化而成的諸多概念家族詞。

上述這些「道之詞族」的轉型與變遷，可整體呈現出「道的多元現代性」發展軌跡。本文此次主要將焦點鎖定在「天道」一詞作為主要考察對象，觀察從傳統到近代之際，「天道」概念隨著天演論的發展，有何改變推移之現象。本文將運用概念史研究法，首先綜理「天道」概念在中國近代歷時性的發展；其次勾勒「天道」概念在中國近代理性化、主義化、意識形態化、世俗化等思潮下，展現出哪些「現代性」；最後以此以點帶面地擘畫出「道的多元現代性」發展圖譜，並與中國近代多元現代性理論對話，是為本文研究意義與價值所在。

關鍵詞：天道、現代性、詞族、概念史、數位人文

一、前言：中國近代「道」的詞族

「道」之概念，在文字起源上的意義，指的是路，如《說文解字》提到：「道，徒皓切，所行道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解釋道：「毛傳每云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亦謂之行。道之引伸為道理，亦為引道。」由此可知，「道」之原義即人所走的路。後來「道」之意義有所變化，引伸為道理，則如宇野精一（1972）指出，是經由道家將「道」解說成經由理性思維後的抽象恆常之道，到了《左傳》、《國語》才出現先王、君子、人生之道等正確之法的抽象概念意涵。⁶由上可見中

⁶ 宇野精一：〈道的意味與其變遷〉，《鈴木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學論叢》（東京：明德出版社，1972），轉引自陳瑋芬：〈「道」、「王道」、「皇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詮釋〉，《中山人文學報》第15期（2002年10月），第108頁。

國語境裡「道」字觀念內涵的發展。

既然「道」的概念發源甚早，故在中國歷代眾多思想家的詮釋下，「道」之概念自然煥發出多元樣貌，儒、道、墨、法、名、陰陽、縱橫、雜、農、小說等九流十家，皆有各自之「道」。即使儒家之道，還有歷時性之變化，從漢代讖緯、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乃至於中國近代思想轉型時代中，⁷對於「道」之概念都有所增添刪削。因此，「道」之概念在共時性/歷時性發展中，即變現出繁復的去脈絡化/再脈絡化⁸現象，展現出「道」之概念在中國乃至東亞與世界各地之多元樣態。⁹

至於為何研究「道」之概念，如羅志田指出，人對天道的追求是永恆的，猶如其他社會始終尋覓上帝，因為人生、社會、政治都需要「道」的指引。¹⁰正因「道」具有上述重要性，故過去已有諸多學者探究中國傳統與近代的「道」之概念。¹¹其中在近代部分，由於「道」伴隨著西學與東學的傳入，有著不亞於傳統的

⁷ 張灝曾指出中國近代具有一思想轉型期，在這轉型期中，傳統思想資源在新時代命題下受到挑戰，使中國知識分子在萬國之新世界秩序下，須重新擘畫出中國的位置，因此在中國要回應內在取向危機與外在他國衝擊的雙重挑戰下，便啟動了思想轉型的歷程，這段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過程，即稱之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香港）總 52 期，1999 年 4 月，第 29-39 頁。

⁸ 關於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觀察視野說明，可參見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2 期，2012 年 6 月，第 55-78 頁。

⁹ 不僅中國或日本學者討論「道」之概念，亦有學者研究西方的「道」與埃及的「道」的概念，由此可見以「道」的概念為核心，可以進行「道」的概念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研究。相關研究參見劉景輝：〈論埃及人的天道觀〉，《台灣大學歷史學報》1978 年第 5 期，頁 141-144；

David L. Hall,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1987)，中譯本參見〔美〕郝大維、安樂哲著，蔣弋為、李志林等譯：〈第四章 天道觀之比較〉，《孔子哲學思微》（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47-193 頁。

¹⁰ 羅志田：〈近代中國「道」的轉化〉，《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19 頁。

¹¹ 如陳來：〈第三章 天道〉，《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第 61-78 頁；魏培泉：〈從道路名詞看先秦的「道」〉，見鄭吉雄主編：《觀念字解讀與思想

多元呈現，如羅志田¹²指出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下，等於承認了中學與西學皆為「道」，只是未曾言明，就此形成「道出於二」的思維框架，而此情況在民初之際產生變化，有人開始主張以西學為尊，並就此提出「道通為一」的主張，自此中國近代就有從「道出於二」轉回「道通為一」的發展趨勢；吳展良¹³則探討嚴復如何將太極、邏各斯(logos)、理則 (rationality)、自然公例 (natural law) 等西方概念融入於中國的「道」之概念中，這些研究在在都提供了勾勒近代中國「道」之概念發展的參照點。

本文與前人不同之處，即在於運用數位人文 (digital humanities) 方法，¹⁴從宏觀視野出發，對中國近代「道」之概念發展進行遠讀描繪 (distant reading)，冀能與前人的細讀 (close reading) 研究相輔相成，¹⁵共同勾勒出中國近代「道」

史探索 - 文獻與詮釋研究論叢》(台北：學生書局，2009年)，第 1-51 頁...等，餘例不詳舉。

¹² 羅志田：〈近代中國「道」的轉化〉，《近代史研究》，第 4-20 頁。

¹³ 吳展良：〈中西最高學理的縮合與衝突：嚴復「道通為一」說析論〉，《台大文史哲學報》2001 年第 54 期，第 305-332 頁。

¹⁴ 關於數位人文學 (digital humanities) 的起源及其定義與發展，可參見項潔、涂豐恩：〈導論 - 什麼是數位人文〉，見項潔主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啓數位人文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第 9-28 頁、金觀濤：〈數位人文研究的理論基礎〉，見項潔主編：《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第 45-84 頁。又近來有學者提出「數位史學」與「數位人文」的異同，可參見 Stephen Roberts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Digital History. in Matthew Gold, Ed.,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歐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pp. 291-298、王濤：〈「數字史學」：現狀、問題與展望〉，《江海學刊》2017 年第 2 期，第 172-176 頁，餘例不詳舉。

¹⁵ 所謂遠讀 (distant reading) 是指通過量化方法，對龐大文本中的類別因素、形式元素或發展數據作出觀察與解釋，此一概念來自於法國年鉴學派的費爾南德·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對於長時段觀察的關懷。而在數位人文視野下，對何謂「歷史證據」的概念也有所改變，有從「軼聞式證據」到「大證據」的發展過程，即「不再讀書去蒐集和記錄它裡面的隨機性的『事實』」，而是在強調，大量數位語料庫提供給我們前所未有的文獻記錄，也要求一種新形式的證據蒐集方式與意義生成過程。」關於數位人文方法的遠讀能力，以及如何與細讀之間相互協作，可參見 Ted Underwood. *Why Literary Periods Mattered: Historical Contrast and the Prestige of English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66、Jockers. *Macroanalysis: 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 (Urbana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3), p.8、〔美〕戴安德、姜文濤著，趙薇譯：〈數字人文作為一種方法：西方研究現狀及展望〉，《山東社會科學》2016 年第 11 期，第 26-33 頁，餘例不詳舉。

之概念的轉型變遷樣態。因此，本文基於羅志田曾指出中國近代具有的「新的崇拜」¹⁶思潮以及「道的轉化」¹⁷之現象，特別注意考察近代中國如何透過選擇性吸收西方天演進化論，朝向以「新」為「道」的思想發展方向，藉此觀察「道」在中國近代歷史洪流中如何浸染煥發出「道的多元現代性」，¹⁸，最後再與中國近代多元現代性理論對話，即為本文主要研究目的。

「道」之概念從先秦之後開始分化，與其他字結合成雙字詞，為的是更好的表達日漸複雜的概念世界。從「道」字演化出來的詞族甚多，如天道、人道、君道、王道、霸道、師道...等，這些道之詞族都分潤共享了「道」之內涵，但卻受其前綴字字義的影響會有所不同。而從道之詞族結構中，可以掌握的是「道」之概念為時人所接受與使用的範疇，從道之詞族研究出發，有望透過歸納去掌握「道」的意涵。那麼，有沒有可能把中國近代所有「道之詞族」找出來？若是透過人工方法，則需閱讀所有中國近代可見文本後，才能全數找出，此一工程非數十年不為功。然而，拜數位時代來臨之賜，透過現代電腦快速運算以及各種數位人文方法的輔助，已然可以完成過去不可想像的研究議題，那就是找到中國近代「道」

¹⁶ 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81頁。

¹⁷ 羅志田：〈近代中國「道」的轉化〉，《近代史研究》，第4-20頁。

¹⁸ 多元現代性理念乃是在對柯文（Paul A. Cohen）「衝擊-回應」的反思下所形成，亦即中國近代朝向現代性發展，不僅是起自於外力的衝擊與回應方面，也起自於內力如乾嘉經世思想的驅動，故兼綜外力與內力之考察，便使現代性的動力因從一元衝擊轉向多元內外互動，形成了多元現代性的討論主軸，成為二十年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追求重點。相關討論可參見段煉：〈近20年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進展〉，《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第107-124頁。關於柯文對於費正清「衝擊-回應」框架的反思，以及其進一步跳出「西方中心觀」而提出的「中國中心觀」內涵，可詳參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之詞族結構，並藉此進行「道」之概念的整體描繪。

為達上述目的，本文先以包含一億兩千萬字，收集有清末民初近代期刊、晚清檔案資料、清季經世文編、清末民初士大夫著述、晚清來華外人中文著譯、西學教科書等六大類政治思想文獻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以下簡稱「數據庫」)為資料來源，並以數位人文工具進行計算。這裡要說明的是，雖然數據庫中所包含文獻也非中國近代所有可見文本，因此所得出的道之詞族也並不完全，但從一億兩千萬字的文本中所勾勒出的道之詞族，基本上應可涵蓋近代知識人所會使用的「道」之詞彙，因此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只是在此仍須保留有其他道之詞族未被抓取出來的可能，有待日後有更龐大的數據庫資料，便可持續增加道之詞族的內容。

綜上，本文採取一連串的數位人文方法，開始計算「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中的「道之詞族」結構，步驟如下：

(一)先以「道」為關鍵字，擷取數據庫中1830-1930年間，以「道」字為中心的前後文各10字作為數據語料(corpus)，共有154,879條，出現於32,299篇文章；

(二)接著以N-Gram技術對15萬條語料進行斷詞，¹⁹獲得一批包含「道」字的「準詞彙」(pre-filter keyword candidates)；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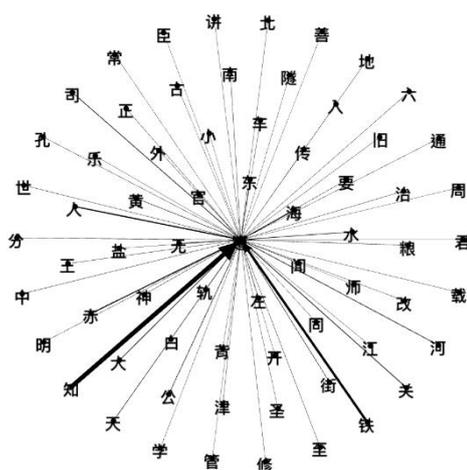
¹⁹ 關於斷詞的相關方法，可參見劉昭麟、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姚育松：〈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於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初步應用〉，見項潔主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第61-82頁。

²⁰ 「準詞彙」是指包含有意義詞彙以及無意義多字詞的候選詞彙，詳細定義可參見孫曄：〈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資料庫檢索系統〉(台北：台灣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1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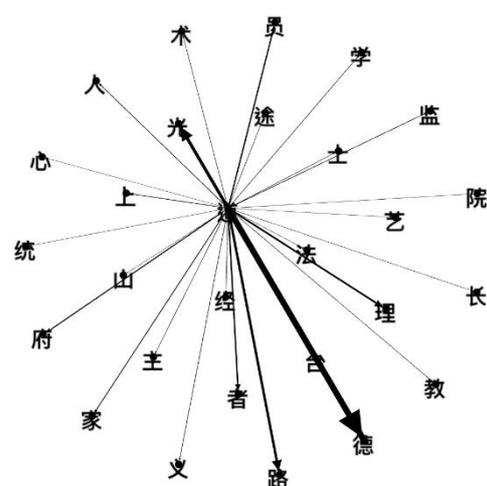
(三) 將這批「准詞彙」分為兩類，一類為以「道」字為後詞綴 (back affix) 的詞，諸如「河道」、「海道」、「赤道」、「知道」...等，一類為以「道」字為前詞綴 (Front affix) 的詞，諸如「道理」、「道德」、「道路」...等；

(四) 以這些詞在「數據庫」中出現的詞頻為依據，用可視化網絡分析工具 Gephi ²¹將「道」的前/後詞綴於近代的復合狀況，以視覺化圖像呈現出來，從圖中得以快速掌握「道」字在近代詞彙中的復合樣態，也能從中勾勒中國近代政治思想文獻中有哪些與「道」之概念相關的詞彙/概念存在。

透過上述數位人文技術，可快速宏觀的擷取出 1830 到 1930 年間，以「道」為詞綴的「道」之詞族，如下圖所示：



圖一 道的前詞綴詞族



圖二 道的後詞綴詞族

在圖一中，線越粗黑者為詞頻越高者，而根據圖一數據顯示，「道」在「數據庫」中，以「知道」、「鐵道」、「清道」、「赤道」、「河道」、「海道」、「人道」...等為大

²¹ 關於目前網絡可視化分析工具的介紹與應用，可參見梁辰、徐健：〈社會網絡可視化的技術方法與工具研究〉，《現代圖書情報技術》2012年第5期，第7-15頁，餘例不詳舉。

宗，另從圖二可見，「道德」、「道員」、「道路」、「道理」等詞彙為大宗，這些詞彙符合「道」原來具有「路」的含意。而上述這些「道之詞族」，即可很大部分代表中國近代政治精英對於「道」的理解與運用，因為這些詞族是從包含一億兩千萬字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文獻語料中計算出來的。

而從以上中國近代「道」之詞族結構中，可見「道」的多元豐富樣態。從這些道之詞族去進行綜合整體的考察，便可較為完整地呈現出「道的多元現代性」發展軌跡。由圖一及數據中可知，在「數據庫」的「道」之詞族結構中，依照使用詞頻排序，具有意義的「道之詞族」依序前三名為：人道、公道、天道，這三個「道之詞族」可以說是很大部分的代表了「道」之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再現。而要探究這三個道之詞族，首先必得先討論「天道」概念，因為「天道」乃是「人道」與「公道」的根源，此乃立基於中國傳統天人合德，人副天數的思維框架，故本文即先研究「天道」概念在中國近代的轉型變遷軌跡，觀察「天道」概念如何被近代知識人用以作為行動合理性之重要理據。本文最後也將嘗試以點帶面地，從天道概念出發初步描繪中國近代「道的多元現代性」發展圖譜。

本文將從「天道」概念發展出發，勾勒此一概念從清末到民初近百年之間的轉型變遷軌跡，進而分析中國從傳統到近代之際，「天」之概念隨著天演論的發展變化下，「天道」概念如何隨之推移變化的現象。本文將結合數位人文學的遠讀與概念史理論的精讀方法，勾勒「天道」概念在中國近代意識形態化、激進化、

黨國化、政治化、主義化、世俗化下²²所展現出的「道的多元現代性」發展過程。

二、天道概念的近代發展

王汎森曾提出措詞的升降可以推測一代人的思想，²³ John E. Schrecker 也曾透過統計《清季外交史料》中「主權」一詞出現頻度，作為認識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一個重要參數，²⁴國際中亦已有學人運用巨量資料庫中關鍵詞頻率的變化進行人文分析研究，進而發現重大文化現象的典範案例，顯示出數字人文研究有效性。²⁵過去在前數位人文時代，研究者花費很長時間以精讀方式計算措詞升降，最後給出宏觀論述。如今在數位人文時代中，研究者可借由電腦協助，快速掌握措詞升降與措詞共現 (co-occurrence) 關係，進一步透過數據變化的遠

²² 中國近代思想觀念轉型時代在總體上呈現為一種意識形態化趨勢，此趨勢發展過程正如林毓生指出，五四時期由於政治、社會、文化三重危機，故需意識形態指導人們行動方向與解決危機，因而促成五四後知識分子擁抱系統性、封閉性、道德情操訴求之意識形態。而本文認為此種意識形態化趨勢亦可從四個方面加以指稱，如許紀霖指出五四運動時呈現出的政治化、羅志田指出中國近代追求西學時的激進化、王汎森指出中國近代的主義化、金觀濤與劉青峰指出國民革命後的黨國化，這些都可看做意識形態化趨勢下的不同發展。另外中國近代還有許紀霖指出的世俗化趨勢，也與天道概念轉型變遷有關。相關討論可參見林毓生：〈五四思想意識形態化的發展過程〉，《熱烈與冷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16-117頁、許紀霖：〈五四：一場世界主義情懷的公民運動〉，見許紀霖主編：《啟蒙的遺產與反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3頁、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衝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第19頁、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第3-90頁、金觀濤、劉青峰：〈試論儒學式公共空間—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思想史研究〉，《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3頁。許紀霖：〈世俗化與超越世界的解體〉，見許紀霖主編：《世俗時代與超越精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²³ 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於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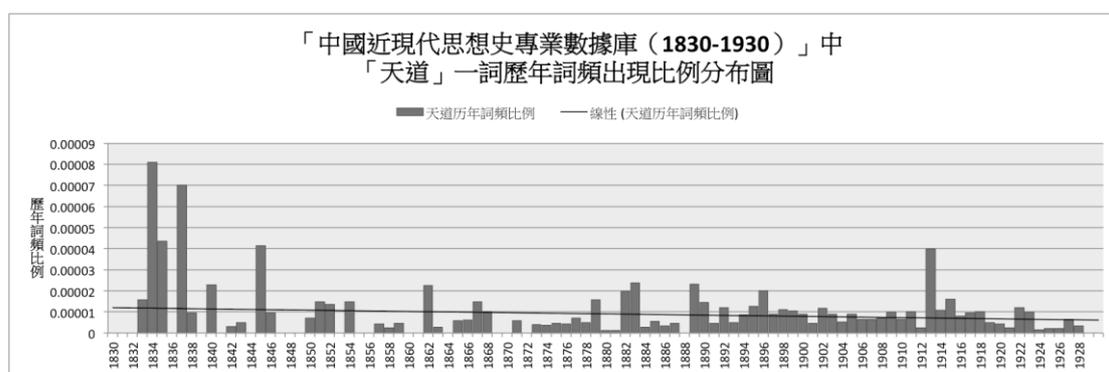
²⁴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53-254.

²⁵ Michel, Jean-Baptiste, Yuan Kui Shen, Aviva Presser Aiden, Adrian Veres, Matthew K. Gray, The Google Books Team, Joseph P. Pickett, Dale Hoiberg, Dan Clancy, Peter Norvig, Jon Orwant, Steven Pinker, Martin A. Nowak, and Erez Lieberman Aide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ulture Using Millions of Digitized Books[J]. *Science*, 2011(331).

讀，客觀科學的從變化軌跡中重探過去人文研究的議題。²⁶

而在進行數位人文研究時，必須先理解數位人文研究並非一套靜態 (static state) 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種動態 (dynamic state) 的協作研究。動態協作研究的必要性，在於數位人文研究中的數據可能存在著問題，這問題包括數據未清理乾淨，或資料收錄結構影響數據變化等，這些都會造成數據不能完全代表/反映人文世界的現象，因此必須透過數位與人文學者的動態協作，方能循環的解決/發現、發現/解決相關問題，最後得到一種最佳的觀察結果，這是在進行數位人文研究時必須具備的前理解。

誠如上述所言，所有的數據都可能存在潛在的問題，故在遠讀數據時，就必須配合精讀方法去過濾數據中的雜質，以確保數據的質量及其預測結果。以故本文先由「數據庫」的統計功能，快速的計算出「天道」一詞在中國近代百年之際，於數據庫中的使用狀況，繪製成如下圖三：



圖三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 (1830-1930)」中「天道」一詞歷年詞頻出現比例分布圖

²⁶ 關於數位人文學中電腦技術與人文研究的關係，有學者指出一個發展方向，應是利用電腦計算方法去對過去長期存在的人文議題提供新的研究視野，也就是從廣度與深度去重構人文研究。參見 Busa R. The annals of humanities computing: the indexthomisticus[J].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80, 14(2): 83-90.

從圖四數據圖示中可以掌握以下兩點信息線索：1.數據庫中主要資料為政治精英思想文獻，由此可見在政治精英世界中，天道觀念的使用如線性預測一下是逐漸下滑的趨勢，顯示出一「天道下降」的總體趨勢；2.從數據庫中「天道」一詞使用的比例升降來看，可以歸納出近代天道概念使用高峰群，分別是：1830年代、1896年左右、1913年左右。從數據庫整體數據結構中可以看出上述兩大線索，以下人文學者即憑藉著這些線索，回到文獻中，觀察是什麼樣的人物、事件、行動，促成了「天道下降」以及三個天道概念使用高峰現象的產生，就此再現出「天道」概念的轉型與變遷軌跡。

（一）甲午戰前時期的天道湧現

在圖三中，可以看見 1895 年前雖有使用「天道」一詞，但並非穩定的每年使用，呈現出斷續現象，這表示「天道」概念尚未被這個時期的知識人作為主要的訴求價值。然而，雖然尚未被重點關注，但在圖三中，可以很快的看見 1830 年代、1862 年與 1883 年這兩段時間中，即使「天道」概念整體趨勢呈現使用比例下滑曲線，但這些時間點上的使用比例都高過預測值，呈現逆勢成長。因此這提供人文研究者一條線索，可從中進一步考察其緣由，藉以揭示天道概念與行動者與社會結構間的互動關係。

1. 1830 年代：來華傳教士的天道概念

雖然 1830 年代的天道概念使用比例看起來很高，但實質上是因為數據庫在這一時間段裡收錄的文獻量相對較少，因此雖然「天道」一詞的詞頻，在 1833 年

使用 1 次、1834 年使用 4 次、1835 年使用 1 次，卻仍有較高的使用比例。從上述現象中也再次呼應前述指出，在數位人文研究中動態協作的重要性，人文學者必須了解數據內容與計算過程，如此才能掌握資料結構代表的意義，避免可能的誤讀危機。

雖然在 1830 年代「天道」一詞的用例很少，但作為中國近代早期使用「天道」概念者，仍有其歷史意義。從文獻資料中可以了解，這一時期談「天道」者，雖有中國人，如戶科給事中黃爵茲〈綜核名實疏[道光十四年]〉(1834)一文中，向皇帝提出建議事項，其中包括：「臣聞古帝王之道統曰治法，曰心法，而貫之以誠，以人道之思，誠符天道之至誠，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²⁷由這可見，作者把人事與天道結合，認為民安則天順，這反映的是中國傳統中天道人事相貫通的思維慣例。而除了這一則外，在 1830 年代之際談「天道」概念者，就主要是來華傳教士愛漢者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其以「天道」概念為中介，目的是進一步媒合中西的「天道」概念，達到其傳教的目的。²⁸

如愛漢者在〈道光癸巳年六月. 漢土帝王歷代〉(1833)文中指出，少昊金天

²⁷ 戶科給事中黃爵茲：〈綜核名實疏[道光十四年]〉(1834)，見王延熙、王樹敏輯：《皇清道咸同光奏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自光緒壬寅年(1902)上海久敬齋石印本)，卷一 治法類通論，第79頁。

²⁸ 周振鶴指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1833-1838)相對於最早的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來說，已經從宗教性轉向世俗性雜誌，全面的介紹西方各國歷史、地理、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雖有宗教內容，卻不佔重要份量。本文認為雖然不佔分量，但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即愛漢者)作為傳教士，其辦刊主要目的雖然更多是希望讓中國人知道西方非蠻夷之邦，想要透過介紹西方知識對中國進行知識啟蒙，但宗教乃是西方知識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該刊的知識啟蒙中仍具有福音內容，正是如此郭氏的天道概念仍是以上帝作為天道的意志來源。關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內容，參見周振鶴：〈中國本土最早的中文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人白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8-31，餘例不詳舉。

氏所以開始衰敗，九黎亂德，乃是人君失德所致，文曰：「雖天道小變之漸，亦人君失德致之也。」²⁹由這可見，「天道」是指一種自然的、正常的秩序，而不自然的、非常的現象，即是「天道之變」，這來自於「天道恆常」的思維慣例。由上顯示即使傳教士是以「上帝」為「天道」之「天」，與中國傳統以「自然天」為「天」的思想不同，³⁰但同為「天道」，都具有「恆常」的共性，正是在「天道恆常」的共通特點上，使得中西「天道」概念有融合的可能與途徑。

而傳教士以「上帝」作為「天道」概念中的「天」，顯見於如下的幾則文獻，如愛漢者在〈道光乙未年六月·亞伯拉罕之子孫〉(1835)中以亞伯拉罕之子孫與上帝的故事為主，指出《聖經》一書裡詳細記錄此事，乃是「顯著天綱，天道福善禍淫矣」，因為「約色弗全心恃皇上帝，故恆保護，秉心貞靜，敬畏上帝，雖必湏下監，終不懷怨，止凜遵天誠律，故此皇上帝加爵舉位，以僕為大臣焉。」由這可見，愛漢者「天道」概念中的「天」，乃是西方「上帝」，而「天道」就是西方上帝之道，這樣的「道」之內涵，如文中所言：「約色弗富而不驕，貴而不慢，執守如舜之德，奚取於修焉。」³¹愛漢者的「天道」概念實質內涵指涉仍是修「富而不驕，貴而不慢」之德。雖然愛漢者對於「天」的認識與中國不同，中國修德

²⁹ 愛漢者：〈道光癸巳年六月〉(1833)，見《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影印本)，第4頁。

³⁰ 中國傳統古代典籍中的「天」的概念可大概歸納為兩類：自然天與人格天。勞思光指出在《詩》、《書》中大部分的「天」都是「人格天」型態，為較原始的思想；而在稍晚出現的天道概念中就已經轉為「形上天」，而這「形上天」乃是由具有運行法則與理序，顯示出超經驗之規律的「自然天」而來。本文認為中國傳統中絕大部分時期的「天道」概念所指皆為「自然天/形上天」，代表的是一種自然的常道秩序。關於中國傳統「天」的概念類型，可參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80-82、91-100。

³¹ 愛漢者：〈道光乙未年六月〉(1835)，《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第182頁。

的天道根據是自然天，西方是人格天，³²但對於「道」的認識則是相同的，同為「修德」。

傳教士在 1830 年代運用天道論述實有其進行社會控制的目的，如以「天道」作為禁止吸鴉片的宗教律令，像是愛漢者在〈道光丁酉年四月. 奏為鴉片〉(1837)中指出：「余首此，自覺鴉片流弊之惡，不可盡言。……禁令既不絕之，章程既不斷之，必尋他方法，以盡絕根株。莫若多講善言，勸人善行，教人以善守志，樂道，且廣布耶穌之天道，除此外無他方法」³³由這可見，傳教士論述中的「天道」概念具有實際作用，作為宗教律令可具有警惕效果。又如運用「天道」概念去規訓君王與令百姓修德，這與中國漢代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規訓君王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愛漢者在〈道光戊戌年三月. 地震略說〉(1838)指出地震成因是因為「上帝之義怒」，而作為上帝之義的天道最忌滿盈，文中指出：「天道最忌滿盈，禍福每相隱伏」³⁴地震的成因是因為世人殘惡，自取咎戾，因此而有地震，然而只要虔誠侍奉上帝，就能轉禍為福。以上數例都呈顯出來華傳教士天道論述之目的，是希望以宗教冥律達到社會控制的實質作用。

³² 愛漢者視「天道」之「天」為上帝，出自於其大部分的天道論述中，如〈道光丁酉年正月. 日長短〉(1837)雖談天文中的太陽出現時間長短問題，但卻扣合到上帝，文中指出「太陽之旋轉，地之輪周，晝夜之長短，皆依神主之政，一瞬間也不可離矣。故侍至上帝之天道，專心靠之、敬之、信之、自然必如意，獲大展焉。」由這可見，「天道」秩序乃是上帝的意志，故呈現出西方「天道」概念的人格天特性。又如愛漢者在〈道光丁酉年二月. 五印度國〉(1837)談到五印度國時，指出從英國成為印度殖民國後，就把印度帶入佳境，文言：「耶穌之門生自英國來，以天道傳其國，教民以天道殫心勉勵，輓流俗而臻於善，望依上帝，能自拔於流俗，悟改其非矣，其異端漸廢，正教靡不蒸蒸日上矣。」由這可見，傳教士論述中的「天道」，即為上帝之天道概念。再如愛漢者在〈道光丁酉年六月. 天綱〉(1837)一文談及天綱，指出上帝治事，括全於天綱，然後人們頑蠢，以人去思量天道，文言：「蓋上帝治世自主，專治生各人事，而括全於天綱。惟此世事，令我驚奇無已，總事不齊，世人頑蠢，不會其源，故非仰上帝知慧見，瞎然度天道以人量也，且自牽累罪戾。」由這可見，傳教士的天道概念乃是上帝之人格天的天道觀。以上參見愛漢者：〈道光丁酉年正月〉(1837)，《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第 194 頁；愛漢者：〈道光丁酉年二月〉(1837)，《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第 206 頁；愛漢者：〈道光丁酉年六月〉(1837)，《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第 245 頁。

³³ 愛漢者：〈道光丁酉年四月〉(1837)，《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第 228 頁。

³⁴ 愛漢者：〈道光戊戌年三月〉(1838)，《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第 346 頁。

綜上可歸納來華傳教士與中國傳統天道概念的異同。相異處在於「天」的意涵上，中國為自然天，西方為人格天；相同處在「道」的意涵上，皆同具秩序、恆常、修德之義。西方傳教士正是以共通點為中介，達到其抽換中國自然天為西方上帝人格天的目的，這正是來華傳教士天道論述的作用所在。

2. 1860 年代後：經世思潮中的天道概念

在 1860 年後「天道」概念主要出於朝廷大臣奏議與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的言論中，雖然兩者身分有異，時間上也有落差，但都同樣呈現出經世思潮下的天道概念，表現出傳統的天道與人事相貫通的思維慣例。

如在朝廷大臣奏議部分，像是黎庶昌〈應 詔陳言疏[同治元年]〉(1862)文中提到當時出現星變，因此皇帝詔書希望大家能夠陳言進諫，卻沒人陳言，因此黎庶昌就應詔陳言。而在陳言之前，為了鋪陳自己陳言的必要性與正當性，黎庶昌以中國傳統天道人事相貫通理論為據，其言：「聞天道福善而禍淫，氣和則致祥氣，乖則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黎氏認為當時的星變正詔示著人事將有異動，其以古代《春秋》經作為舉例，指出「聖人因天道以警人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星隕，山崩川竭，螟蛉旱潦，雨雪冥晦之屬，無一不備，書以明天道之至嚴而可畏，不可以纖小忽也。」這黎氏不斷強化中國古代天道人事相貫通的理論，目的就是說明當前的災異正是對皇帝的一種示警，故言「自 陛下即位以來才期年耳，上年冬地震，金州雨雪不作，今正月日三暈，二月星變，春夏之際，陰霾晝晦者，數大風揚沙塞河，河北旱蝗

間起，陝甘大水漂沒....」³⁵這些言論是為了說明自己接下來所進諫的言論乃是為回應天道所出，可使得後來的諫言具有正當性與必然性，此為奏議文中「天道」論述的功能。

另外再如蔣琦齡在〈上中興十二策疏〉(1862)中提到一則，主張朝廷與天下臣民應能信息相通，以誠相見，一改過去行為，除兵機所關不宜預洩外，讓所有朝廷命令都能發鈔，這樣就能讓懷忠抱義之士隨時以言論對政策補缺拾遺，這即是「改過以應天道」，「天道」乃是上下以誠相見，故蔣氏主張應一改過去信息不能通達之結構。³⁶由上可見，在奏議文中，大臣都是以「天道」作為自身建言正當合理性的根據與來源，此一論述方式雖然來自於傳統以天諫君的傳統，但在1860年代則有其時代意義。當時中國內外語境如韓承樞指出，外有社會危機與外力入侵，內有因危機感驅使而產生窮則變通之精神，在內外交織下才有了收集奏議文書的經世文編系列書籍產生。³⁷正因處於內外雙重動力的語境下，使得經世文編類型的書籍帶有更強的實用性，而其中的「天道」概念即不同於傳統以天道去呼籲君主進行內聖修身，而更希望以天道去驅動與合法化外王的洋務自強運動，因此在此在1860年代的天道概念具有更強烈的外王傾向，此為這一時期朝廷大臣奏議

³⁵ 黎庶昌：〈應 詔陳言疏[同治元年]〉(1862)，見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自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本)，卷十三 治體六 治法中，第1480頁。

³⁶ [前順天府府尹]蔣琦齡：〈應 詔上中興十二策疏[同治元年]〉(1862)，見武進盛康旭人輯：《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卷十三治體六治法中，第1918頁。

³⁷ 韓承樞：〈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史原》2011年第2期，第224頁。

中的「天道」概念的時代特徵。³⁸

而 1880 年代仍在自強運動的經世思潮中，因此天道概念仍與經世思想緊密連結。如圖三所示，1883 年之際有一高於預測值的小高峰。³⁹在精讀該年文本後，得知其主要是集中在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王韜（1828-1897）的《弢園文錄外編》中。歸納王氏的天道概念可分為兩大部分：其一為在「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論」下的天道概念，如〈洋務上〉（1883）一文中以「天道循環，人事變遷」去論證洋務運動中「變」的正當性；⁴⁰其二為「天道人事相貫通論」，如在〈慎用兵〉（1883）

³⁸ 另外還想提出的是，雖然上述兩篇文章是出自於 1860 年代，但卻是收入於 1897 年刊行的《皇朝經世文編續編》中，表示這兩篇以天道概念推動變法改革的論述，為甲午戰後的知識人所接受，並且被挪用。《皇朝經世文編續編》的出現有其脈絡，來自於如劉廣京、周啓榮（1986）指出，經世之學在鴉片戰後，成為中國近代追求變法時的先驅。而晚清的經世思想自有源流，如 Chang Hao（1974）指出自宋明開始就有經世思想出現，並且可以歸納為「修身/經世」二元系統。黃克武（1985）指出由賀長齡（1785-1848）主持，魏源（1794-1857）編纂，於道光六年（1826）刊行，經由兩人篩選後而彙集成書的《皇朝經世文編》具有轉化與調適思想，因此傾向理想與現實並重。而《皇朝經世文編》的重要性如龔來國（2004）指出，本為海運南漕的政策辯護，後來政策獲得成功，《皇朝經世文編》就成為改革必要性與可行性的論證根據。而後在洋務時期則出現了《皇朝經世文編續編》，由盛宣懷（1844-1916）之父盛康（1824-1902）所編，其追慕賀編《皇朝經世文編》，延請謬荃孫、汪洵校定，編成 120 卷，收文 2085 篇，續選道、咸、同、光四朝論議文章，於 1897 年由武進盛氏思補樓刊出。楊立人（1990）指出雖然盛編的《皇朝經世文編續編》繼承了清初經世思想，但還是比較模糊與矛盾，因為盛編成於 1897 年，正是在甲午戰敗後，康梁維新思想湧現之際，但盛編卻並未採用改良派議論文，顯見其思想保守落後一面。但即使相對較為落後，如沈艷（2004）指出，洋務時期的續編已融入了洋務、西學思想，並且呈現為傳統經世實學自我調適以完成現代轉化的傾向，因此「中學」仍是主體，「西學」只是依循需要而被借用，強化中學主體的實用性。以上討論參見劉廣京、周啓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5 期，1986 年 6 月，第 33-99 頁、Chang Hao, "On the Ching-Shih Ideal in Neo-Confucianism," *Ch'ing-shih wen-t' i* 3, no. 1 (Nov., 1974), pp. 36-61、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 年）、楊立人：〈經世文續編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第 68-86 頁、沈艷：〈近代「經世文編」廣續潮流述論〉，《史學月刊》2004 年第 3 期，第 108-115 頁。

³⁹ 通常超過預測值的年代，皆為知識分子高度使用的年代，或為引入新觀念，或伴隨某一事件而興起，然後這都是較為短期的湧現發展，而非固定的普遍使用現象。

⁴⁰ 王韜：〈洋務上〉，《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卷 2，第 25-27 頁。基本上除了王韜之外，如郭嵩燾與薛福成等人也在中西開通下，有了從「天下一道」轉向「天道有二」的想法。如章清指出中國人由於守護普遍歷史，故主張「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豈有二哉」，然在中西開通下，像郭嵩燾與薛福成等人，就不得不接受「天道有二」的思想。參見章清：〈晚清「天下萬國」與「普遍歷史」理念的浮現及其意義〉，《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6 年 4 月號，第 60 頁。

中挪用「非惟人事，抑亦天道」⁴¹的論述去談不宜輕易用兵，這不僅是人事問題，且是天道，正如「夫古今來好大喜功之主，每思窮兵黷武，而弗戢自焚，必至顛覆。」由這可見王韜用天道概念作為理據去威嚇君主不宜用兵。

而王韜在〈答強弱論〉(1883)一文中，還集中使用「天道」概念綜論時事，如從天道人事相貫通關係談天道概念時指出：「天道大明，人事大備」、「准諸天道，揆諸人事」、「天道變於上，則人事不得不變於下」、「天道與時消息，人事與時變」等，⁴²以上這些天道論述都透顯出王韜運用「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的理論去論證「變」的正當性，而「天道」在此之際即成為「變」之正當性理據。⁴³當然王韜的「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理論是一種選擇性結果，因為「天道」實有「變」與「不變」兩面，王韜為一贊成自強變法者，自然選擇性的淡化天道不變的色彩，突出強調天道循環變遷的一面。

綜上可見，在1861-1895年自強運動階段，於經世實學思潮之中，配合時代內外語境需求，「天道」概念有其自身特色，雖然繼承了傳統中國天道人事相貫通的思想，但也別具兩個特點：其一，特別著重「外王」的特色，「天道」概念論述中呈現出濃厚的經世意圖；其二，與來華傳教士強調「天道恆常」不同，受到晚清變局觀興起的影響，⁴⁴轉向「天道循環」。由上可見「天道」概念受自強運動中

⁴¹ 王韜：〈慎用兵〉，《張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卷3，第64-66頁。

⁴² 王韜：〈答強弱論〉，《張園文錄外編》，卷7，第166-169頁。

⁴³ 中國近代「變」的觀念與進化主義具有比附關係，因此談「變」基本上都與進化主義有關。而在中國傳統中「變」的必要性來自於「天道」，則當變與進化主義結合時，「天道」也自然成為進化主義的必要性來源。關於變/進化主義和天道概念的關係，可參見王中江：〈第三章 在天道與人道之間：中國進化主義的誕生〉、〈第四章 進化主義與漸進「變法」思想〉，《進化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一個新的全能式世界觀：增補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餘例不詳舉。

⁴⁴ 參見孫邦華：〈西潮衝擊下晚清士大夫的變局觀〉，《二十一世紀》2001年6月號，第52-62頁。

經世實學思潮的影響而產生了概念轉型。歸結 1861 至 1895 年甲午戰前的天道論述類型如下表所示：

表一：甲午戰前時期「天道」論述類型列表

類型	序號	甲午戰前時期「天道」論述類型	以
連續性繼承/轉化	1	天道人事相貫通論	上
非連續性創新	1	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論	即
	2	天道為上帝之道論	為

甲

甲午戰前「天道」概念在自強運動的經世實學思潮中的建構與再現。

(二) 甲午戰後時期的天道湧現

在比較數位人文研究/過去傳統人文研究之不同點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差異即：問題意識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的來源不同。在數位人文研究過程中問題意識並非由人工驅動 (hand-driven)，而是由數據驅動 (data-driven)。而人工與數據驅動最大的不同，即在於數據驅動不會受到研究者主觀立場影響，即其問題意識的來源並非依靠研究者人文的先設理解，而是來自於數據的自然與客觀呈現。在上述歧異之下，伴隨著不同問題意識，自然會形成不同的考察取徑、立場、角度，進而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與敘事方式。在數位人文研究方法脈絡下，過去的人文敘事將轉化為數位敘事 (digital storytelling)，即一套結合數據線索 (clue) 與人工分析的新型敘事型態 (new-narrative shape)，透過這樣的新型敘事型態，便得以提供/重構出一種新的人文研究範式 (Paradigm)。

在圖三中可見 1895 年後「天道」一詞的使用比例，在大趨勢上呈現為向下發展，但與前期相比，可見已經呈現為每年穩定使用，且大部分略高於預測值的狀態，這表示「天道」概念在 1895 年後為中國近代知識人所注意與使用。那麼，人文研究者就可進一步根據圖三的長時段宏觀數據線索，提出一個新的問題意識，即：其一，為何在 1895 年自強運動結束，甲午戰爭之後，「天道」一詞的使用比例會有連續使用的穩定發展現象，其原因為何？其二，甲午戰後的天道概念與自強運動時期的天道概念有何差異？

上述兩點問題意識在人文驅動中是較難提出的，因為即使人文研究者關注到 1895 年後天道論述語料變多，應當有知識人特別關注的現象，但卻會因為未置放於長時段 (longue durée)⁴⁵ 中進行審視，因此難以甚至無法去意識與客觀證明確實有上述趨勢，自然也無法凸顯出甲午戰後「天道」概念發展與時代語境互動的重要性；然在數據驅動下，1895 年甲午戰爭對天道概念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能被標舉出來，這就是數位人文研究與過去不同之處。

從上述數據驅動下所產生的問題意識出發，人文學者接著可從 1895 年後討論天道概念的文章中，去精讀/過濾語料，進而得出人文觀察，在這之後會有兩個結果：其一，根據語料精讀後獲得解答；其二，發現數據中存在著錯誤，而若是發現數據錯誤，則人文學者便可進一步的修正與調整人文考察結果，這樣循環協

⁴⁵ 近代歷史研究者已有逐漸回歸長時段研究的主張出現，尤其伴隨著全球史研究的發展下，如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David Armitage 即在 *The History Manifesto* 一書中指出歷史研究應放眼全球、回歸長時段，同時主張歷史學家應該要善用大數據統計工具和可視化工具去進行長時段歷史研究，由這可見數位人文研究的前瞻性。見 Jo Guldi,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作正是數位人文研究兼具宏觀與微觀、遠讀與精讀下，可補強因為受到數據潛在錯誤而致使得出有問題之人文結論之缺陷，這正是數位與人文協作研究的長處與必要性所在。

當要進入 1895 年後天道概念考察時，可以鎖定一重要年代作為主要考察時間點。其中 1898 年為戊戌變法的重要時間點，觀察此年中的天道論述當具有代表性，因此以下本文就以 1898 年的天道論述為例，用來歸納甲午戰後天道概念的內涵與結構。綜觀 1898 年的天道論述，明顯可見此年不似自強運動時期大部分集中於某些人的奏議文章，或是王韜一人文章之上，由這可見天道論述在甲午戰後的重要性更勝於自強運動時期，因為天道論述更為普遍的為時人所運用。至於為何重要性會提昇？可以進一步從 1898 年之際天道論述加以考察。閱讀並歸納甲午戰後的天道論述，可總結為以下兩個框架，其中與自強運動時期天道概念類型間的關係計有兩種：一為連續性繼承/轉化類型，二為非連續性的創新類型。

在連續性繼承/轉化部分，如其一，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框架，如〈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折〉提：「樞譯大臣，近支王公，公卿督撫，皆當日夜講求，至明至盡，令曉然於天道之變，古今之殊，無泥古自驕，無拘墟自惑。或令遊歷外國，博地球之大觀，使知變或可存，不變則削，全變乃存，小變仍削，深通其故，顯豁無疑，而後推行新政，可無滯礙，奉宣德意，勇猛敷施也。」⁴⁶由這可見「變」的概念與「天道」概念結合，其目的是想透過「天道」概念去賦予「變法」正當

⁴⁶ 宋伯魯：〈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折〉，收於中國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3-5頁。

性。而在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概念類型下，還有人進一步提出天道之變乃漸變而非激變的主張，如唐才常〈各國政教公理總論〉提「弦太急則折，鼓太厲則裂，殆天道歟？然使歐洲知民心之宜順，律法之宜更，政教之宜因時變通，說者謂其構極大亂象，實辟極大治機，然哉然哉！」⁴⁷這裡可見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的概念類型，在甲午戰後，是伴隨著戊戌變法而起，而在戊戌階段中，唐才常處在相對保守立場下，主張漸進變法，故將漸進與激進變法的討論帶入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的概念類型之中，這屬於連續性轉化現象。

其二，天道人事相貫通類型，康有為在〈孔子為制法之王考〉一文中提到：「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為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⁴⁸或〈長興學記〉提到：「義者人事之宜，理者天道之條，本於天，成於勢，積於人，故有天命之理，有人立之義。」⁴⁹以上這些都與自強運動時期天道人事相貫通類型相同。然在甲午戰後階段，因為西方思想進入中國，因此天道人事相貫通類型具有了連續性轉化論述，如唐才常〈公法通義〉中提到：「今夫《春秋》，上本天道，為性法出於上帝之源；中用王法，為例法出於條約之源」。⁵⁰這裡唐氏以天道對應性法（即西方自然法），即是以天道至善去會通西方自然法，這裡雖挪用天道人事

⁴⁷ 唐才常：〈各國政教公理總論〉，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劉泱泱審訂：《唐才常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2-50頁。

⁴⁸ 南海康有為廣廈撰：〈孔子為制法之王考〉，《孔子改制考》，卷8，收於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集，第100-111頁。

⁴⁹ 葉德輝：〈葉吏部長興學記駁義〉，見蘇輿編，楊菁校，蔡長林、蔣秋華校訂：《翼教叢編》（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5年），第237頁。

⁵⁰ 唐才常：〈公法通義〉，《覺顛冥齋內言》，卷2，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劉泱泱審訂：《唐才常集（增訂本）》，第95-130頁。

相貫通類型，但卻加入了《萬國公法》與西方上帝、自然法等觀念去會通與豐富天道概念，自此天道概念在中國知識倉庫 (stock of knowledge)⁵¹中多了性法 (即自然法)⁵²內涵，而在西方知識倉庫中則有多了中國天道概念內涵，此為天道人事相貫通類型的連續性轉化論述。有趣的是，唐才常運用「天道」概念比附西方自然法，乃是基於中國宋明理學而來，如楊儒賓即曾指出理學論述中的自然概念裡，包含著天道內涵，由此可見其互通之可能。⁵³以上是 1898 年甲午戰後的戊戌變法時期與自強運動時期天道概念的連續性繼承與轉化現象。

而在天道概念的非連續性創新類型部分，包括：其一，天道至善類型，如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五書〉提「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為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於性，而不知性實出於善」，⁵⁴這裡是透過天道至善來論證人性亦善的主張。

其二，天道尚圓類型，如康有為〈長興學記〉提到：「節者，假借於竹，有所節止之謂。天道尚圓，人道尚方，圓首以為智，方足以為行；不圓則不能備物理，不方則不能立人道。」⁵⁵康有為在天道概念中匯入尚圓內涵，與其「漸進變法」思想相互應，因為「圓」必是漸進而不會是激進，天道尚圓即可為康有為論證保皇

⁵¹ 關於此一概念，詳參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第 16 卷第 3 期 (2005 年 9 月)，第 137-170 頁。

⁵² 晚清士大夫從「性法」一詞中不是想到上帝與基督教精神，而是中國的天道觀念，因此以天道概念去比附西方的自然法 (即「性法」)，以中國天理之自然的天道概念作為西方《萬國公法》理據來源。參見王中江：〈近代中國「自然」觀念的誕生〉，收入方維規主編：《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10 頁。

⁵³ 見楊儒賓：〈理學論述的「自然」概念〉，《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09 年第 2 期，第 17-34 頁。

⁵⁴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五書〉，收於蘇輿編，楊菁校，蔡長林、蔣秋華校訂：《翼教叢編》，第 30 頁。

⁵⁵ 葉德輝：〈葉吏部長興學記駁義〉，見蘇輿編，楊菁校，蔡長林、蔣秋華校訂：《翼教叢編》，第 221 頁。

派漸進改革的正當性，因之形成了「天道尚圓」此一創新論述。

其三，天道即文明與公道類型，如梁啟超〈佳人奇遇〉提到：「如我國德川氏之末路，倡鎖港者阻文明而背天道，論攘夷者說決不可行。」⁵⁶又如日本前內務大臣伯爵板垣來稿〈論歐人欺侮異種為不合公理〉提到：「有一言以告歐人，夫天道無私，公道不可誣。」⁵⁷在梁啟超部分是將當時盛行的文明論與愛國之國族主義思想⁵⁸匯入天道論述中，以天道概念作為追求文明與國族主義的正當性理據；而在板垣部分則是匯入了當時公道思想於天道論述中，這是受到當時公私觀念⁵⁹影響所形成的創新論述。

其四，天道喜強新惡弱舊類型，如南海陳繼儼〈論中國今日聯歐亞各國不如聯美國之善〔續四十一冊〕〉提到：「明其政刑，大國必畏，天道喜強而惡弱。」⁶⁰又如梁啟超〈經世文新編序〉提到：「新者強，守舊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⁶¹基本上「天道喜強新惡弱舊類型」是受到當時天演進化論下的尚力思潮⁶²與新的

⁵⁶ 東海散士：〈佳人奇遇〉，卷 10，《清議報》第 30 冊，1899 年 10 月 15 日。

⁵⁷ 日本前內務大臣伯爵板垣來稿：〈論歐人欺侮異種為不合公理〉，《知新報》第 58 冊，1898 年 7 月 9 日。

⁵⁸ 沙培德曾指出國家觀念與文明觀念密切相關，因為西方心中理想國家是進化、理性、教化而文明的，由這可見文明與民族國家主義與天道概念合流，自有其當時歷史語境與敘述脈絡，相關討論可參見沙培德：〈清末的國家觀：君權、民權與正當性〉，見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第 367-388 頁；方維規：〈近現代中國「文明」、「文化」觀的嬗變〉，《史林》1999 年第 4 期，第 69-83 頁，餘例不詳舉。

⁵⁹ 中國近代之際「公」的概念成為文明的象徵，諸如公理、公法、公道等成為新的價值根源。關於中國公私觀念以及中國近代公私觀念的發展，可參見黃克武：〈從追求正道到認同國族：明末至清末中國公私觀念的重整〉，收於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第 59-112 頁，餘例不詳舉。

⁶⁰ 南海陳繼儼：〈論中國今日聯歐亞各國不如聯美國之善〔續四十一冊〕〉，《知新報》第 42 冊，1898 年 1 月 3 日。

⁶¹ 梁啟超：〈經世文新編序〉，《時務報》第 55 冊，1898 年 3 月 22 日。

⁶² 郭國燦：〈近代尚力思潮述論〉，《二十一世紀》總 11 期，1992 年 6 月，第 24-33 頁。

崇拜影響所致，所以使得「天道」概念具備了「好新」與「好強」的特質，而與傳統以儒家仁義禮智聖為天道的特質不同。⁶³

其六，天道養民類型，這是與當時重商思想合流，⁶⁴故以天道論證商學的重要性，如李鈞鼎〈商學〔以公司興水利〕(續)〉提到：「心，天心也，養民之道，天道也，富國莫要於養民」⁶⁵。其七，天道無用類型，如餘杭章炳麟〈蒙古盛衰論〉提：「蒙古嘗以異類噬中國，中國復噬之，何損於義？奉招搖之耀，誅淫昏之裔，攘除確特之族，以其壤地為郡縣，而練士卒以處其險阻。若昔之改土司為流官者，何損於義？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嗚呼！吾於是知其無天道也，凡事之鑿於人心，與不鑿於人心，而出於自然之度者，則不得已而謚之曰天道也。」

⁶⁶由上可見章太炎的天道無用論述，乃是從其對「人」之肯定，以及對天道應循環報施卻未見其果的懷疑下所產生，這裡就揭示初時至 1898 年就已出現對「道的失能」⁶⁷的懷疑，也預示著「天道」概念必須被進行重構，方能重新產生作用。而

⁶³ 誠如許紀霖指出近代中國有從以天命、天道、天理為中心的儒家德性秩序之天下，轉移到以「力」為中心的生存競爭物理世界的世界觀轉變過程，其中伴隨著價值尺度由「仁義禮智的大同理想」到「去理想的生存競爭」的價值觀轉變，而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觀念，就在「擺脫天下大同的傳統烏托邦，成為『世界的國家』」之冷酷世界氛圍中產生。參見許紀霖：〈五四：一場世界主義情懷的公民運動〉，收於許紀霖主編：《啟蒙的遺產與反思（第九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9頁。而關於傳統天道觀內涵為儒家仁義禮智聖五行的研究，可參見涂艷秋：〈戰國中期儒家「仁義禮智」內涵的轉變〉，《興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9年6月），第137-164頁。

⁶⁴ 關於中國近代重商主義的發展，可參見馬敏：《商人精神的嬗變：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商人觀念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餘例不詳舉。

⁶⁵ 李鈞鼎：〈商學〔以公司興水利〕(續)〉，《湘學新報（湘學報）》，1898年7月29日。

⁶⁶ 餘杭章炳麟撰：〈蒙古盛衰論〉，《昌言報》第9冊，1898年11月9日。

⁶⁷ 中國傳統中即有天道報施的思想，認為天道應賞善罰惡，這是天道人事相貫通論下的一種天道概念，這其中涉及到中國人的「報」的思想，一旦天道未能循環報施的現象越多，則自然會令人們開始懷疑天道失能，最終若天道仍未能滿足人們的法感（the Sense of Justice），便終將形成天道無用論，以「新道」取代「舊道」。本文認為中國近代知識人正是因為感受到「道的失能」，因此才有追求西法的訴求出現。關於中國人的「報」的思想研究，可參見楊聯陞著 段昌國譯：〈報—中國社會關係的一個基礎〉，《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臺北：聯經，1976年），第349-372頁。

歸結甲午戰後的戊戌變法時期天道論述類型如下表所示：

表二：甲午戰後時期「天道」論述類型列表

類型	序號	甲午戰後時期「天道」論述類型
連續性繼承/轉化	1	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論
	2	天道人事相貫通論
非連續性創新	1	天道至善論
	2	天道尚圓論
	3	天道即文明與公道論
	4	天道喜強新惡弱舊論
	5	天道養民論
	6	天道無用論

由上可見在甲午戰後時期受到天演進化論、尚力思想、新的崇拜、重商思想，乃至於諸多不符人們對天道仁義認知之事件的出現，逐漸產生「道的無用論」以及「道的失能」現象，這使得天道概念中的內涵，從濟弱扶傾，懲善罰惡，逐漸轉移成競爭進化、尚力追新，而在「天道」概念內涵被抽換後，天道論述就有了更多元的創新發展，而這些創新論述正是天道概念與時俱進的展現，再現出屬於這一時期知識人的關懷與時代特徵。

(三) 庚子事變後時期的天道湧現

庚子事變作為中國近代重大世變具有深刻的歷史意涵，學者指出甲午戰爭失敗，代表著三十年自強運動的失能，而庚子事變的失敗，則代表著維新變法的失

能，這就促使中國近代知識人真切明白到中國傳統學問無法救亡，必須轉向學習西方，這導致了中國天下觀瓦解，西方民族國家概念興起。⁶⁸而正是在上述時空語境下，天道概念也與近代西方民族國家敘事連結，再現出屬於這個時期的天道論述。從圖三中可以看見在 1902 年「天道」一詞的詞頻比例遠高於預測值，這表示這一年有一波「天道論述」出現，⁶⁹這一波天道論述與戊戌變法時期有何不同？同樣可以 1902 年的文章為代表找到答案，因為 1902 年正是立憲派重要雜誌《新民叢報》創刊年，這一年的天道論述，當可視為引起後續天道論述的總綱。

在庚子事變之後，天道概念與戊戌變法時期比較亦有部分的連續性繼承/轉化與非連續性創新論述類型產生。在連續性繼承/轉化部份包括：其一，天道喜強新惡弱舊論述類型，如〈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提到：「今外人滅國之後，施奴隸教育以束縛之，練土人為兵以壓制之，即有愛國之士欲圖自立者，而外人恃其輪船鐵路電信之便，平亂之兵朝發夕至，十九世紀之亡國者眾矣，吾未見其能自立也。天道無親，惟祐強者，時勢既去，雖灑盡志士仁人之血，而亦無可如

⁶⁸ 庚子事變對於當時中國人的心理層面影響，正如金觀濤與劉青峰指出，甲午戰敗後代表著以儒學意識形態為主軸的自強運動失敗，因此儒學意識形態不能不變，所以展開了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即維新變法。但維新變法後，迎來的卻是 1900 年庚子事變的失敗，這代表維新變法失敗，自此就真正的對儒家意識形態全盤否定，使得自甲午戰後開始湧現的「內部價值逆反」浪潮真正狂飆，自庚子事變後開始全面的學習西方。至於對於中國傳統的失能的懷疑，而後轉向學習西方的趨勢，可以陳旭麓指出庚子事變前後，有一明顯的精神變化現象為證據，其指出在庚子事變後慈禧表現出對西人的奴顏和諛態，士大夫群體與百姓也改變態度，像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提到民初北京包車夫曾是義和團，但到民國初年已經是熱心天主教徒，家裡還供有耶穌與聖母像，每早虔誠禱告，問其改信宗教原因，他說外國人菩薩靈，中國菩薩不靈。相關討論參見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和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271 頁、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12-213 頁。

⁶⁹ 1903 年時候〈黃人世界〉小說中有主角名史折天，在小說中出現噪音「史折天道...」，所以此年「天道」也有噪音詞存在。

何矣，豈非亡國之明鑒耶。」⁷⁰由上可見表現出了當時基於「唯力論/強權主義」下的天道概念。⁷¹

其二，天道無用論述類型，與戊戌思潮時期一樣都是起自於對「個人/我」的肯定，如〈尊我篇〉提到：「夫我之時代，我之位置，其足以成就事業也，既如彼我之種族，其足以左右世界也，又若此我之為我，誠獨立於人世上，特別之優點也，我之尊我，亦無所謂身世外錙銖之過分也，然而席天地之利者，不可缺人力，望後日之果者，必須種前因，不見首啟文明之埃及，已降為被保護國乎，不見富於天然之印度，已淪為英領地乎，天道靡定，視我自為，人事奚常，惟我自處。」

⁷²這種天道無用論述類型意味著一種價值逆反，具有革命性，即天道難測故而無用，不能倚仗，唯一能確定，能依靠的就是「我」。這裡基本上是以個人主義/私/個體對於當時國家主義/公/集體的逆反，而產生「天道靡定，視我自為」的想法。

這樣的「天道無用論」，更明顯的如〈革天〉一文，從對「天」的懷疑出發並進一步去進行辯證，文中指出：「其實人之所避之罪惡，驗之冥冥之罰施，人之所具之希望，驗之冥冥之左右，而皆無相當之處，則墮人道之功修，長虛無之偽習，不可以不察也。由是而談，則崇尚不可知之天道，而沮敗當前即是之人道，天何言哉，則言天者不得辭其咎也。」⁷³由這可見當時具有「捨天從人」的思想，而這

⁷⁰ * :〈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湖北學生界》第3期·1903年3月29日。

⁷¹ 王中江曾指出清末民初中國認知與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有一論式即是基於「正義/公理主義」，另一論式即基於「唯力論/強權主義」，而天道喜強新惡弱舊論即是在後者基礎上所產生，參見王中江：〈第三章 清末民初中國認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強權」與「公理」的兩極性思維為中心〉·《近代中國思維方式演變的趨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7-267頁。

⁷² * :〈尊我篇〉·《湖北學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⁷³ * :〈革天〉·《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1903年·收於王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第714-719頁。

都是來自於庚子事變後，中國近代知識人面對「道的失能」的反映。這種「道的無用論」主張皆出自於革命派知識人，因為此種論述能夠鬆動「天道」概念而有助於革命精神的發生。

而在非連續性創新論述類型部分，則有天道猶憲政論述類型，如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提到，人群進化第一期乃是神權政治，而中外神權則有不同，他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化身，中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雇役，因此他國君主等同於天帝，然中國君民則皆受天所統治，因此梁氏指出「所謂天秩天序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⁷⁴由這可見，梁氏透過比附憲政與天道，重建了憲政（天道）凌駕於君主的框架，賦予憲政極高地位，這是在庚子事變後，立憲思想興起下的創新天道論述。歸結 1902 年天道論述類型如下表所示：

表三：庚子事變後時期「天道」論述類型列表

類型	序號	庚子事變後時期「天道」論述類型
連續性繼承/轉化	1	天道喜強新惡弱舊論
	2	天道無用論
非連續性創新	1	天道猶憲政論

由上可見庚子事變後，在立憲、革命陣營中，都出現不同的天道論述類型，立憲派談「天道猶憲政」，革命派談「天道無用」，這些都是屬於這個時期特有的天道概念論述。

⁷⁴ 中國之新民：〈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未完）〉，《新民叢報》第 3 號，1902 年 3 月 10 日。

(四) 民初共和後時期的天道湧現

辛亥革命結束後，中國從君主國成為共和國，在國體與政體的劇烈轉變下，天道概念是否有所改變？在民初之際產生的時代命題與晚清之際的滿漢革命不同，面對不同的問題，天道概念如何被知識人挪用？去進行何種論述？從圖三可以看見辛亥革命後，「天道」概念仍然不斷的下降，但 1913 年之際「天道」一詞詞頻比例卻大大超越預測值，則 1913 年究竟發生什麼事件，引起了「天道」概念不降反升？這一數據線索提供了人文研究者一個新的問題意識。歸結 1913 年天道論述類型，仍然可分為連續性繼承/轉化與非連續性創新類型兩類。

在連續性繼承/轉化類型部分有運用天道人事相貫通論述，論證天道與人倫乃相互呼應，違背人倫就是違逆天道，將受天道責罰，如吳彝敘〈人倫何以千古不磨〉一文提倡「人倫」概念時指出：「《易》曰：餘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慶與殃因果之報，非近在其身，而遠在其子孫，天道豈有所私哉？特就其家國倫常所發見者，以為勸懾而已，以故千古文人，何等之著述，有一種非講明倫常者乎？千古賢哲何等之功業，有一事非鞏固倫常者乎？」⁷⁵這裡顯示出民初知識人援用了天道人事相貫通論述，論證「人倫」的重要性，以天道權威去鞏固人倫秩序，這是在民初共和時期中對於過去天道論述的繼承使用。

而在非連續性創新論述中，則是配合時代語境的改變以及新的時代命題，使得天道概念與民權、孔子等觀念相聯結成新的論述。如「天道無私，為禍者人論述」，梁啟超在〈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一文中，分析歐洲政治革進的原因時指出，

⁷⁵ 吳彝敘：〈人倫何以千古不磨〉，《庸言》第 1 卷第 15 號，1913 年 7 月 1 日。

像是西方諸國改良政治者很多，但有些改革具有好的結果，有些則產生不良結果，百年之間稍具規模者僅十幾國，越來越好者僅數國，其他國家不僅沒學好，反而失去自身舊有傳統而滅亡，梁氏提到「豈天道有所私，而運命之足以左右人國耶。」⁷⁶這裡言下之意是天道至公，所以為禍者人也，是各國不知政治改革之道，導致亡國，這裡即是使用「天道無私，為禍者人」論述去指責當時政治上的人禍問題。

其二，社會本位的天道論述，如張東蓀在〈余之民權觀〉文中指出，要主張民權觀前，需先辨別東西方的差異，即東方為社會本位，西方為個人本位。而在東西方的差異下，張氏認為民權觀念必須與東方社會本位調和，方不限於「民權狂」，在此之際其點出「天道」乃是以社會本位為主，其指出：「所謂天道者，亦即萬物並育之義，要之中國思想，無一不以社會為本位也。」⁷⁷這裡可見張氏乃是在「公/群」的角度下談天道，意指天道主張萬物並育，並非為了單一個體，故知張氏在此乃是運用「社會本位的天道論述」去反駁單一個體民權觀的正當性。

而在這時期文獻中要特別提出來的，1913年之際天道論述增多，主要來自於藍公武〈中國道德之權威〉一文，文中主要論述了天道概念，此文是回應梁啟超〈中國道德之大原〉一文。梁啟超在文中論證道德本原來自於報恩、素位、慮後舉三事後，指出道德能夠制裁人的力量在於權威而不在義理，因此藍公武〈中國道德之權威〉一文接續著談，談及中國道德權威失墜的原因，以及中國文明中可視為道德權威者。藍氏指出中國道德權威失墜有四個原因，分別是：外來勢力入

⁷⁶ 梁啟超：〈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庸言》第1卷第5號，1913年2月1日。

⁷⁷ 張東蓀：〈余之民權觀〉，《庸言》第1卷第12號，1913年5月16日。

侵、國內變動發生、物質文明發達、社會生活困難等，正因為這四事使得中國道德權威失墜，道德開始無法制裁人。藍公武認為唯有先恢復道德權威，言道德才有其作用。至於應當要恢復什麼道德權威？其歸結出中國六千年文明中千古不滅之二者：其一為天道，其二為孔子。在上述的論述下，天道概念在民國初年再現出其重要性，作為道德權威本原之身分而出現，是為「權威天道論述」。

〈中國道德之權威〉一文雖然認為民初之際禮教墜廢，但人心之中仍有天道與孔子觀念，隱然為主宰，故而希望能夠設法發揚光大，如此一來則道德權威再現，便能制裁人心，挽救社會支離滅劣的現象，使國運昌隆。作者很敏銳的指出中國以天為教，自漢之後多所變化，其說不一，其義眾多，故條舉天道之義很難，然作者仍是努力的從既存典籍中說明天道之意義、天道之根本觀念、天人關係等三義。〈中國道德之權威〉一文中對天道概念進行了定義，即「以人法天」，由這可見到了民初之際，知識人回到傳統天道人事相貫通論述下的天道概念，其舉包犧觀象法於天地以作八卦之例證之，而八卦能察天地變化與定人事吉凶，為以天法人者，故作者定調中國民族文化始於法天，即使六千年來聖賢相承之道不一，但其旨歸即法天而已。

〈中國道德之權威〉一文指出中國歷代聖人正是因為奉《易》為師，善於法天致用，故締造中國民族文化，聖人所以為聖，關鍵即在於知天道。作者引《中庸》以誠為教，說明「誠」乃是天道與人道的內涵，所以《中庸》言誠也同樣是法天，而天下至誠便能經綸天下大經，立天下大本，知天地化育，天道精微即在其中。這裡作者透過法天觀，重建天道權威性。作者認為孔子以降雖有曾子忠恕、

子思之誠、孟子仁義等不同的孔子之教流傳，但會通諸子之言則可知孔子一貫之道即是以人法天的天道概念。作者把天道與國家觀念連結，指出中國古代教義即以「天道立國」，因為「國」乃天之所有，故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乃是為天行道者，因此君必有德，始能有位，故方有天命無常，惟德是輔之說。然後世因為古教淪亡，致使天道之說變成神祕之說，成為人君受命之符。作者認為時至民國，因為「國體丕變，政為共和」，這個時機點正適合昌明古教，重新以「天道立國」才對。作者對當時學習西方者僅習於皮毛，而意圖詬病並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現象感到憂慮，因為中國文化一旦產生危機，連帶的國家安全也會產生問題。

由上可見作者試圖透過「權威天道論述」去與「天道無用論述」相抗衡，其主張「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不在於人而在於天，國家為天所有而非民或君，故在「天」之下，「君道」與「人道」都必須順應「天道」，這使得絕對的傳統君權與現代的西方民權都必須在天權之下，順天而行。當時藍公武除使用「權威天道論述」對抗「天道無用論」外，還想取代當時「武力權威」或「否定一切權威」等論述，這樣的主張實質上表現出作者對於時局混亂不安定的心情，因此才有重新召喚「天道」作為道德權威根源的論述再現，而這是屬於民初紊亂的共和時期之特殊天道概念論述。歸結 1913 年天道論述類型如下表所示：

表四：民初共和後時期「天道」論述類型列表

類型	序號	民初共和後時期「天道」論述類型
連續性繼承/轉化	1	天道人事相貫通論
非連續性創新	1	天道無私，為禍者人論

	2	社會本位的天道論
	3	權威天道論

由上可見辛亥革命後，在民初共和亂局之中，權威失墜，故而造成人人僅為私利，不顧公德，因此才興起以社會本位的天道論述去喚起集體性，以及以權威天道論述去鞏固公德之現象，這是辛亥革命後共和時代中的創新天道論述特色。

(五)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天道湧現

1915 年為《新青年》知識分子開始新文化運動的一年，在陳獨秀等人推翻傳統與全盤西化的立場下，天道概念有什麼樣的變化？知識人自 1910 年辛亥革命後，眼見共和政體並未能帶來和平與快樂，反而是不斷的動亂與不穩定，故產生了革命對象應從國體/政體轉到文化領域的自覺，正是在此語境下產生了新文化運動。那麼，在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天道論述，具有什麼特點？從圖三可見，1915 年之際「天道」一詞的比例也遠高出預測值，那麼本文就以 1915 年的天道論述為例，以點代面的指出新文化運動時期天道概念的內涵與特點。

歸納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天道概念類型，亦可分為連續性繼承/轉化與非連續性創造論述兩類。在連續性繼承/轉化部分只有一種，即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論，如〈歐洲戰局後之推測〉一文指出：「盛衰倚伏，治亂消長，天道如此，人事何莫不然？拿破倫馳騁歐洲三十餘年，蹂躪大陸，割裂疆土，馬首所瞻，全歐鼎沸，群雄並興，連橫相抗，戰士喪於疆場，黎庶流於溝壑，財窮兵盡，民不聊生，於是人心厭亂，而有維也納之會，弭兵之議，於以起焉。」⁷⁸此文以天道循環變遷為常

⁷⁸ 青霞：〈歐洲戰局後之推測〉，《大中華》第 1 卷第 3 期，1915 年 3 月 20 日。

道論，說明歐戰必定以弭兵作結方符合天道，作者正是以此論作為理據去穩定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秩序。

而在非連續性創造類型部分，則是會通了個人主義，使天道內涵產生位移現象。如其一，天道人事相分論，在新文化運動中最凸顯的天道概念位移，就是「天道人事相分論」的出現，這是出自於陳獨秀基於個人主義立場下的天道論述，如陳獨秀在〈抵抗力〉一文中談及不少老子與天道自然觀，這起於其主張小我個人主義，因此必須先將天人相分，小我個人才不會受限於大我天道而能解脫並自由，從〈抵抗力〉一文中可看出，陳獨秀等知識人如何從個人主義出發，重新理解再現/挪移轉置天道概念的內涵。

陳獨秀〈抵抗力〉一文指出，中國人受學說之害、專制君主流毒、統一之害而無抵抗力，陳氏認為世界如一戰場，故人們必須積極產生抵抗力，才能因應各種挑戰。而在學說之害部分，陳獨秀指出老子雌退、儒崇禮讓、佛說空無等思想，從思想根本處斷絕抵抗力的出現，而在這部份即可見陳獨秀對於「天道」概念的轉化行動。陳獨秀認為「天道遠，人道邇」，因此人們的「正路」是取邇而不迷其遠，盡力於善而制惡，人之能力所及者即人道，而人之所未知者即自然與天道。從這可見陳獨秀不再從傳統「天道人事相貫通論」去談「天道」概念，故才指出人無法知天道，既然天道不可知則無用，在「天道無用論」下，自然就只能努力於「人道」，在此陳獨秀更加推演了章太炎開啟的「天道無用論」，更進一步把天道與人道二分，形成「天道人事相分論」，⁷⁹將「人道」推向前端，自此人道概念

⁷⁹ 這樣的現象也曾發生在近代日本思想界，如金觀濤與劉青峰指出伊藤仁齋（1627-1705）受到明儒吳廷

就先於天道概念，成為人們應該關心與努力的價值觀。

而在陳獨秀的天道論述中還有一點特別的主張，即「天道惡，人道善」論述，這與過去「天道人事相貫通論」下的天道人事皆善思想不同，其引用了《老子》來證明其天道為惡之主張，其指出：「老聃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天道，其事雖邇，其意則遠，循乎自然，萬物並處而日相毀，雨水就下而蝕地，風日剝木而變衰，雷雹為殃，眾生相殺，孰主張是，此老氏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故曰：天道惡。」⁸⁰由這可見，陳氏從天道自然中的衰殺現象中，論證天道之惡，陳氏進一步指出正因天道惡，因此呈現出人道之善，因為天道惡，因此時常有災害發生，人類即努力的祛除天道之惡以圖生存，以技術征服自然，在人力勝天中凸顯人類意志，此間即凸顯了人道之善。

由這可見陳獨秀的天道概念與過去不同者有二：其一，從天道善到天道惡；其二，從天人合一到天人相分而相戰。在上述兩種天道論下，萬物的自我意志，才能獨立於傳統天道人事相貫通論中的天道，得到真正的自由。陳氏為解構天道權威，引用老子思想中的自然天概念，鬆動先民信仰中的「人格天」，以及孔子的「道德天」觀念，故在陳獨秀主張的老子自然天中，天道就降低了其重要性，人們關注的不再是有好惡、能懲處的「人格天」，也不再受到「道德天」的束縛，「個人」能夠在「自然天」下展現萬物自主意志，由這可見新文化運動中在個人主義的興起下「天道」概念的改變軌跡。

翰（1490-1559）氣論思想的影響，斬斷了天道與人道間的聯繫，把抽象天理還原到人間，政治與個人道德為兩回事，故政治家應看其是否能治國，而非其道德。見金觀濤、劉青峰：〈氣論與儒學的近代轉型——中國與日本前現代思想的比較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11期（2009年6月），第1-30頁。

⁸⁰ 陳獨秀：〈抵抗力〉，《新青年》第1卷第3期，1915年11月15日。

有趣的是，在 1915 年大量的天道論述中，無獨有偶還有人闡述起老子的天道觀，似與陳獨秀相互對話，此即是謝無量對老子思想的討論。謝氏在〈老子哲學〉一文中指出孔子罕言天道，以人事為主，重視實行；而老子則多言宇宙本體，弟子莊生造論，因此天道與人事，正是當時道家與儒家的不同所在。謝無量指出雖然孔子崇信天道，但仍是以前人事為驗，不務玄遠，因此說「天何言哉」與「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些都是偶而談及，並非專主於此。雖然子思以誠概天，指出誠者天之道，相較於孔子對於宇宙之義談的更為詳細，但仍比不上老莊昭晰，因此謝無量說「以此非儒者，所亟辨也。」由這可見，謝氏將天道劃為老子之說，與孔子無關，企圖斷開孔子與天道之間的關係。而謝無量斷開孔子與天道觀的目的是什麼？可從其以下論述中探知。

謝無量在〈老子哲學〉⁸¹中「老子實踐道德論」部分進一步指對老子天道觀的理解：首先，謝氏認為老子天道觀出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第七十九章)。老子的天道是憑藉著人的善惡而下賞罰，謝無量認為這種主張在《尚書》之際似已有之，從這來講，謝無量認為老子的「天道」具有「人格天」的色彩。其次，其引「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第七十三章)，指出老子的天道觀似簡無謀，實際上其謀非人所能及，因為人們以耳目只能見一曲而不見大全，偶睹以善得禍，以惡得福者，就懷疑天網疏漏而多失，謝氏認為其實只要能知終始，盡其變化，就能理解「道」的恢恢廣大，天道實乃疎而不失。由以上兩條可見，謝無量認為老子的天道具有人格天色彩，親近善人並能賞罰，且天道不可預測，非人事所能探

⁸¹ 謝無量：〈老子哲學〉·《大中華》第 1 卷第 4 期，1915 年 4 月 20 日。

知，而謝氏的天道莫測論則某個程度能抵消人們對「道的失能」現象的懷疑。其三，其引「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第三十章)，並指出老子的天道好生惡殺，因此好戰者，以兵強天下者，終「不得其死」。而在天道好還下，必將「殺氣一動，妖沴隨之。」從這可見，謝無量認為老子天道觀是好生惡戰者。

綜上可知，謝無量與陳獨秀皆從「自然天」論老子天道觀，但結果有所不同，此一差異來自於兩人有著「天道人事相貫通」與「天道人事相分」不同的立場所致。謝無量雖參加新文化運動，也是《新青年》之一員，但在天人關係上可見其主張與陳獨秀有所不同，其更傾向群體而非個人，故謝氏的天道概念仍具有意志，人事皆由法天而來，謝無量以「天道人事相貫通論」鞏固了群體主義，而陳獨秀則是以「天道人事相分論」挺立個人主義，則陳獨秀對於天道人事相貫通論的解構鬆動，當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天道創新論述類型的一特殊展現。而歸結 1915 年天道論述類型如下表所示：

表五：新文化運動時期「天道」論述類型列表

類型	序號	新文化運動時期「天道」論述類型
連續性繼承/轉化	1	天道循環變遷為常道論
非連續性創新	1	天道人事相分論

由上可見在新文化運動起始年中，伴隨著個人主義的猛烈發展，天道概念從早期的「天道無用論」再次轉變成「天道人事相分論」。在「天道無用論」中，天人還是相

通，只是沒有作用，不可預測；但到了天人相分論中，則全然不用天道，一切以人為主，這呈現出中國近代政治精英對於「天道」的懷疑與解構的發展軌跡，而這趨勢的發展，乃是伴隨著「人的覺醒」⁸²而產生。

三、餘論：道的多元現代性

基本上在 1916 年後「天道」一詞詞頻比例就遠在預測值之下，意味不僅未被正常普遍的使用，反而是明顯的減少使用。雖然在 1922 年前後之際，天道概念的使用比例中仍見有超過預測值者，但其中天道概念已不再與歷史時代語境聯結，而是回歸到書齋中的討論，如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志三代宗教禮學〉中略論天道，其中討論最多的就是〈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文，文中特別討論了天道概念的歷史變化，然這已非當時普遍現象，僅是梁啟超在學術上的論述。⁸³

從以上討論中可見，天道概念在近代有如上論述類型，對照前文論述可知天道概念的發展，乃是受到自強運動、維新變法、立憲運動、滿漢革命、民初亂局、新文化運動、歐戰等事件與語境的影響才隨之變化，這證明了觀念的轉型與變遷與世變之間的緊密互動關係。而從以上文獻分析中可見中國近代「天道」概念發

⁸² 關於中國近代「人的覺醒」的發展軌跡，可參見金觀濤、劉青峰：〈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演變及其形態初探〉，《二十一世紀》總 84 期（2004 年 8 月），第 52-66 頁、黃克武：〈「個人主義」的翻譯問題——從嚴復談起〉，《二十一世紀》總第 84 期（2004 年 8 月），第 40-51 頁、羅曉靜：〈清末民初：從「人」到「個人」的過渡——論現代個人觀念與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江蘇社會科學》2008 年第 6 期，第 155-159 頁、許紀霖：〈個人主義的起源：五四時期的自我觀研究〉，《天津社會科學》2008 年第 6 期，第 113-124 頁、余英時：〈中國近代個人觀的改變〉，收入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第 197-205 頁，餘例不詳舉。

⁸³ 實質上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仍有透過學術語言去改善世界的意圖，詳見周志煌：〈「界」與「類」：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儒學倫理向度〉，《先秦兩漢學術》第 15 期（2011 年 3 月），第 59-8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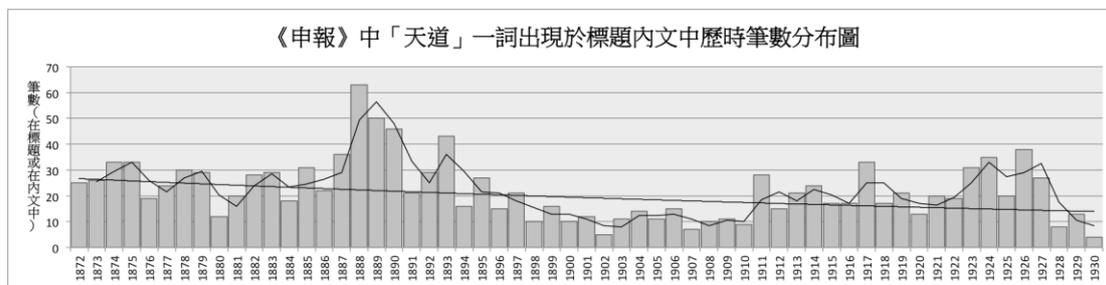
展歷程的梗概，過去學者隱約可從長期定性文獻閱讀分析中，透過長時間逐步閱讀掌握到概念的宏規發展趨勢，如今則可通過快速的定量數據客觀呈現，再次確證天道概念的發展軌跡。從前文圖三可見「天道」一詞在中國近代的發展，呈現甲午戰後穩定使用，且穩定下降趨勢，這表示「天道」概念雖在 1895 年後關注到，開始援以作為行動合法性根據，但也僅有少數政治精英使用，不再是所有人普遍肯定的一切行動的合法性根據，從客觀數據線索以及配合人文分析中可以得出上述宏觀結論。

另外，本文作為以數位人文方法進行中國近代思想概念發展史研究的一個嘗試，需對此一綜合新方法提出建議。定量數據雖可讓人文學者發現一些宏大的歷史變化軌跡，但也需注意數據資料中的一些問題與錯誤，並且應隨時進行修正。基本上在數位人文研究中，數據並非代表一切，只是一個線索，提供人文學者提出新的問題意識，進而進一步去研究與探索之用。數位人文研究的優點可歸納為二：其一，可以看見長時段中思想概念的升降過程；其二，可以研究代謝與衰落現象。第二點的意思是，過去人文研究由於以史料為研究對象，故多關注於資料之「有」，例如研究天道概念時，便只集中心力研究其最為興盛使用階段中的天道論述史料，卻不會關注未使用天道概念的時間段。例如圖三中可見在 1890 年前「天道」一詞使用比例斷斷續續，就可以去追問為何當時只有部分人使用「天道」概念作為合法性理據？是不是因為只有在人們感到天崩地解之際，才會意識到「天道」概念的重要性並且使用之？若是，則「天道」一詞的穩定出現，是否代表著時人明確意識到變局的產生？以及窮則變通的重要性？若是，則「天道」一詞的

穩定使用就代表著時人對於時局確實產生了危機感的時間點。這些都是在數位人文視野下有趣的思想概念研究問題。數位人文視野能同時觀察概念之有與無，進行整體掌握，使概念之「無」與「衰落/代謝」也成了可以研究的對象，這是第二點優點。

最後，本文除了從數據證明中國近代政治精英論述中有「天道下降」的發展軌跡外，也由文獻精讀中勾勒出此一變化歷程當是在如下一個重要語境下形成，即：伴隨著知識分子對於「人」的解放，促使「天」的權威性被瓦解。因此從天道概念的發展看來，正是由於近代甲午戰爭、庚子事變、歐戰等世變的產生，使得中國近代知識人感覺到「道的失能」，因此而有以「新道」取代「舊道」的現象，換言之，即是以「物競天擇」取代「濟弱扶傾」(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概念正是在上述「道」的轉換下產生位移，因為作為「濟弱扶傾」之代表的「天道」概念不能滿足人們的法感，所以註定被取代。因此「天道下降」即成為「道的多元現代性」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內涵。

而在最後，本文還想進行一個有趣的比較觀察，即由於「數據庫」所收錄資料皆為中國近代政治思想文獻，故本文所指出之「天道下降」之變化屬於上層、精英、政治思想界中的變化，若在庶民世界，是否也有同樣的發展過程呢？為求回答這個問題，以下將以《申報》數據庫中的「天道」詞頻歷時性變化圖來進行比較分析與討論。本文從擁有超過 20 億字，時間段橫跨 1872-1949，共計 77 年的《申報》數據庫中擷取出在標題與內文中具有「天道」一詞的使用筆數，爾後進行製圖，如下所示：



圖四：《申報》中「天道」一詞出現於標題與內文中歷時筆數分布圖(1872-1930)

在圖四中可以看見，《申報》中的「天道」一詞自 1872 年就有很高的使用量，⁸⁴這是因為《申報》為普羅大眾閱讀之報紙，故其內容屬性乃以迎合庶民為主，而在庶民世界中，「天道」概念極為重要，因為以天道好還報施自我安慰，乃是人們面臨各種挑戰時的一種自然回應方式之一，故「天道」概念在庶民世界中的地位由此可見。而自 1872 年到 1930 年可見，在使用上都符合線性趨勢線發展，雖然基本上也屬於逐漸降低的發展趨勢，但使用量一直都比較固定，不像在「數據庫」中的政治世界中，隱退的現象更為明顯。而且在《申報》中，於 1887-1890 階段有大量超出預測值的天道用例，這顯示《申報》非尋常的集中強調了天道觀，由此則為研究者開出另一個問題意識，值得往後進一步探索。

由上簡單的比對分析可見概念並非靜態固化與一元的，而是具有動態流動的多元樣貌。羅志田曾從京師與通商口岸和廣大內地之地域空間角度出發，提出了中國近代有兩個世界。⁸⁵本文認為這個論斷可以繼續延伸，從政治精英/一般庶民之階級分野角度亦可見兩個世界，正如上述《申報》中天道概念的變化，即與「數據庫」中的發展趨勢有所不同。而合併空間角度、文化分野角度，即可產生四個

⁸⁴ 《申報》中的「天道」一詞亦有噪音詞現象，本文雖未及仔細處理，但在下載文獻瀏覽過程中約略觀之，其所佔比例應不致於影響宏觀趨勢考察，特此說明。

⁸⁵ 羅志田：〈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東風與西風》（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第 252-267 頁。

世界，如再加上其他向度，像范伯群指出通俗作家/新型文化人之雅俗分野。⁸⁶實際上中國近代實具有難以計數的世界，任一世界中皆有屬於自身特殊之「天道」概念的發展類型與軌跡。故在描述「道的多元現代性」乃至於各種中國傳統概念之現代性發展時，必須得從多元角度去加以審視，方能更為整全的進行掌握與描述。

⁸⁶ 參見范伯群：《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總序》（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熊月之：〈略論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產生與匯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00期，第257-272頁。

《近代報刊語料庫的建置、運用與韓國數位人文的方向》

宋寅在

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 HK 教授

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與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正在合作建置《近代報刊語料庫》，收藏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40 年代在韓國出版的 25 種期刊與近代報紙《東亞日報》正文。主持方打算建置在網上開放，給相關研究者、有趣網民提供有效資料。《近代報刊語料庫》建置在數位人文的視覺下進行的。語料庫建置以及分析系統的開發具有韓國數位人文的語境，給韓國數位人文的發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啓示。

大概 2014 年左右數位人文作為人文研究的新趨勢在韓國學界逐漸地興起。研究機構邀請國外有關研究者敬聽數位人文相關的報告，學術期刊刊登一些論文介紹數位人文的概念、歷史、國外數位人文的動態，可是這還只是表示一部分學者的興趣而已。可是工業 4.0 話語出現以後，數位人文作為工業 4.0 的有關領域逐漸成為顯學。韓國政府還推出了數位人文計劃開始贊助數位人文相關的事業。最近，隨著工業 4.0、人工智能等話語流行，數位人文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可見數位人文成為了韓國學界的新潮流。可是，這種新潮流不是突然造成的，也不只是從國外進來的舶來品。在韓國稱之為數為人文的學文具有自己的歷史、學科背景，這一些歷史及背景稱為了韓國數位人文的基礎。應該注意的是，來源、目的、方法不同的因素構成韓國數位人文的內涵，再加上，這一些複雜因素還引起數位人

文在方法論、目的上的幾種分歧。現今韓國數位人文的實踐大體上在三個方面進行，第一，建置、運用數位典藏，第二是提倡數位文化、人文創意，第三是利用數位技術分析人文學大數據。第一方面是在大量韓國歷史文學文獻的電子化，主要是傳統時期的官方文檔、文集的電子化。這一些事業是因為大型工程，因此主要由國家機構承擔了。這一些事業的成果主要在網上高開提供一種電子圖書館的形式。第二方面是在已成的學術研究及文化藝術作品的基礎上成立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最新數位技術創作新形式的文化欣賞品，其主要宗旨是讓普通大眾更容易地享受學術、藝術成就。這還關係上文化產業，因此指向產業化及大眾化，也主要是政府表示興趣的一方面。數位文化人文創意方面的學者很重視通過數位語言學習內容、表達自己的瞭解、創造自己的數位空間。因此應用 google class、wiki 等工具進行教育，指向培養數位時代的人才。第三方面是通過數位技術及語言的結合表現的。語言學、歷史語義學、概念史方面的學者主要采用這種方法論。他們采用大數據分析、統計、語料庫分析試圖展開人文研究的新階段，其特點是在人文研究的設想、進行、結束整個過程采用數位人文的方法，其方向跟將學術研究的成果改成數位文化創意的的方法有所相反。這一些方法除了熟悉於傳統人文研究的學者陌生，並且受到他們的批評，再加上自稱為數位人文學者的人們(實際上屬於第二方面的)還不要表示同意。

《近代報刊語料庫》建置事業是屬於第三方面的，因此帶著強烈的研究型色彩，並且成為韓國數位人文研究的基礎建設。其基本思考是從概念史研究、詞語學的角度出來，加之一些資訊學者合作實現運用語料庫研究的意向。《近代報刊語料庫》建置在以往大型文獻電子化工程的基礎上進行了。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概念史研究群獲得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的同意，獲得近代期刊資料庫的文本文件。

其文本文件是只能閱讀正文的原始資料而已，概念史研究群找語言學、訊息學專家運用自然語處理技術推動了語料庫建置。之後爲了運用語料庫導出有意義的研究結果，開發分析工具使用。其結果，語料庫希望可以顯示關於某一種關鍵詞的各種各樣的信息，比如年度頻率、貢獻關係及其年度變遷，並讓使用者看有關例句。這種分析結果對有關研究者有效論述資料。

《近代報刊語料庫》建置肯定是韓國數位人文進展的里程碑，並且還包括以往韓國數位人文各個方面，因此成爲將來韓國數位人文的進展。第一、文獻電子化是數位人文必須基礎，語料庫分析結果會刺激文獻電子化持續、擴大。還有，文獻電子化具有取向建設大數據，從概念史角度的研究成就還明確地提供以後文獻電子化的方向與範例。第二、語料庫研究要求研究模式的轉型。以往的人文研究主要是精度正文、評析，相比之下，用文本挖掘方法來解讀大數據形式文本，還用分析工具獲得有效研究資源。加之，顯示研究結果的方式還有變化，除了敘述文章辦法以外，種種視覺化方式在數位人文方面普遍使用。這種轉向要求研究者培養數位學者的力量作爲新時代的學術素質。這樣的話，會實現研究與研究的普及的一體化。這可以說是第二方面數位人文的新發展。語料庫資料、分析技術、分析技術還有持續發展的可能性。這種的可能性會保證數位人文，甚至人文研究的持續發展。

《韓國概念史的成果與挑戰》

韓國概念史研究進入 2000 年代初期積極推動，迄今爲止已有 10 年以上的歷史。雖然在哲學、歷史、文學語言學方面，有一些學者從個人興趣出發，做出個別成果，但是從 2005 年開始幾位有志自身學者推動概念史研究，由此組成一種研究群，形成學術的新趨勢，做出集體性成就。2005 年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在

學校董事長的支持下，開始編撰韓國概念史詞典事業，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資深學家開會討論概念史研究的意義以及其發展方向。另外，國際政治學界還對概念史表示興趣，組成所謂「傳播研究小組」出版《近代韓國社會科學概念形成史》。在這種活動下，首爾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舉辦了 2008 年 HPSCG 年會。2007 年翰林科學院的概念史研究獲得的擴大的機會，從該年通過韓國教育部研究項目審查，約定作為「人文韓國」研究基地受 10 年的贊助，共 11 個專任研究人員，10 幾位協同研究員參加概念史研究。從此韓國概念史研究進入集體性發展階段，這組研究集團的研究活動、研究成果收到廣大的關注，並且在媒體上報道概念史成為韓國人文學的新趨勢。

當初韓國概念史的模式是德國歷史學家 R. Koselleck 主辦的概念史研究，因此研究的初期，關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專家聽到德國與歐洲的概念史理論與成就。並且 Koselleck 所主持的《概念歷史辭典》翻譯也是事業的核心方面。可是韓國概念史的主要方向是東亞概念史，其目的是通過研究在近代時期形成的政治社會概念，闡析近代東亞的複雜面目，說明東亞三國之間的概念流動、瞭解概念當中的差異，貢獻於構建東亞和平國際秩序、話語共同體。因此，在另外一個方面，研究團還進行中國、臺灣、日本等國家的概念史研究家交流，盡力介紹其他東亞國家的概念史研究成果。所以，翻譯金觀濤、劉青峰著《觀念史研究》(2008)、在日本出版的一詞語詞典、藝術概念史系列等等。這一些翻譯系列在學界、媒體收到比較的大歡迎，被韓國政府機構評選為優秀學術圖書。

韓國概念史研究的終極目的是從概念史的角度重新敘述韓國近代史，在這樣的目的下介紹國外理論、研究成果是研究的參照點。韓國概念史首先看近代概念的原始語義，再掌握東亞脈絡，闡述韓國近代形成的圖景。核心研究成果叫《韓

國概念史叢書》，該叢採用書一個概念一本書形式包括四種分野，所謂「基本概念」、「日常概念」、「朝鮮概念」、「現代概念」。基本概念是政治社會概念，比如民族、公民、社會、國家、和平等等。日常概念是微觀歷史、文化藝術方面的概念，比如病、青年、戀愛、幸福、趣味、通俗等等。朝鮮概念是代表朝鮮時期的政治社會結構以及該時期韓國人的思想觀念的概念，比如中華、事大等等。現代概念是 1945 年解放以後的關鍵概念特別代表冷戰時期、民主化的概念，比如統一、日本、全羅道、民衆等等。研究群期待四種《韓國概念史叢書》為拓開重新敘述韓國史、思想史的新境界，貢獻於闡述東亞近代性的本身面目，擺脫中心-周邊結構下的近代模式。

2018 年翰林大學概念史事業帶著新課題重新開始。以往的事業叫《東亞基本概念相互疏通》，新課題名是《跨界、融合、創新的東亞概念史》。新課題一邊繼承以往事業的成果與宗旨，一邊試圖在實踐、理論方面拓開韓國概念史研究的新境界。換句話說，堅持出版種種概念史研究書，出版概念史期刊，推動跨國家、跨領域、跨學科研究活動，實現概念史研究的創新。新概念史事業要加強國際合作，積極推動東亞範圍內的概念史共同研究，策劃編纂東亞學者共同書寫的名副其實的東亞概念史，實現所謂「概念史的東亞轉型」。加之，積極接受研究的新環境、新方法，實現塑造概念史研究的新面目。具體來說，接受數位人文方法作為跨學科人文研究的新方法，比以前迅速地掌握概念的長期變遷與形成。從而，試圖開拓概念史研究的創新、促進形成國際性研究平臺、開創研究的新範式、目睹新型研究者的出現。韓國概念史站在轉型與跳躍的階段，帶有任務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拓開思維、方法、領域的新境界。

11月29日

國際學術工作坊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Italian Translations of *Mengzi* 孟子

Casalin Federica (費琳)

羅馬大學東方學系教授

1. Introduction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oks of the Chinese early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significance of *Mencius* was soon perceived in the Western world: besides a few translations in Latin,⁸⁷ starting from the 19th century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provided the first translations in modern languages, especially in English: besides the very well-known rendering of James Legge (1861), the recent *Reference Guide to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Knechtges (668-661) also lists ten translations that the two compilers of the entry related to Mengzi (Hsiang-lin Shih and David R. Knechtges) consider as particularly authoritative. This list contains translations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A longer list is provided by Ji Hongqin (2013) who lists dozens of translations, both by foreign and Chinese translators, in China and abroad; his list doesn't contain any reference to Italian translations either.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translations of *Mencius* available in Italian language. After giving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lif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ranslators, it will select some significant passages taken from the sixth book of *Mencius* in order to verify how different translators rendered some crucial concepts of Mencius' philosophy concerning human nature (人性).

Before focusing on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talian translations of

⁸⁷ As for Latin translations, which are not consider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Ji Hongqin (2013, 54), “Zhang Xiping (2009) and Ma Zuyi, Ren Rongzhen (2003) declared that *Mencius* translations started from the late 16th century”, but in his view “the earliest translated version of *Mencius* handed down doesn't come from the 16th century but from the 19th century”. He is probably referring to the following work published in France: *Meng-Tseu, vel Mencium Inter Sinenses philosophos ingenio, doctrina, nominisque claritate Confucio proximam, edidit latina interpretatione Stanislaus Julien*. Lutetiae Parisiorum : Societatis Asiaticae et Comitatus de Lasteyrie impensis, 1824.

Mencius, it may be useful to give a glance to the general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in Italy. No editorial project in Italy has ever tried to fully translate the Five Classics and Four Books (五經四書). Concerning the Five Classics, a few translations of the *Yijing* (all based on existing translations in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are available in Italian; for the rest, only a few excerpts of the *Shangshu* 尚書, *Liji* 禮記 and *Chunqiu* 春秋 are scattered in manual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ost sadly, only some partial renderings of the poetry of the *Shijing* 詩經 (almost exclusively taken from the *Guofeng* 國風 section) are available to Italian readers. Much more work has been done concerning the Four Books: besides Confucius' *Dialogues* (*Lunyu* 論語), that have been translated various times both from the original language (direct translations) and intermediary languages (indirect translations), Italian readers can also read translations of the *Daxue* 大學 (though existing translations are not annotated), of the *Zhongyong* 中庸, which was recently rendered in a bilingual annotated edition by Lippiello (2010), and of *Mencius*. Together with the *Lunyu*, *Mencius* is one of most frequently translated work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s we will see below, the number of existing translations still looks rather limited and c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2. Translators, promoters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s: an overview

According to a reference guide concerning studies on China in Italy (D'Arelli 2007), the following four translations of *Mengzi* are available:

1. Tucci Giuseppe. 1921. *Scritti di Mencio*. Carabba Editore: Lanciano.
2. Magrini-Spreafico Luciana. 1945. *Confucio e Mencio: i quattro libri: La grande scienza, Il giusto mezzo, Il libro dei dialoghi, Il libro di Mencio*. Introduzione di Luciano Magrini: Confucio e Socrate, Fratelli Bocca Editori, Milano.

3. Ou Carlo. 1959. *Il libro di Mencio*. Con prefazione di Luciano Magrini, Istituto culturale italo-cinese "Luciano Magrini", Milano.
4. Tomassini, Fausto. 1974. *Meng-Tzu (Mencio)*, traduzione dal cinese di Fausto Tomassini; introduzione di Lionello Lanciotti,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 (UTET): Torino.
5. Besides, a scholar from Venice University, Maurizio Scarpari, devoted many essays to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Mencius, including a work on human nature according to Confucius and Mencius (Scarpari 1991) and a booklet on Xunzi's vision of human nature that frequently refers to Mencius. Although these are not full translations, still they contain the Italian rendering of many excerpts related to *renxing*, therefore occasional reference to them will be made in this paper.

We will now proceed to provide some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translators, at least those whose life has been recorded in some sources. Among them, the most famous one among scholars of Asian studies is **Giuseppe Tucci**. Tucci was born in 1894 in a middle-class family of Macerata (Central Italy). He soon proved extremely talented for foreign languages: he taught himself Hebrew, Chinese and Sanskrit before even going to university and later became fluent in several European and Asian languages, the latter including Sanskrit, Bengali, Pali, Prakrit, Chinese and Tibetan. After spending some years in India, he went back to Italy and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Rome and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where he taught Chinese language. In 1933 he promoted the foundation the Italian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and Far East - IsMEO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based in Rome.⁸⁸ According to the only existing biography of Tucci (), the IsMEO was established as a "Moral body directly depending on Mussolini". His interest in Asian cultures was somewhat guided by his adherence to

⁸⁸ The institutional founder of the IsMEO was the philosopher Giovanni Gentile, supporter and theoretician of Italian fascism.

Italian fascism and Benito Mussolini: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ll for “racial purity” and an “authentic life” in touch with nature, which constituted a part of fascist propaganda, he highlighted those aspects of Asian civilizations that corresponded to such ideals, in what we could define – borrowing Said’s words – an “orientalist” vision of Asia. According to Tibetologist Donald S. Lopez, for instance, "For Tucci, Tibet was an ecological paradise and timeless utopia into which industrialized Europe figuratively could escape and find peace, a cure for western ills, and from which Europe could find its own pristine past to which to return." He published his translation of Mencius in 1921, when he was 27-year old and after only two years from getting his bachelor degree in Oriental Studies (1919). In his life he published more than 360 works dealing with the most diverse subjects, but focusing principally on Buddhist studies.

Coming to the translations by Luciana Magrini Spreafico (1945) and Carlo Ou (1959), they were both inspired and promoted by **Luciano Magrini**, who also wrote an introduction for both. Magrini was born in 1885, less than ten years before Giuseppe Tucci. His life was completely at the opposite side of Tucci’s life, as he strived all his life for freedom and fiercely opposed the fascist regime, suffering incarceration for this. He adhered to the Italian Republican Party, whose ideals were inspired by those of Giuseppe Mazzini, one of the major theoretician of Italian Risorgimento that led to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in 1861. Magrini’s life vaguely reminds the life of another Risorgimento hero, Giuseppe Garibaldi, as he spent several years of his life travelling and fighting in countries that suffered from foreign oppression, including Greece (1914), Russia (1914-1915), India, where he supported Gandhi’s pacific fight, Morocco, and even China, where he supported Sun Zhongshan (Sun Yat-sen) in his resistance against foreign colonialism (Bauer 1959, 6-7; De Martino 1959, 20). After the fall of fascism and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onstituent Committee that wrot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Italy and Minister of Labour. Besides being

a journalist,⁸⁹ he was a historian and was passionately interested in foreign cultures, which he studied with rigour and curiosity. He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ropos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tituto Italo-cinese (Italian-Chinese Institute) in Milan in 1954, that promoted the translations of various Chinese text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a journal devoted to Chinese studies. According to De Martino, (1959, 18-19) being esteemed as a historian and sinologue, he managed to obtain the collaboration of various translators and scholars, including Feng Yulan (De Martino 1959). The institute was closed when Magrini died, in 1957.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two translators of *Mengzi*: the first, **Luciana Magrini Spreafico**, a woman, was probably a relative, as she bears the same surname (she was not his wife, though, whose name was Emma; she might have been his daughter); **Carlo Ou** was the author of the direct translation issued in 1959, he was a catholic priest of Chinese origins. These translations clearly prefer readability to supporting scholarship: none of them provides exegetical notes or analytical insights: though not poor in accuracy, they are meant for the common reader. Besides, none of them provide the original language version or declare the edition they rely on.

As for the last two translators, both graduated in Orient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nice, and most probably both were trained by prof. Lionello Lanciotti (1925-2015), who was vice-president of the IsMEO, the Institute founded by Tucci and Giovanni Gentile, and then counsellor of the IsIAO (Italian Institute for Africa and the Orient) that perpetuated the IsMEO.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first translator, **Fausto Tomassini**, who also translated many other wor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ncluding Confucius *Lunyu* 論語, Laozi *Daodejing* 道德經 and *Zhuangzi* 莊子. As for Maurizio Scarpari, he has been a Professor of classical Chinese at the University of Venice from

⁸⁹ Negli anni '20 visitò l'Estremo Oriente come inviato del "Corriere della sera", e fu autore di monografie e relazioni di viaggio come *La Cina d'oggi* (Milano, 1925) e *In Cina e in Giappone* (Milano, 1927). (<http://rossopontorno.com/chinaland-lallegra-anarchia/>)

the late '80s until a few years ago, when he retired. He is one of the major Italian excerpts of Mencius thought, which he examined in various scientific papers and books. These translations clearly derive from an academic approach: Tomassini enriches his book with a long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concerning facts and people mentioned in Mencius' treatise. Besides, he adds footnotes to facilita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people and events. He doesn't provid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Coming to **Maurizio Scarpari's** book, as noted before, this is not a full translation of Mencius's book: it is an analytical treatise on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various ancient schools of thought (including the views of Mozi and Yang Zhu), where Mencius stands 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Here passages from *Mencius* are arranged in an order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which is functional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crucial ideas of Mencius's treatise.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is Scarpari's interpretation of passages, therefore this text privileges accuracy and supportive scholarship, though never missing readability. These two translations do not contain the Chinese version.

3. Italian translations of some concepts concerning human nature (*xing* 性)

The following tables propose a comparison of the translations of some excerpts taken from *Menzgi* (I followed the numeration adopted in Eno's translation, 2016,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all Italian versions). To provide a wider perspective, besides the Italian translations, I also provided some English renderings; all translations are list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first table is devoted to a brief excerpt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 *xing* 性. All Italian translators agree in translating *xing* as "nature" (Italian: "natura"). Despite this general agreement, this passage also contains some translating difficulties, the first concerning the choice whether to add or not the modifier "human" (Italian: "umana"), and the second connected to the character 生.

Mengzi 6/A/3	告子曰，生之謂性。
Legge 1861	The philosopher Kaou said, “Life is what is to be understood by nature.”
Tucci 1921	Kao-tze dice: “La natura degli esseri è la vita.”
Magrini-Spreafico 1945	Kao-tse disse: La natura, nell’uomo, è semplicemente la vita.
Ou 1959	“La natura è (qualità) nata.”
Dobson, 1963	Kao Tzu said, “What I mean by nature is the thing that gives life.”
Tomassini 1974	Kao-tzu disse: La vita è ciò che si intende per natura.
Scarpari 1991	“La vita – dichiarò – è ciò che si intende per natura.”
Bloom 2009	“Life is what is called nature.”
Eno 2016	Gaozi said, “The term ‘nature’ simply means ‘inborn’.”

Looking at this table we can notice that all English translators decide not to refer explicitly the character *xing* to human beings. As for the Italian translators, the majority do the same thing, except for Tucci and Magrini-Spreafico, with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while Tucci (1921) adds “degli esseri” (of beings), therefore implying that here the character *xing* does not refer only to human beings, Magrini adds “nell’uomo” (in humans), thus implying the opposite. But the major differences concern the character *sheng* 生, concerning which both English and Italian translators provide different renderings: the problems revolves around whether to interpret it as meaning “life” (Italian: *vita*) or a condition that is related to the act of “coming to life”, thus meaning “inborn”, as in Eno’s (2016) and Ou’s translations.⁹⁰ While an equation between “nature”

⁹⁰ As highlighted by Karlgren (1972), these two characters in ancient time had a similar pronunciation. According to Scarpari (1996, 23), the character *xing* does not appear in Shang inscriptions and it was also rare in texts of the early Zhou period. Scarpari states that the radical *xin* 忄 was added in editions of Han times.

and “life” suggests that it is enough to live to realize one’s nature, a connection between one’s “nature” and the fact of “coming to light” indicates the presence of a specific nature at birth. The second translation in my view cannot be accepted, because otherwise passage 6/A/3 – where Mencius contests Gaozi’s statement - would be at odd with Mencius idea of the “newborn mind-heart” (赤子之心), which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a mind-heart (on which *xing* is based) since birth. The first translation seems instead consistent with Mencius idea that humans should self-cultivate, as they “do have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at least a part of our structure of emotions and motivations, and that we can shape them” (Nivison 1980, 107). Therefore, living (*sheng*) is not enough to realize one’s nature, which is probably the reason why Mencius rejects Gaozi’s equation between *sheng* and *xing* adopting the instrument of logic argumentation.

Besides the crucial character *xing*, some other words require careful attention when translating. Below I selected a few sentences from 6A.6, where Mencius answer’s to Gaozi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idea that “the human nature is good” (性善), that is the core of Mencius’ moral philosophy. Mencius uses to concepts, *qing* 情 and *cai* 才, which are rendered very differently in the translations compared for this article.

Mengzi 6A.6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Legge 1861	Mencius said, 'From the feelings proper to it, it is constituted for the practice of what is good. This is what I mean in saying that the nature is good. If men do what is not good, the blame cannot be imputed to their natural powers.'
Tucci 1921	Mencio rispose: “Io dico che la natura umana è buona, perché tutte le inclinazioni tendono al bene, e il male non è punto effetto

	delle nostre naturali tendenze.
Magrini-Spreafico 1945	Mencio rispose: Per sua natura l'uomo tende al bene: ecco perché chiamo buona la natura; quanto al commettere il male, la colpa non è della natura.
Ou 1959	Mencio disse: "Per sua natura l'uomo tende al bene, perciò chiamo buona la natura umana. Quanto a commettere il male la colpa non è della natura.
Dobson, 1963, p. 113	Mencius said, "It is of the essence of man's nature that he do good. That is what I mean by good. If a man does what is evil he is guilty of the sin of denying his natural endowment.
Tomassini 1974, p. 402	- Per sua tendenza - rispose Mencio - (la natura umana) può fare il bene: per questo dico che è buona. Se poi fa il male non è colpa della sua capacità originaria.
Scarpari 1991	Mencio rispose: "Per quanto riguarda la natura istintiva (<i>qing</i>), l'uomo è in grado di diventare buono (<i>wei shan</i>); è esattamente questo che intendo con 'buona'. Se invece non è buono (<i>bu shan</i>), ciò non dipende affatto dalle sue qualità naturali (<i>cai</i>).
Bloom 2009	Mencius said, "One's natural tendencies enable one to do good; this is what I mean by human nature being good. When one does what is not good, it is not the fault of one's native capacities.
Eno 2016	Mencius said, "What I mean by saying it is good is that there is that in our nature which is spontaneously part of us and can become good. The fact that we can become bad is not a defect in our natural endowment.

The following table offers a clear comparison of the rendering of these two words: it is significant to observe that both Italian translations published in Milan (Magrini

Spreafico 1945 and Carlo Ou 1959) translate these two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word, “natura” (English: nature) which is exactly the same word that they use to translate *xing*: this can be seen as a limit of these translations, because they may produce a tautology. Scarpari also uses the word “nature”, but he adds the adjective “instinctive” and differentiates *qing* from *cai*, which he translates as “natural qualities”.

Translation	情	才
Legge 1861	feelings	Natural powers
Tucci 1921	<u>Inclinazioni (English: inclination)</u>	<u>Naturali tendenze</u>
Magrini-Spreafico 1945	<u>Natura (English: nature)</u>	<u>Natura (English: nature)</u>
Ou 1959	<u>Natura (English: nature)</u>	<u>Natura (English: nature)</u>
Dobson, 1963	Essence of man’s nature	Natural endowment
Tomassini 1974	<u>Tendenza (English: tendency)</u>	<u>Capacità originaria (original capacity)</u>
Scarpari 1991	<u>Natura istintiva (English: instinctive nature)</u>	<u>Qualità naturali (cai) (natural qualities)</u>
Bloom 2009	Natural tendencies	Native capacities
Eno 2016	that in our nature which is spontaneously part of us	Natural endowment

The best translation here seems to be that of Tomassini (1974), which is similar to Bloom (2009), where *qing* are rendered as “tendencies”, and *cai* as “capacities”: while tendencies can be orientated in any direction, capacities are usually only positive and could at best be improved, but not modified so as to point to a negative direction.

The final excerpt examined in this paper is taken from the final sentences of passage

6A.6 analysed above. Here Mencius quotes Confucius (孔子)'s comment of a verse taken from the poem *Zheng Min* 烝民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Shijing 詩經). I highlighted two characters, whose translations are compared in another table below:

<p>Mengzi 6A.6</p>	<p>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p>
<p>Legge 1861</p>	<p>Confucius said, "The maker of this ode knew indeed the principle of our nature!" We may thus see that every faculty and relation must have its law, and since there are invariable rules for all to hold, they consequently love this admirable virtue.'</p>
<p>Tucci 1921</p>	<p>Confucio commentando queste parole disse: 'Chi ha scritto questi versi conosceva davvero la via della virtù: gli uomini, perché hanno degli istinti, debbono avere anche delle leggi e in obbedienza a queste prediligono la virtù”.</p>
<p>Magrini-Spreafico 1945</p>	<p>Confucio aggiunse: «Come conosceva bene il dovere l'autore di questa Ode!» Sì, precisamente perché esistono degli esseri si hanno anche delle leggi; ed è perché l'uomo osserva la legge morale che ama la bellezza della virtù.</p>
<p>Ou 1959</p>	<p>Confucio disse: 'Come conosce bene la virtù l'autore di quest'ode! Sì, precisamente, poiché esistendo degli esseri si hanno delle leggi ed è perché l'uomo ama la legge morale che ama la bellezza della virtù.” [NB: Ou non chiude la virgoletta aperta dove inizia a parlare Confucio]</p>
<p>Dobson, 1963</p>	<p>Confucius said, 'This poet really understood the Way,' Thus, to possess life is to possess laws. These are to be laid hold upon by</p>

Tomassini 1974	<p>the people, and thus they will love the virtue of excellence.</p> <p>K'ung-tzu disse: «Chi fece quest'ode conosceva veramente la Via!» Perciò, se vi sono le cose devono esserci le leggi. Il popolo fu impossessato della legge costante di natura e per questo ama le ammirevoli virtù (che gli sono state conferite).</p>
Scarpari 1991	<p>Confucio ha così commentato: ‘Chi ha composto quest’ode doveva conoscere veramente la Via!’ Per ogni cosa, dunque, c’è sicuramente una legge; la norma costante che l’uomo possiede è l’amore innato per la Virtù sublime”.</p>
Bloom 2009	<p>Confucius said, ‘How well the one who made this ode knew the Way’. Therefore, for each thing, there must be a rule, and people’s common disposition is therefore to love this admirable Virtue.”</p>
Eno 2016	<p>Confucius said, ‘The man who wrote this poem certainly understood the Dao!’ Thus for every type of thing there is a norm; that is why the constant that lies within people’s grasp is inherently a love of beautiful virtue.”</p>

The poem *Zhengmin* has never been translated into Italian, therefore Italian translators could only rely on existing renderings in English. Quite interestingly, the character *ze* is almost always rendered as “law(s)”, both in English and Italian; only the most recent versions in English propose other equivalents, abandoning “law” (which bears the meaning of positive laws) and choosing “rule” or even “norm”, the first to a guiding principle or a customary practice, the second to a standard, a model or a pattern, in both cases unrelated to a legal system based on “laws”.

Translation	物	則
Legge 1861	Faculty and relation	law
Tucci 1921	<u>istinti (instincts)</u>	<u>leggi (laws)</u>
Magrini-Spreafico 1945	<u>esseri (beings)</u>	<u>leggi (laws)</u>
Ou 1959	<u>esseri (beings)</u>	<u>leggi (laws)</u>
Dobson, 1963	life	laws
Tomassini 1974	<u>Cose (things)</u>	<u>leggi (laws)</u>
Scarpari 1991	<u>Cosa (thing)</u>	<u>legge (law)</u>
Bloom 2009	thing	rule
Eno 2016	thing	norm

Perhaps the most interesting issue concerns the rendering of the character *wu* 物: recent translations tend to render it as “thing(s)”, while another possible translation is “beings” (probably referring to the expression *wanwu* 萬物). Only two exceptions stand out as be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all the other: Legge (1861), who translates it as “faculty and relation”, and Tucci, who renders it as “instincts”. Here I will only make some considerations about Tucci’s translation, which in my view alter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xt. To make it accessible to non Italian readers, I first translate it into English:

Tucci (1921): *“Confucio commentando queste parole disse: ‘Chi ha scritto questi versi conosceva davvero la via della virtù: gli uomini, perché hanno degli **istinti**, debbono avere anche delle **leggi** e in obbedienza a queste prediligono la virtù’”*.

English translation (mine): *Confucius said, 'The man who wrote this poem indeed knew the way of virtue: because men have **instincts**, they must also have **laws** and it is in obedience to those laws that they favour virtue.*

Tucci's translation conveys the idea that *laws* are necessary to control human *instincts* and guide men towards virtue. This idea is rather far from the nucleus of Mencius moral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as naturally tending towards good as much as water tends to go downwards. Tucci's translation of *wu*, which finds no equivalent in any other translation considered in this paper, seems to express the view of the human being prevailing in Euro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deriving from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Such a theory, which perceives the human being (especially the new-borns) as driven by perverted instincts that need to be controlled, was much useful to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as the fascist one. Thus we may hypothesise that, in this sentence,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ose decades might have played a role in Tucci's quite atypical lexical choice. As noticed by Nivison, the way Mencius' passages are translated "affects substantially how Mencius' philosophy as a whole is interpreted".

4. Conclusions

The works listed above can be grouped into three phase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period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y were produced:

- First phas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21-1945), only one translation available (n. 1);
- Second phase: post-war until the '70s, with two translations, both fostered by Luciano Magrini in Milan (nn. 2 and 3);
- Third phase: academic translations, both made in Venice by pupils of prof. Lionello Lanciotti (nn. 4 and 5).

We can observe that translatio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hase tend to privilege readability rather than scholastic accuracy; they are therefore deprived of any critical apparatus and address the common reader without highlighting problematic passages or translating issues deriving from textual difficulties. Tucci's translation seems to result from a more accurate meditation on lexical choices, as shown by the example concerning *aing* and *cai*; in this sentence, the rendering of Magrini spreafico (1945) and Ou (1959) neglect a lexical distinction available in the original and are thus confusing. Still, the cultural climate of that time seems to occasionally influence Tucci's translation, something which risks to distort the original meaning. As for the third phase, texts of this period are methodologically grounded on a higher level of accuracy and provided with critical explanations that make this text more accessible to readers wishing to grasp its theoretical contents. Finally, from an editorial point of view, it is first important to observe that none of these five translations contain the original text in Chinese: if this was understandable in a period when only few Italian readers could read Chinese, now that the number of Italian students of Chinese has largely increased (together with that of and that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Italy) it is time that more translations are published to provide competent readers with more tools to approach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us have direct access to Mencius moral philosophy.

References

Bauer, Riccardo. *Luciano Magrini: il pensiero e l'opera*. Milano: Tipografia Corbella, 1959.

Bloom, Irene. *Mencius*. Kindl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D'Arelli, Francesco. *La Cina in Italia. Una bibliografia dal 1899 al 1999*.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2007.

De Martino, Gaetano. «Luciano Magrini. Sinologo e fondatore dell'Istituto culturale italo-cinese.» In *Luciano Magrini*, 17-22. Milano: Tipografia Corbella, 1959.

Knechtldges, David R., e Taiping Chang.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 Reference Guide*.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Lippiello, Tiziana (a cura di). *La costante pratica del giusto mezzo. Zhongyong. Testo cinese a fronte*. Venezia: Marsilio, 2010.

Nivison, David S. «On Translating Men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0, n. 1 (1980): 93-122.

Scarpari, Maurizio. *La concezione della natura umana in Confucio e Mencio*. Venezia: Libreria Editrice Cafoscarina, 1991.

Scibilia, Corrado. «Luciano Magrini.» In *Treccani online*, di Corrado Scibilia. Roma: Treccani editore, 2006.

Tomassini, Fausto. *Meng-Tzu (Mencio)*. Milano: TEA, 1974.

Yang, Bojun 杨伯峻 译注. *孟子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跨文化流動與主體認同——蔡守「擬西方」博物圖畫研究

鄭文惠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兼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副主任

講綱

中國近代面臨極其複雜迂迴、快速變動而高度壓縮的現代化轉型，近代國粹學派知識分子無論藉由畫學理論或創作實踐，毋寧是在一種復興古學與西學新知相互激盪下產製的新知識結構下進行畫學改良以開啓民智，建立現代常識理性的思想啟蒙運動，這不僅接續、轉化自乾嘉考據之學、經世之學的現代化轉型，也延續了《奏定中學堂章程》美術隸屬於器用之學的觀念，強化在實學的範疇上，寫實繪畫具有推動物質文明發展的力量，肩負社會進化與國族認同的作用；在西方寫生與博物新知及現代美術史/考古學視野與報刊媒體、攝影媒介等觀視技術下所帶來的視覺現代性經驗，國粹學派知識分子操演一種技術化視覺性 (technologized visuality) 話語，進行現代感官革命與思想啟蒙，推進了乾嘉考據之學的現代化轉型，也將朝貢體制下的異物圖志，翻轉為愛鄉即愛國的在地化主體認同與視覺現代性實踐，而展現為新時代的新的社會行動策略。

本文以國粹學派知識分子視覺現代性實踐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蔡哲夫 (1879-1941) 1906-1911年間在《時事畫報》、《國粹學報》等新媒體空間中「擬西方」

博物圖畫的系列畫作所涉及跨文化流動與主體認同為探討核心，分從：進化與古學：科學求真與神異思維的翻轉；博物新知與主體認同：異物「抄生」與技術化視覺現代性；國族意識與文化啟蒙：跨文化流動與價值競技；求知求真與愛鄉愛國：現代常識理性與視覺現代性等面向論述之。

一、進化與古學：科學求真與神異思維的翻轉

蔡守刊載於《時事畫報》1906年第33期〈古翼鳥圖〉(圖像來源：Dennis Hird 著 *A picture book of evolution*)，雖源自於西方博物志的插圖與圖說，但透過跨語際實踐的文化翻譯過程，圖文的互文性美學結構，在生物進化的知性基調下，又援引古學系統中的神異思維，質疑其中不符合生物演化的進化過程，進而翻轉了古翼鳥作為鳥類始祖的可能性。由於蔡守強調作為現代知識人——「通人」，須破除無法徵實之說，以彰顯科學求真的精神，因而《國粹學報》1907年9月第3卷第9期博物圖畫八〈狐〉(圖像來源：Richard Lydekker 著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之圖文印的互文性美學修辭策略，以西學博物新知為基礎，立基於邏輯性的論證，知性的翻轉了中國傳統狐的文化信仰與神異思維。在以物證物的過程中，又以精確性的計量，強化了推論的邏輯力量。而依據計量單位的新式精確性量化形式，作為生物物形及身體生產性或能動性的表述方式，不啻是一種新的科學思維所開展的現代時間/空間感知形式與敘事邏輯，這種精確性的科學計量的敘事寓言，翻轉了傳統的敘事秩序，帶入了現代科學化的知性經驗與敘事邏輯。

一、博物新知與主體認同：異物「抄生」與技術化視覺性

《時事畫報》1906年第36期〈鹿角螺·食肉草〉，係蔡守游賞於坎角嶺的實物

寫生；《國粹學報》1907年5月第3卷第5期〈食蠅草〉為重寫前一年在「合浦之地角嶺」所見。兩幅畫都藉由圖/文的互文性結構產製了西方新知識，除彰顯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外，也補實了在地物種的傳統缺漏，豐富了在地物種的科學新知，呈現出對在地性風物的徵實與重視。而〈食蠅草〉「筆癢」的起首章呼應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新知孜孜汲汲的求知精神，題跋之末載記：「丁未夏午順德蔡有守喆夫揮汗抄生。」「抄生」表明〈食蠅草〉是結合實地寫生與仿西方博物圖錄之作。「抄生」或許可統合為蔡守一系列博物圖畫的視覺現代性實踐的創作方式。

《國粹學報》1909年3月第5卷第4期〈博物圖畫七十·餅草〉也是蔡守博物新知之食肉草的「異草」系列圖繪。其妻蔡張傾城題識首揭「餅草」的英文學名及日本所譯漢名，卻因日本所譯漢名不雅，而改易為「餅草」，足見在跨語際實踐過程裡不同文化角力下爭奪話語權的價值競技。題識文字由博物「求真」之科學精神的追求，連結到西方宗教信仰；由異邦移植之否認到遼厓窮谷的在地踏查與實徵。而左下方「豈徒玩物理，亦欲長智」印文，更標顯出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探索世界萬物的基本核心要義，這無疑變轉了宋明理學以來格物致知係作為中國傳統文人追求天理，體悟道體的道德修身實踐的重要方式，愛智、長智成了支配中國近代新型知識分子在跨語際實踐過程裡參與全球知識流動的新的文化邏輯，也開啟了中國「抄生」、「寫生」新的「求知」、「求真」的審美範式。遊歷踏查、實物實徵與博覽中西群書，及「知性」、「寫實」的圖/文美學再現，成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視覺現代性的日常實踐。

又如《國粹學報》1907年7月第3卷第6期〈鴉詩地安〉(圖像來源：James

Dennis Hird著*A Picture Book of Evolution*)(蔡守譯為渴德《天擇圖說》),並非直接翻譯原書“*Ascidian*”圖說,而是依據原書單元知識體系進行理解而統整並有所轉化而來。圖/文的互文性結構,強調中國一南一北地方風物的徵實與再現;更在全球化知識流動的大文化框架,以西學新知補實中國傳統博物學之不足與缺漏,並藉新興的媒體空間傳播科學新知,介紹本土風物與全球物種的演化歷史,以進行文化啟蒙,進而開啟民智。這是一種透過西方現代博物知識對中國本土早已存在的物種重新命名,並作科學化介紹與解釋,承載了本土地域意識與主體認同,及傳播世界新知的啟蒙意義與情感特徵。

二、國族意識與文化啟蒙：跨文化流動與價值競技

《國粹學報》1907年9月第3卷第9期博物圖畫七〈雲南貓猿〉係根據英國著名博物學家和地質學家 Richard Lydekker(1849-1915)因應當時對圖文並茂的普及性博物史書籍的廣大需求而編纂出版的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 一書而繪圖。而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 序言提及書中插圖主要出自 *Brehm's Tierleben*(原名 *Illustriertes Thierleben*)。是 Alfred Edmund Brehm(1829-1884)等人用德文編纂出版(初版6冊在1864-1869年出版;二版10冊在1876-1879年間出版)的一套圖說動物學書籍,書中插圖多由擅長繪畫動物的德國畫家 Gustav Mützel(1839-1893)、Wilhelm Friedrich Kuhnert(1865-1926)等人繪製。比較英、德二書,可見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 一書的材料選擇及敘事邏輯,明顯是以殖民者的角度觀看“Loris”,殖民地理空間範域下廣大的地域是“Loris”的生存區域,也是帝國霸權權力主宰下的馴化空間,“Loris”的圖說文

字充滿殖民帝國以政治道德的優位，對遲鈍的、笨拙的、怯羞的、小丑般的、情性的、暴戾的、嗜血的、貪婪的“Loris”展開一系列馴化的過程，無論是“Loris”的習性或分布區域分明可見權力地理的烙痕。而 *Brehm's Tierleben* 一書藉由田野調查及旅行家之眼生動的介紹“Loris”，除客觀描述“Loris”的特徵、習性外，更多著墨在“Loris”類人的性格、情緒。雖然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 一書的圖畫完全仿自 *Brehm's Tierleben*，但圖說文字加入了英國本土的田野調查及科學研究報告與實際的豢養經驗，而明顯呈現出殖民者觀看他者、馴化他者的權力寓言。“Loris”成為殖民帝國馴化的他者化客體，是殖民霸權以帝國權力之眼凝視他者的隱喻。這一場馴化或豢養的寓言，展演了殖民帝國在權力地理空間中高度的統治道德的優位與權力宰制下以科學為名的殖民帝國運作邏輯。

至於蔡守〈雲南貓猿〉之題跋所述物種特徵，除以西學博物新知補足中國地方風物及博物圖志之缺漏外，往往從中重新商榷中國傳統博物群書所論之不符應科學新知之處，並藉以糾錯正謬。而蔡守雖摹仿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 原畫貓猿之物形與物姿，卻突出貓猿張目逼視眼前觀畫者之狀，至於深凹的皺褶線條，並非如西畫突出身體的肥贅與笨重，反而模糊了原畫動物的身體量感，而更逼似於中國傳統以線描呈現動物的肌理，而益顯其滄桑與老邁。此外，蔡守置換了原畫貓猿居於深林，棲於樹上的空間結構，保留其夜間活動的習性，而以半邊構圖傾仄的畫面，畫出貓猿高踞於危崖上，旁襯以一輪隱約可見的圓月、月暈與浮雲，這無疑是以西學新知的圖像，強調定格聚焦的單一化主體畫面，再置換為中國傳統文人畫的陪襯物及結構風格的新畫法與新畫風，且日後也發展為嶺南畫派畫獅

畫虎等動物畫的構圖模式——視覺焦點動物為畫面主體，再配上岩壁或明月等。至於「雲南貓猿」之命名，更係蔡守所發明，其一因其「眼類貓，能無光而開斂」之物性；其二存然出之於友朋餽贈物「安南」之所由來；其三，蔡守以之掌握「雲南貓猿」命名之話語權，且改變畫面空間配置，或為一者強化而改變了“Loris”荷蘭國「笨」之意，及印度“Sharm.indi.Bili”「怯」之意，蔡守將雲南貓猿高踞於危崖上，以南宋馬、夏以來「殘山剩水」半邊構圖方式隱喻家國喪亂，實質已置換了「雲南貓猿」「足不履地，行甚遲鈍」之物性，而益增其「平時不鳴，唯怒則鳴，聲甚悲壯」之具個人化情感特徵乃至於集體國族意識的時代隱喻，而深具悲劇精神與覺醒意味，如同 1903 年《新民叢報》以一頭飛撲地球的獅子作為封面，昭示了巨獅由睡轉醒的關鍵時刻。雲南貓猿由英、德「笨」、「怯」、「足不履地，行甚遲鈍」的形象翻轉為蔡守筆下高踞險崖，悲壯而鳴的形象，無疑如同 1903 年以來流行的醒獅意象所表徵的國族意涵。因此，或可說命名是權力的表徵，而由命名而來所開展的敘事行動，是認同的開始。

又如《國粹學報》1908 年 6 月第 4 卷第 6 期博物圖畫五十二〈勺嘴鳥〉依然參考 Richard Lydekker 編纂的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若對照 *Illustrirtes Thierleben*，兩書均以勺嘴鳥水濱覓食為主體，但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 置換 *Illustrirtes Thierleben* 水邊花卉草木的背景為一片蘆葦，一飛翔的勺嘴鳥則改為在江邊築巢。相較而言，*Illustrirtes Thierleben* 除描述勺嘴鳥的總體特徵外，藉由調查報告和多人的親身經驗，證實荷蘭、多瑙河岸的低地、南俄羅斯、整個中亞地區、中印度以及北美洲，甚至希臘、義大利、法國南部以及西班牙、西伯

利亞南部地區、中國南方冬季、印度皆可見其蹤跡，以及孵化、繁衍狀態。只是有些區域尚未被認知；但在亞洲或西方，皆已將納入動物種類的歸屬中。而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 除描述 “Spoonbill” 的總體特徵外，也依據進化思維，將 “Spoonbill” 置入鳥類大家族體系裡有所聯繫並述明差異，而介紹 “Spoonbill” 時，則著重殖民帝國權力地理空間中的分佈與繁衍。

至於蔡守〈勺嘴鳥〉題識文字依照對 *The Royal Natural History* 的理解，作了大幅度的刪減與汰選。原書以殖民者話語著重物種分布的權力地理，尤強化了朱鷺與琵鷺的神聖與美麗，以美化帝國權力；但也由於是一本有體系的博物學專書，又正值進化論的熱潮，因此介紹物種時，除突出物種的專有特徵外，也連結物種家族體系的共同特徵，並區辨不同家族成員間的差異；而蔡守則以國族本位立場，綜合著本土意識與日常實徵，借用西學博物新知，只挪引原書中勺嘴鳥「除北極外，幾隨處有之」的「世界性分布」外，圖說文字隨即聚焦於中國北方及自己親眼所見之情境，其間再雜陳原書所介紹的生物特徵與物種習性，汰除了原書中荷蘭勺嘴鳥及印度等地不同的習性，及極北以外，遍布於歐洲大部分地區，東部則延伸至南西伯利亞至阿穆蘭和中國北部；南部地區包括印度和北非等勺嘴鳥在英帝國眼中殖民地的分佈範圍與狀況，而挪移置換為中國北方勺嘴鳥的整體介紹，更未及於物種相同家族共同特徵的連結，或與不同家族成員差異的區辨。蔡守勺嘴鳥之圖/文的敘事邏輯及修辭策略，依然一貫以西學新知/傳統博物、全球物種/在地物種為對照框架。蔡守認為勺嘴鳥係中國北方原有之物種，朋友又從蜀地豢得，自己親眼所見，卻無法從傳統博物典籍中獲致在地物種的現代認知，因此，

乃翻譯西書，仿繪圖像加以圖志。而蔡守所仿繪的勺嘴鳥，畫面主體突出一隻孤獨的勺嘴鳥於江岸垂喙取食之狀，刪減原畫蘆葦的背景及另一隻勺嘴鳥，純然不設背景，也簡化畫面，使主體更鮮明，除了物形與姿態和原畫相仿外，蔡守所畫勺嘴鳥仍是以中國傳統筆墨線描方式呈現勺嘴鳥的毛羽和鳥喙，眼神也無原畫精銳有神，而顯得有一絲落寞之感。蔡守變改了原勺嘴鳥群集性的生物特徵，只畫一隻江邊孤獨的勺嘴鳥，若配合畫面右側「煙波江上使人愁」之方印，則知勺嘴鳥之圖/文/印的互文性美學修辭策略，突出了「日暮鄉關何處是」之家國喪亂的國族意識。或可說一幅簡單的博物圖畫，除承載了西學新知的啟蒙意義外，同時也增補傳統博物知識之不足與缺漏；再者，更是國族認同的開始。

四、求知，求真與愛鄉/愛國：現代常識理性與視覺現代性

中國傳統繪畫的寫生觀念源於儒學的格致傳統，觀物為了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在於求道體道；格物致知指向於道德修身的實踐，觀物格物在於內省進德，是修身過程的重要步驟。即使禪宗格物，也在於呈顯砍柴劈竹，道在日常，或破而後立，不拘我執。而「寫生」一詞帶有西方科學認知的繪畫觀念，係隨著「求知」、「求真」的現代科學精神而開展的。又由於攝影技術的傳入與普遍，帶入了更多的科學理性的認知，同時促成了認知範式的移位及審美文化範式的轉向。世界萬物或在地風物成了觀看的實物，係畫家此刻性作畫的觀看對象，視覺的共時性同時生發在「實物/圖物」與「畫中的物」，也同時生發在我與萬物的「存在」與「塑形」的過程裡；在觀看、塑形的過程裡，「畫中的物」的「視覺性」既是其進行科學觀察與描寫的具客觀性的寫生「實物」或抄生「圖物」，但又與「真實的我」

的生存境遇與主體情感構成了多元轉喻的關係。

蔡守於1906-1907年間在《時事畫報》以「擬攝影」、「抄攝影」、「臨攝影」的模擬抄仿的美學實踐方式發表了〈蜀中山水〉、〈揚子江馬當山炮壘圖〉、〈北海之濱〉、〈變種鴿〉、〈古翼鳥〉、〈萬卷書石〉等山水、博物系列畫作，並藉由新媒體空間標顯「擬攝影」、「抄攝影」、「臨攝影」、「抄生」是「我用我法」的一種新的視覺現代性的美學實踐。這種結合攝影、寫生，及臨摹抄仿西方科學插圖的美學修辭策略，無疑是蔡守作為國粹學派知識分子在追求西學新知潮流與古學復興運動下，所開啟的一種全新的美學實踐，這是一種理性科學化之視覺現代性的文化選擇，既改變了傳統繪畫美學，也轉化了博物體系與觀物思維，也是與西學新知與新的觀視技術進行文化協商所再現的一種跨語際視覺美學實踐。同時藉由新的媒體空間與觀視技術所開啟新的寫實性繪畫，也是改良畫學、復興古學、傳遞世界智識，以開啓民智，建立現代常識理性的思想啟蒙運動。在接續、轉化自乾嘉考據之學、經世之學的現代化轉型，及注重實學的寫實性繪畫修辭策略下，蔡守操演一種技術化視覺性話語的同時，已然肩負了社會進化的責任與國族認同的作用，這是在西學新知與傳統舊學對話脈絡下所呈現為一條極為迂迴複雜的以科學知識及觀視技術復興古學，以進行現代感官革命與思想啟蒙之路。

如果說乾嘉之學開啟歷史考證學之風，則以蔡守為核心的《國粹學報》博物圖畫系列及其在《時事畫報》、《真相畫報》的擬攝影之作，無疑開啟一種兼具西方科學新知、攝影媒材與技術及目驗、徵實與經典互證、鉤稽參驗的新工具與新方法，使傳統考據現代化轉型下與西方科學知識有更密切的聯繫。這種破除傳統，

不再以傳統美學經驗為藝術價值的最終依歸，蔡守具體展現為開放多元的接受西學新知與新的技術文明。寫生、攝影與傳統中國繪畫最大的區辨即在於定點突出主體，以攫取瞬間最強烈的視覺感，而不同於傳統繪畫焦點透視，移步換形的美感。而徵實寫生，更是一種科學客觀的知性呈現。蔡守在新興的媒體空間中以一種新的觀視技術，結合攝影、「抄生」與「目驗」，以新的圖/文/印的互文性美學結構，表述一種「求知」與「求真」的新的感官經驗與理性精神，除展演了國粹學派知識分子復興古學的一種結合中/西、傳統現代的美學實踐路徑外，在以寫實性圖畫結合現代科學知識解說的同時，透過西方現代博物知識系統對中國本土早已存在的物種重新命名並作科學化的介紹與解釋，補實了在地物種的傳統缺漏；透過在地性風物的徵實，也豐富了在地物種的科學新知，這種在地化視覺現代性的美學實踐，承載了高度的愛鄉即愛國的在地意識與主體認同，更在媒體空間中進行了一場以博物新知為核心的視覺現代性的美學實踐及現代常識理性的文化啟蒙。

冷戰前期星馬華文禁書與華人文化建構/結構

莊華興

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學程副教授

講綱

華人於十九世紀中晚期開始大量移居南洋，形成了稍有規模華人社群。到了上世紀二〇年代中晚期，南京國民政府清黨導致不少文人、知識份子逃往南洋避難，再經歷抗戰到 1949 年大陸建立新政權，南洋逐漸成為文人、知識份子流亡與避難的大後方。文人久居此地，逐漸培養起南洋在地意識。1934 年 3 月 1 日，丘士珍以費名為筆名在《南洋商報·獅聲》發表短文《地方作家談》，馬華作家意識開始萌芽，也可視為馬華文化建設的起點。

然而，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旋即迎來了東西冷戰，馬華文化建設在殖民主義與當地民族主義的逼迫下，不得不向冷戰妥協，文化建設愈行艱難。

冷戰大致始於 1947 年，以二战後美蘇之間的意識型態對立為起點。1949 年初，美國國家政策顧問喬治·佛羅斯特·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奉命起草《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開始關注東南亞國家作為美國在東方的經濟與政治戰略地位。1956 年 7 月，美國政府有感於東南亞華僑問題的重要性以及目前華僑政策的不協調，決定由行動協調局(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制定一項統一的東南亞華僑政策，這時候，東南亞華僑成為美國反共必須爭取的對象。因此，美國揉合內政與外交管道，對東南亞華人展開了全方位的宣傳攻勢。這股攻勢首先訴

諸直接對抗的方式，即爭取華僑參與反共，鼓勵星馬華僑支持臺灣國民黨政府。這股戰略引起東南亞國家的不滿，這時候多數東南亞國家已獨立建國，美國於1956年改弦易轍，鼓勵華僑融入居住國，並有限度給予華僑結社的自由，一直到1964年，美國的宣傳攻勢才逐漸緩和。這段期間讓我們見證了東南亞華僑如何被卷入了美中的亞洲冷戰，以及美國善加利用文化冷戰策略，以抑制東南亞華僑靠向共產中國。

1957年12月11日出臺了長70頁的文件《美國對東南亞華僑政策的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CB Report, December 11, 1957, CK3100159358, DDRS)，其內容是鼓勵東南亞國家以溫和的方式促進華僑融入當地社會。為了貫徹這項政策，首先是切斷他們與文化母國的關係，俾加速華僑的融入乃至同化。這項政策方針符合英殖民政府戰後回返馬來亞，並設法延長它的殖民統治的野心。

一直以來，華僑文化滋養獲得母國文化的補給，尤其是華文學校的開辦和華文讀物的供應。進入冷戰前期第二階段(1956-1964)，東南亞國家一方面鼓勵華僑融入當地社會，一方面頒佈禁書令，禁止中國和香港出版的書籍在新馬兩地流通、傳播與收藏。另一方面，美國以香港美新處為中心，向東南亞華僑社會提供文化出版的資助，以填補禁書令留下的空白。在東南亞國家從內部的嚴打(禁書、禁歌曲/唱片、禁影、查封社團)與外部強勢的美元戰略，成功扭轉了以尋求經濟安穩為首要考量的華人移民社會的態度。然而，學界談文化冷戰，迄今多著眼於美元文化，對東南亞國家內部的禁書令或廣義的文化禁令未見有著墨。本文認為，

美國的文化冷戰，無論是透過銀彈攻勢（美元）或宣傳，不僅直面華僑（如亞洲基金會和香港/新馬友聯），也跟東南亞當地政府合作或配合，嘗試截斷華僑的文化補給。五十年代雷厲風行的禁書令即是文化冷戰之一環。

星馬禁書情況

戰后新馬禁書令最早出現於 1949 年。是年 2 月 26 日《南洋商報》第 5 版刊出一則新聞《教科書一種被禁止》，即英軍實際向新馬兩地左翼人士、左翼政團宣戰（俗稱緊急狀態）八個月之後。換句話說，軍事圍堵和文教圍堵同時進行，馬來亞全國華校教師會總會（簡稱教總）在此時成立，林連玉在此時登上馬來亞歷史舞臺，這些皆並非偶然。同時也說明東南亞冷戰和殖民主義互為表裏、相互需要之事實。發動冷戰是為了反共、打共、滅共，是意識形態對決，冷戰則為殖民主義者提供方便，延長了新馬兩地的殖民統治。

隔年（1950 年），英殖民政府開始雷厲執行禁書令。1950 年 7 月至 9 月，新加坡連續三次發佈禁書令。首先見於 7 月 8 日新聞，題曰《禁止刊物一批》，7 月 15 日和 9 月 30 日新聞頗為聳動，題作《禁書又一大批》。緊接著，9 月 21 日聯合邦政府也發佈 39 種禁書。這是第一波禁書令。

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亞取得獨立，為了鞏固統治政權，親英的新興權貴加強反共措施。1949 年共產中國的崛起以及執政大陸，東南亞當地政府把華僑視為中共在海外潛伏的第五縱隊，對華僑更為敵視。

到了 1958 年，新馬兩地的禁書令更有針對性，打擊範圍也更大。新加坡政府於 10 月 23 日援引不良書刊法令禁止中國及香港五十三家的出版物輸入新加坡，同時撤銷六家小報和一家雜誌出版執照。同年 11 月 8 日刊登新聞——《中

國香港出版社出版物，星馬分別予以禁止，六十八家中只新中國一家出版物星馬俱準輸入，星禁止五十三家馬禁止三十家，其中受雙方禁止者共達十六家》。顯然，本次禁書令是針對出版社以及該出版社的所有出版物，因此，引起了新馬華社的質疑與不滿。

星馬雖分屬兩個不同的自治區，各有禁書條例。然而，兩地華文書業相互依存。星加坡作為國際交通樞紐，進出口貿易頻繁，馬來亞聯合邦則有不少的華校和華人子弟，因此成為新加坡華文書業者的市場。

馬來亞聯合邦則更早實施禁書令。1955年8月18、19兩天公佈禁書名單，新聞稱凡擁有或收藏者將以違法論。此後，幾乎每年都頒佈禁書令。最嚴峻的是從1958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分四天五版於《南洋商報》刊登禁書名單。甚至新加坡的五家華文刊物申請在聯合邦出版亦遭當局拒絕發給準字。

五十年代兩次禁書分別代表冷戰前期(1947-1964)前後兩個階段。但是，第二階段的禁書比第一階段(1947-1955)更嚴厲，同時也見證了冷戰策略對華人從強硬到軟硬兼施的過程。《南洋商報》在1961年9月6日的報導中透露，新加坡政府禁止的香港版中文書總共有十萬本。截至1965年杪，聯合邦的禁書也有八百二十九種刊物以及三十種出版社書籍被禁。這種趨勢早有跡可循，“1940年，正當大東亞戰爭前，上海的印書館，不包括華語課本在內，在海外華人間就銷售了近五十萬本書籍。”如果考慮海外華人識字水平偏低，這個數字就很可觀。加之南洋大學於1956年創辦起來，對中文書籍的需求更大，也需要更專業的書籍。實際上，馬華文化建設就在冷戰前期提上了議程。

禁書與冷戰並行

事無湊巧，馬來亞聯邦政府於獨立建國前夕頒佈禁售廿九家出版物。這發生在東南亞冷戰正酣之時，顯然殖民政府開始改變策略，進行文化圍堵。對這大規模的禁書令，星加坡一位讀者亞里對當局給出的理由感覺無法理喻，因為當局是打著“紅色書籍”的理由禁售華文書，但同時卻允許英文赤色書籍售賣，同時指出了問題的真相：“聯邦政府甚至於不問是否共產主義書籍，凡中國大陸廿九家出版社的出版物一律禁售。……“華文教育被歧視，連華文書籍也遭殃。另一位署名兩地人的作者在其文中沒有否定禁止廿九家出版社的紅色出版物或政治書籍，對於禁書目的——“危害本邦之治安”，亦為建立和平康樂的“馬來亞國”設想也表示認同。然而，當局禁書的手法，是典型的“有殺錯，沒放過”的冷戰思維。簡略說，當局將禁書出版社出版的其餘書籍或代理的其他書籍一概禁絕之。查所禁止的書籍，並非全是政治政治性書籍，在 1958 年 10 月 23 日頒佈的禁書令中，即包括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

此外，馬來亞聯邦政府一方面禁止政治書籍，另一方面卻默許“文化協會”（指英國文化協會）配給華校一批具有宣傳意味的政治書籍，如《共產主義運動簡史》、《中共的幹部教育》、《中共政權第五年》、《史達林罪行秘史》等等，可見殖民政府開始著力打擊中國和蘇聯共產主義陣營，圖隔離華人華僑與它的關係。而“文化協會”，有讀者揭露這個單位曾“把許多新聞片借給各學校放映”。它藉此進行宣傳的意味再明顯不過了。

緊接着，新加坡自治政府於 1958 年 10 月 22 日援引“不良出版物法令”頒佈禁止共產中國 43 家，香港 10 家，合計 53 家出版社出版的書刊和唱片輸入新

加坡，或在新加坡銷售與流通。該法令第三節所賦予的法律權限，宣告政府有權隨時宣佈禁書。猶有進者，“收藏和擁有”有關禁書在第四節條文第二小段之下亦屬違法。翌日的新聞又報導，在被（新加坡）禁止的共產中國的四十三家出版社當中，包括科學、衛生、教育、技術、郵電、美術、唱片、財政經濟、體育、工程、電力工業、機械工業、音樂、戲劇，以及文藝的出版社。這項禁令的衝擊自然不小。《南洋商報》記者鄭秀民撰寫了一篇特稿《收藏禁書是不是犯法？》，分析了該禁書令影響之層面。“禁書種類多至千種以上，價值可能在一百萬元以上，……至于無數個人擁有的禁書，其影響就大得多了，可能在數千萬元以上。”

聯聯邦政府兩次的大規模禁書在華人社會與華文書業者的爭取之下，終以折中方式解決。雖然有關方面否認它有意抑制華人文化的發展，但禁書令造成的破壞與創傷的確是一個事實。首先是書商與讀者因售賣、發行或收藏禁書，惹上無妄之災。無論是遭罰款或書籍被充公，都造成龐大的損失。其次，是黃色書刊乘虛而入，占據了禁書令留下的空白，華人文化一夕之間變得輕浮與庸俗，1953-1956年被方修定位反黃運動時期恰好說明當時的社會現實。其三，是香港連環圖書（俗稱公仔書）趁虛而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局對《毛澤東選集》的處理手法。中文本被禁止公開銷售而英文本卻不受禁令所限。當局給出的理由是“中文本的《毛澤東選集》是因為書名被禁止的，而此禁令適用於此書的任何譯本。如果英文本的書名與中文本同或事實上由中文本翻譯的都屬禁止的書籍。”。這已無關保證本邦安全與利益，而是把中文語言視為共產主義的載體，而共產中國是華文書籍的源頭。華僑與中

國的這層文化關係必須截斷。當時在馬來亞新山行醫的韓素音知道英人恐懼的是甚麼，她一針見血的指出：“當然，扼制華人文化是為了反對共產主義，不讓年輕人通過語言媒介受到思想灌輸。新加坡大學的英國教職員和政府官員們非常有把握認為英語教育能夠預防共產主義思想”。

殖民主義者也有意無意的對殖民地人民的文化進行踐踏，禁書令進一步突出了這種現象。當時殖民政府發言人即辯解道：“受英文教育的人的文化水準較高，他們有判斷的能力，不受異端邪說的影響，所以華文、巫文、印文的紅色或黃色的書籍要禁止，英文的書籍卻網開一面，用不著禁止。”。

在冷戰架構中，很顯然的語言已成為可疑物證，因此一切與該語言有關的實物必須加以銷毀或根除，包括書籍、電影和唱片。倘若沒有這些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所說的文獻式文化，馬華文化就只剩下草根階層的生活內容。

禁書令雷厲推行後突然出現不少黃色書刊、小報和連環圖書等次文化現象。自 1953 年初，新加坡陸續出現禁止和掃蕩淫猥小說、淫書、春宮圖、脫衣舞表演等，以及讀者、家長對黃色書刊氾濫的憂慮以及反黃的討論，一直到 1958 年 7 月中，情況才稍有緩和。從 1960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初，又有新情況，連續五天 (見 6/27、6/28、6/30、7/2、7/6 新聞)，新加坡警方採取行動，取締連環圖書以及政府在憲報公佈禁止香港十家連環圖輸入的新聞報導。聯合邦這廂，亦有人呼籲明文規定何種刊物為淫褻書籍，從 1959 年 2 月至 1960 年中，聯合邦終於大動作掃蕩黃色書刊與禁止連環圖輸入，民間也召開座談會表達反黃的決心。此番禁黃書與反黃運動，也引起了人們對何謂淫褻刊物的討論以及具體對勞倫斯

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討論，如章《《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是怎樣的一本小说》、劉前度《談《查泰萊夫人之情人》》。色情與情色固然可以辦證，連環圖書的輸入是否如官方所言，趁機渾水摸魚，亦值得深究，但兩者出現在冷戰嚴厲禁書的年代，首當其衝的自然根基薄弱的華人文化。星馬兩地書業界和華人社團領袖表示擔憂並非毫無道理。

小結

中國人移民南洋雖可上溯唐代，但中國南方閩粵瓊三省出現大量華工移民南洋，尤其是星馬兩地，是清末民初以后的事。由於移民者以草根階層為眾，少部分人士致富之後上升為商紳階層，知識階層似有還無。星馬華人研究學者顏清湟曾指出，華人社會結構中并沒形成“仕”的階層，此自然是受歷史條件所制約。因此，華僑文化的建設始終倚賴文化母國的滋養和補給。而華僑文化陣地主要是華校和華報，禁書令對馬來亞華社衝擊之大不難想象。譬如 1957.01.08《南洋商報》的一篇報導中，馬來亞民眾圖書館去函聯合邦輔政司，請求收回禁止中國廿九家出版物之成命。對於禁書令的衝擊，馬來亞民眾圖書館道出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倘如目下掃數不準該廿九家書局之刊物在馬售賣及流通，則現時之民眾圖書館及學校之圖書館，將不能存在。尤其，戰前出版之開明書局書籍，其中不乏優良者，倘予以禁止，實為聯合邦文化發展之一大損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在致馬華商聯會的函件中稱“禁令範圍過太廣泛，不獨打擊星馬書業界營業，且將阻塞正當的文化交流。移民文化界雖與文化母國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不能否認移民文化的自主性。新加坡中華商會提到的文化交流便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禁書令原來的目的是打擊共產黨勢力滲透新馬華僑社會，然而，無視內容的盲目禁書令無疑是對僑社文化建設進行釜底抽薪，是致命的打擊。

到了 1961 年底，書市上出現缺書情況。星加坡社陣主席兼女皇鎮議員李紹祖醫生在立法議會中追問為何舊政府時代可以買到的書現在卻買不到，內政部長王邦文在答覆中給出了三個理由，包括中國正在實施經濟計劃，生產只為了滿足國內需求；中國缺乏物質，供應不繼；讀者有限，老板不愿輸入。第一和第二個理由把缺書責任推搪給供應國，第三個理由則無法解釋前政府時期的讀者，何以在短時間內對各種類書籍的需求發生劇減。

學界談文化冷戰往往聚焦於美元文化或美元策略，本文所談的是文化冷戰的另一個面向，多被研究者忽略。作為殖民/后殖民移民社會，族群文化建設除了受主觀條件制約，客觀條件限制形成最大的阻礙，它甚至可以改變一個移民文化的航道，對移民文化的改造與形塑。星馬冷戰前期頒佈的禁書令證明它是一個有效的工具。

流動中的「根著」：戰後至二千年代的香港文學

陳智德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講綱

一、流動：流徙離散與承續轉化

本土與非本土，並非一個如同硬幣正反面對立的轉變，實存在更複雜的辯證，如果換另一個角度去尋找另一組同具辯證的關鍵詞作為思考或論述戰後至二千年代香港文學的參照，也許就是「流動」(flows)與「根著」(rootedness)。「流動」包括身體上的流徙、離散、移民、放逐，也包括思想和文化上的承續、交流、翻譯、轉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流動」的力量衝擊好幾代香港作家，迫使他們徘徊在去與留、認同與否定，在無根與歸屬間掙扎，也促使他們思考承續、交流、翻譯和轉化的可能，催生新的創造。香港文學的「流動」，基於香港作為國際轉口貿易城市的都市特質，也基於香港在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角力中的特殊位置。

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角力，促使香港作家尋索新的轉化，馬朗有感五十年代政治意識形態的二元對峙、反共、恐共氣氛使文學創作趨於保守，他創辦《文藝新潮》不純粹為了辦刊物，而是以現代主義文學作為思想重新「流動」的力量，具體做法是譯介最新的歐美文學，也回顧三四十年代的師陀、沈從文等當時已被噤聲停筆的作家，同時刊發台、港最新文學創作。香港文學的「流動」，本是她的

城市本質，而不同年代的作家，也在種種身體與觀念的「流動」中，反思時代，同時尋求新的文化創造。香港文學的「流動」，既是一種回應時代的書寫策略，也是香港得以被呈現、轉化、更新的關鍵角度。

二、根著：失根與「靈根自植」

有關「根著」的論述，最先針對著無根、失根的流離狀態，試圖尋找出路或尋求有別於簡單逃離、否定的態度。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間，旅美作家陳之藩在台北出版的《自由中國》發表〈旅美小簡〉系列散文，其中〈失根的蘭花〉比對故鄉與異鄉風景，重新肯定故土風物的記憶，最後引宋末畫家鄭思肖（鄭所南）的故事而作出「國土淪亡，根著何處」的歎喟。⁹¹一九六一年，唐君毅撰〈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以「花果飄零」形容四九年後的華人離散，一九六四年再撰〈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以「靈根自植」作為可能之出路。⁹²

陳之藩與唐君毅所指的「根」都不單針對外在實體世界，尤其二人都認清了身處異地那失根、無根的現實，因而把植根的方向轉移至內在。陳之藩與唐君毅所指的「根著」、「靈根自植」，是建基於文化意識的醒覺，而另一種參照，是人文地理學的角度，包括瑞爾夫(Edward Relph)、段義孚(Yi-fu Tuan)、Tim Cresswell、王志弘等人對「地方」(place) 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 的說法。

由此再觀香港文學的「根著」，也許必須與連繫「地方」的意義一併思考，特別是香港文學本土性的本質既是「流動」也是「根著」。香港文學中的地方風物書

⁹¹ 參考陳之藩，〈失根的蘭花〉，《旅美小簡》（台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七五），頁32-34。

⁹²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原刊《祖國周刊》第三十五卷第一期，一九六一年；〈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一文原刊《祖國周刊》第四十四卷第四期，一九六四年，二文都收入《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七五），另見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七四）。

寫不單作為一種記錄，對時代變幻敏感者而言，往往透見地方變遷在轉折中的象徵意義。「根著」的來回掙扎，包括流動帶來的疏離以至否定，既是現實使然，也是本土超越和重新造就本土價值的歷程，戰後至二千年代的香港文學，也許正在這過程中真正甦生復更生。

三、流動中的「根著」

香港文學的「根著」源自五、六十年代文化人對失根、無根的認清，相關觀念的演化某程度上也對應著時局變遷，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可說總結了一九五〇年以還的離散經驗及無根之現實，一九六四年再撰〈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則試圖超越種種無根之思，無論「失根」、「根著」或「靈根自植」所指的「根」，其源起都是針對五十年代的離散以及殖民地處境。

司馬長風〈公園裡的世界〉、西西〈港島·我愛〉等文皆以「地方」為主線，思考香港的地方特質和意義，司馬長風〈公園裡的世界〉一文原本著力描述對維多利亞公園各種優點的發現，使作者印象由負面轉為欣賞，然而全文仍結束在「六七暴動」的陰影中，暗示那新生的本土認同觀念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矛盾。

西西〈港島·我愛〉則把對香港的認同連繫到作者先父的回憶，以及與香港地方經驗結合的個人成長往事，暗示著一種新的地方認同；然而地方的急速變化，教作者難以把握住得來不易的成長，西西〈港島·我愛〉標示出複雜的地方感，既是對「根著」於個人與父親回憶的發現，也是城市如何催生「根著」也同時抹殺「根著」的發現。

八九十年代，因中國及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的連串談判、角力，整整兩三代

香港人民在移民與留港、認同與疏離的兩難處境中徘徊、掙扎，也在「根著」的矛盾中來回苦思，黃碧雲《失城》、舒巷城《倫敦的八月》、也斯《使頭髮變黑的湯》寫移民的處境，吳煦斌的〈信〉寫一個在香港從事翻譯的知識份子從移民的臨界點上掙扎，最後未有離去，關鍵是地方感所暗示的倫理承擔，顏純鈞〈紅綠燈〉則集中寫新移民的困惑、認同的困難，細寫新移民的文化衝擊來自城市本身，更以交通燈號的顏色喻示「根著」的錯亂和矛盾；以上多種描述移民或新移民處境的作品對城市的複雜感受，有點近似於西西寫於一九六八年的〈港島·我愛〉，早就意識到城市催生「根著」的同時，也抹殺著「根著」。

二千年代，由於全球化經濟的衝擊、市區重建和土地問題促使本土景觀流失，香港趨於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地方感的失落，同時也是認同和歸屬感的失落，西西〈照相館〉、馬國明〈荃灣的童年〉、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都聚焦於全球化衝擊引致王斑所提出的「有機社群解體」。⁹³西西〈照相館〉、馬國明〈荃灣的童年〉以回憶重塑已逝景觀，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思考個人與群體的互動與創造，最後思考一切創造的可能性，以上幾篇寫於九十年代末、二千年代中的作品，在呈現和批評「解體」的現實中，尋求的是流動中的根著。

四、「根著」的無力、「流動」的可能

香港成長者對「根著」的無力，其實貫串於許多文學、電影與視藝作品，它們都共同地意識到香港城市發展對於「本源」的遮蔽，甚至對於「根著」的摧折。

⁹³參考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頁 223-224。

一九五〇年舒巷城《鯉魚門的霧》講述小說主人公連串尋根、追懷過去的努力落空之後，以個人覺醒到「我是剛來的」結合霧景的消散復又結聚，反覆點染出城市對一個「歸來者」的拒絕。九十年代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亦從一個「歸來者」的角度，經過連串尋根、訪查家族史的努力，最後卻由歸來者的父親否定歷史的真確，使「根著」的追尋又歸於虛無，小說結尾時以「文本互涉」方式並置引用的廣東南音《客途秋恨》唱詞，尤其襯托出本土歷史的殘缺，作者由此暗示了一種對於無力「根著」的哀懷。

西西寫於一九八六年的《浮城誌異》以十三組故事串連全篇小說，各提出不同意象，當中，最獨特的意象是「烏草」：「那時候，浮城的天空中滿是飛翔的烏草，沒有人知道它們究竟是鳥還是草，是動物還是植物」⁹⁴，「烏草」一節呼應「奇蹟」提出的流動視角，為浮城人民認清無根之後的生存意志，賦予更具文學性的想像：也許，「沒有根而生活」不單需要勇氣，也需要對駁雜不純的身份、處境，抱持更寬敞的想像。在那人心浮躁不安、前景未明的八十年代，西西透過《浮城誌異》思索「根著」的困局，最後以喻示承續的「慧童」和喻示轉化的「窗子」，尋求對於「根著」的超越。

五、結語：根與路徑

邱貴芬在〈「在地性」的生產：從臺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一文據人類學者克力弗 (James Clifford) 對「根」(roots) 與「路徑」(route)

⁹⁴ 西西，《手卷》，頁 16。

的辯證思考，強調文化旅行的流動性，以及文化認同本身的流動，指出「根」與「路徑」看似不同取向，卻並不對立。⁹⁵香港文學本土性的弔詭和複雜之處，在於它與中國文學既相連又迥異的關係，同樣是一種「根」與「路徑」之辯證，當中的理解是以歷史意識的掌握作為關鍵。

許多年來，香港作家都把上一代既有的家國意義上的「根」，與香港地方的重新認同這二者隱約地連繫而不是互相排斥，更痛切地細寫當中的矛盾、掙扎而不是冷漠地或激昂地簡化二分；香港文學和語言的根與路徑，尤其夾雜糾纏，實難絕對分出是以根為主或以徑為主，由此突顯兩者的差距，單單強調根——國族傳統，或單單強調徑——本土意識，既徒然引起無休止的爭辯對立，亦根本不是香港文學的真象。無論根源於何處，路徑有多曲折，文化情懷與藝文腳步都總有一個立足點，一個安身立命之所。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根著」是認清溯源的險阻、路徑的迂迴；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根著我城不是擁抱自己，不是自戀或自我中心，而是認清我城的種種局限之後，仍不願足下與土地的冷暖分割。

⁹⁵參考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臺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收入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臺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二〇〇七），頁 325—366。

「福建」作為臺灣文學發展與研究的生產空間及其意涵

黃美娥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一、

回顧臺灣文學學科在臺灣的出現，著實歷經了一番艱辛的奮鬥爭取過程，特別是與中國文學系的分合、競逐問題，箇中情形在羊子喬主編《臺灣主體的建構：臺灣文學系所誕生》所收錄各界發言、論辯資料，以及本人為臺北文獻館策劃、主持的「臺灣文學學科體制化的回顧與思考」座談會中，多位臺灣文學系所創辦人的回憶說明，便可略知梗概。不過，從九〇年代學科體制化迄今，臺灣文學研究系所雖然陸續成立，但關於知識系統的建置，卻仍不斷面臨各式挑戰，包括：致力追求本土化的知識特徵，是否會流於狹隘與侷限？要如何才能快速與世界接軌，達到國際化目標？面對近期出現的「民國文學」、「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熱潮，則臺灣文學的研究對象，是否該進一步擴及「民國文學」和「華文文學」呢？

上述所論攸關著什麼是「臺灣文學」的定義，以及學科知識邊界劃分的問題。但，棘手之處不僅於此，在早先尚未確立「臺灣文學」這個具本土性、在地性或主體性意義的專屬詞彙之前，多數時刻，一旦描述島內、國內文學創作時，除了「本省文學」之外，也常使用「中華民國文學」、「中國文學」詞彙；那麼，現今又該如何去看待這種曖昧、模稜，甚或無法一刀切斷的兩造關係。⁹⁶事實上，研究

⁹⁶ 針對此一問題，筆者近期透過數位人文研究方法，並以《聯合報知識庫》大數據對此問題嘗試加以分析，參見《文学のキーワードが指し示す意味と解釈の研究——「中国文学」の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意義》，《野草》第97號（2015.12），pp.1-27。

者清楚知道，指涉稱謂的背後，自然含有發言者的思維結構與價值判斷，或是各有差異的論述內容和詮釋框架。然而，誰有資格可以全權決定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分合，並一次通盤解決其中的複雜糾葛狀態？答案會是國家統治者、教育決策者，抑或是文學研究者自身嗎？

其次，有關「臺灣文學」研究，除了要在臺灣內部再度進行思考之外，其實也該注意在臺灣外部的聲音，同時要留意這些聲音，所代表的是同質性或異質性？又或者在交錯之後，會激發出更具思考價值與挑戰辯證之處？對此，本文以下便要提出另一個耐人玩味的問題，那就是面對對岸中國許多有志於臺灣文學的研究者及其著述成果，應該如何看待？究竟會因為同樣有著對臺灣文學研究之興趣而相互親近，視為同道？或是受制於兩岸當前政治立場，遂給予批判與否定？這要從「他者」論，或可從「多中心」論，或者其他位階與視域，來評量中國的臺灣文學研究生產現象？其實，筆者之所以有此發問，是想針對「臺灣文學」此一新興學科的當下存在與未來發展，乃至學科特質的形塑，進行更縝密的思索。

特別是，考慮到當下的全球化環境，任何訊息都可經由網絡流通、跨界傳播，促使各地研究者極易進行串連、對話，乃至爭鋒相對。是故，如何將臺灣文學的研究同時置諸國內、世界或兩岸知識生產網絡之下，去思考相關研究社群互動生態，進而摸索出一個對臺灣有益的新機制，從中提升自我研究能量，應是處於全球化背景之下，當前臺灣文學研究者需加重視之所在。因為，在網絡時代中，訊息已無法被全然閉鎖，而是無孔不入；換言之，無論是臺灣在地學者、對岸學者或是世界各地學者，彼此的研究成果，都會主動或被迫地處於不斷交換、串聯、

對詰的處境中，而這正是新時代下新型態的知識生產狀態。

如果意識到這一點，身為臺灣文學研究者，自然無法再輕易將中國境內的臺灣文學研究者及其學術結果視而不見，或因意識形態相左就棄如敝屣，其實如此的論述行為可能會喪失多重辯證的機會；更何況，現在的知識傳播網絡四通八達，所面對的將可能是全球性的資訊發送與接受，想要全然阻斷、漠視資訊的對外發散、流動已屬難事。是故，處於如此狀態下，個人以為更理想的情境是，能夠予以掌握、理解，然後加以善用，並嘗試找尋可以提升自我研究的能量和路徑；亦即，不一味抱持著「他者」、「對立」的異化觀點，對中國的臺灣文學研究結果予以擱置不論，當然也不致於單純等質看待兩岸研究內涵，而更要去觀察雙邊研究心得，和對方保持一種特殊互動關係，並由此思索能夠裨益臺灣文學研究的最大可能性。

對此，以下將聚焦地理位置距離臺灣最近的「福建」，以及該地學者的臺灣文學學術知識生產狀態，進行相關現象的剖析。而之所以以福建為研究案例，乃是因為該地臺灣文學研究相較中國其他地區，由於長期經營與拓展，故已取得學術代表性地位，自然值得深究。且事實上，從晚近臺灣小三通和中國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兩岸國家政策來看，不僅閩、臺關係已經邁入一個嶄新階段，同時也的確為臺灣文學研究生態帶來許多刺激和影響，⁹⁷若能有所認知、回應，將可順勢彰顯臺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現實性」和「即時性」的學科功能，而這也是本文

⁹⁷ 關於臺灣小三通和中國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兩岸國家政策，帶來的閩南文化研究的熱潮，和對金門大學、成功大學等高等教育的學科體制設立、學術知識生產影響，拙文〈從「福建」看近代臺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曾做初步敘述，收入《臺灣文學學報》第26期（台北：政治大學台文所，2015.6），頁7-10。

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所在。此外，文中也會從研究方法論、詮釋框架與文學史等面向，指出福建相關臺灣文學研究論述可供啟發、辯證、轉化之處，以及「福建」對於臺灣文學發展與研究的空間意義，期盼有利擴大臺灣文學研究邊界，使相關研究內涵更為豐饒。

二、

在簡介了本文研究動機、問題意識之後，以下有關論文架構安排，將從三方面進行鋪陳說明：

1. 福建作為臺灣文學研究前沿角色及其知識生產特點

無論兩岸政治立場如何，由於臺灣人口約有 70 % 來自福建，故閩、臺之間，先天上相較中國其他地區，顯得關係密切；連帶地，長期以來，福建就是中國學界中最為關注臺灣研究議題的區域，其中自然包括臺灣文學。而事實上，三十餘年來，福建學者著述的長期累積和機構單位出版的琳琅滿目盛景，在在提醒吾人應該注意福建地區有關臺灣研究知識生產的量化現象及其質性意義。那麼，上述福建地區所從事的臺灣文學知識生產面貌，究竟有何特色？上述情形，本節將會加以評介。

2. 臺灣的「福建研究」和「閩/臺文學關係研究」

相對於福建學界從 80 年代以來對於臺灣文學研究的愈見留心與積極投入，臺灣在面對福建這一地理空間時，其態度又是如何？整體而言，福建對於臺灣而言，從明清移民到近十餘年來小三通通航，實際展現了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複雜空間意

涵。而回應過往歷史，臺灣對於福建地區文學與文化，其實也累積不少研究成果，但早期大多是從「福建區域研究」角度著眼，後來在時代背景和政治影響下，特別是 2000 年「小三通條款」在立法院通過之後，「閩/臺文學關係」特別受到矚目，值得詳加剖析。

3. 重思福建對於臺灣文學發展與研究的空間意涵

掌握了過去或晚近兩岸福建研究，或探討閩南文化、閩臺文學/文化研究概況和主要趨勢之後，個人在此單元中，將嘗試提出一些想法，期盼透過新的方法論、詮釋框架和文學史分析，重新審視、省思福建作為臺灣文學發展與研究的空間意涵，希望有助於臺灣文學研究邊界的擴大。又，於此所論不只會涉及臺灣文學史問題，也會進一步考察金門在閩、臺之間節點 (node) 角色的思索，究竟金門處於與臺灣、福建間，身在夾縫中的金門人如何在今昔中生存？金門文學書寫旨趣為何？在注意了福建做為臺灣文學發展與研究的生產空間之後，於此又再加入金門位居閩/臺節點的觀察，相信能更開拓臺灣文學研究的豐富內涵。⁹⁸

三、

而在透過前述各個單元的闡述之後，本文結論將會重申在現今全球化訊息流通無阻狀態下，宜重新思考臺灣文學研究隊伍的擴編問題，正視史觀對立或意識形態差異之外的可能斡旋、對話意義。故本文以「福建」為例，指出若能掌握該地區的臺灣文學研究成果、理論觀念，進而再設法予以轉換、安置到臺灣自我內

⁹⁸ 關於從閩台關係之中，討論金門節點角色和相關文學創作的意義，拙文〈從英雄島、番薯島、斷代島到文學島—金門戰地書寫、歷史想像與島嶼形象塑造〉已略加探討，戰爭與臺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臺灣史博館、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共同主辦，2015.8.15。

部的知識系統，則如此當可為臺灣文學研究帶來更具挑戰性、辯證性、啟發性的思考能量。

中國早期紀錄片《上海戰爭》與《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建構與拆解

陳建華

上海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

近年來像在其他社科人文領域的「重寫」運動一樣，在電影領域中也開展了「重寫電影史」的工作，尤其在早期電影史方面如黃德海的《戲曲電影《定軍山》的由來與演變》（《當代電影》，2008年2月，頁104-111），對「第一部中國電影」的說法提出質疑。或如黃雪蕾的《中國第一？〈難夫難妻〉與它的「經典化」》（黃愛玲主編：《中國電影溯源》，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1，頁10-31），也對「第一部中國故事片」的定論作了探討。關於《定軍山》與《難夫難妻》的「第一」的結論出自1963年出版的程季華、李少華、邢祖文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下稱《發展史》）。該書以近現代中國「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歷史分期作為敘事與批評架構，以1930年代初「左翼電影運動」為基準，對此前的「鴛鴦蝴蝶派」等國產電影作了嚴厲的批判與排斥，長期以來在中國電影史研究奉為正典書寫的圭臬。

《難夫難妻》是1913年美國人依什爾和薩弗及其亞細亞影戲公司在上海與鄭正秋、張石川合作拍攝的故事短片。《中國電影發展史》在第一章第二節中較詳細地介紹了拍攝情況，並高度評價短片《難夫難妻》「是我國攝製故事片的開端」。（頁18）除了《難夫難妻》等片，亞細亞影戲公司還拍攝了新聞片《上海戰爭》，《發展史》也給予特別關注，不僅因其作為中國紀錄片類型具開創性，更重要的

是因為它的政治意義。第一章第二節題為「反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新聞短片《武漢戰爭》和《上海戰爭》」曰：

上海在聲討袁世凱時，爆發了圍攻南市高昌廟製造局和吳淞炮臺的軍事行動。當時一些傾向革命的戲劇工作者，如著名的京劇演員夏月潤、夏月珊、潘月樵以及文明新戲的演員洪警鈴等，也都參加了這一行動。當時亞細亞影戲公司即因這些戲劇工作者的關係，拍攝了一部新聞短片《上海戰爭》，記錄了革命軍攻打製造局和吳淞炮臺的情況。影片《上海戰爭》完成後，於同年 9 月 29 日在上海新新舞臺與影片《難夫難妻》同時映出。《武漢戰爭》和《上海戰爭》的拍攝是有意義的，它們多少記錄了一些有關中國人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英勇鬥爭的史實，一定程度地鼓舞了當時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頁 27-28)

《武漢戰爭》是 1911 年由雜技幻術家朱連奎和「美利公司」洋行拍攝的記錄片，內容有關辛亥革命的實況，這在《發展史》中已論及。需關注的是在《上海戰爭》之前的一段話：「上海在聲討袁世凱時，爆發了圍攻南市高昌廟製造局和吳淞炮臺的軍事行動」，這裏明確指「二次革命」期間，而「當時一些傾向革命的戲劇工作者，如著名的京劇演員夏月潤、夏月珊、潘月樵以及文明新戲的演員洪警鈴等，也都參加了這一行動」。「這一行動」指的是圍攻製造局還是吳淞炮臺，

語帶含混。在整段表述語境裏，這幾句是為了提供歷史背景，說明「聲討袁世凱」是民心所向，且有夏月珊等著名演員參加了革命行動，就更具革命性。有這樣的鋪墊，「記錄了革命軍攻打製造局和吳淞炮臺的情況」的《上海戰爭》就名正言順地載入了電影史冊。

不去爭議地確定《定軍山》是「第一部中國電影」、《難夫難妻》是「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涉及中國電影史發生的重要問題，但是關於《上海戰爭》的論述卻與《發展史》的意識形態整體構架有關。1940年代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把 1840-1919 年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其間所有的革命都是由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領導的。1919-1949 年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指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一論斷在 1949 年之後貫穿於所有中國近現代歷史著述之中。1913 年由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屬於「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過這段關於《上海戰爭》的論述，還與《發展史》的特殊整體構架有關。書中第一編敘述 1896-1931 年「中國電影的萌芽和發展」，第二編是從 1931 年到 1949 年「黨領導了中國電影文化運動」。眾所周知，自 1920 年代初由《閻瑞生》、《海誓》和《紅粉骷髏》三部長片開始，中國電影工業發展迅速，取得豐盛成果。但是按照《電影史》的邏輯，自三十年代初「左翼」的加入中國電影才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因此從 1921 年到 1931 年的國產電影跟文學史上因「反五四逆流」而遭到批判的「鴛鴦蝴蝶派」聯繫起來，是完全被排斥的。如《發展史》所說：「所謂『鴛鴦蝴蝶派』。就其思想傾向來說，代表了封建階級和買辦勢力在文學上的要求；就其成員來看，也是封建的

遺老遺少和買辦性的洋場才子的結合。」「從 1921 年代 1931 年這一時期內，中國各影片公司拍攝了共約六百五十部故事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由鴛鴦蝴蝶派文人參加製作的，影片的內容也帶多為鴛鴦蝴蝶派文學的翻版。這一派文人和已經墮落了的文明戲導演、演員相結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盤踞了電影創作的編劇、導演、演員各個部門，佔有極為優勢的地位。」(頁 55-56) 書中對二十年代鄭正秋、張石川的明星影戲公司等敘述極為簡略，且嚴加批判。

儘管《上海戰爭》是一部早期紀錄片，但它「多少記錄了一些有關中國人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英勇鬥爭的史實，一定程度地鼓舞了當時人民群眾的革命意志。」這樣的表述對於《發展史》的總體架構具有重要政治作用。「二次革命」是反對袁世凱專制的軍事鬥爭，由於「如著名的京劇演員夏月潤、夏月珊、潘月樵以及文明新戲的演員洪警鈴等」，「都參加了這一行動」，由是「二次革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就更凸顯其政治意義。《上海戰爭》是作為體現「舊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惟一例證，與後面自 1931 年中國電影進入「新民主主義」連貫起來，形成連貫而完整的「宏大敘事」，證明毛澤東的正確論斷。

《發展史》的這些陳述不符史實。本文用歷史化方法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對這段敘事作拆解工作，以還原歷史「真相」：一是將當時《申報》所刊登的《上海戰爭》的廣告與對上海市民對「攻打製造局」的反應來說明《上海戰爭》與「二次革命」的關係。一是對夏月珊、夏月潤、潘月樵、洪警鈴等演員是否參加了 1913 年的「攻打製造局」之役一一作考察。事實上《發展史》將這些互不相關的人物串聯在一起，完全是想像的產物。

主體流動與身分認同——當代華人女作家紀錄片探析

黃儀冠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究兩岸三地對於華人女性作家的生命史與文學成就如何進行紀錄片與影視改編，針對五四話語所帶來的啟蒙民主、婚戀自由、青年革命思潮，兩岸三地如何以在地實踐，轉譯移植。受五四思潮影響的一代才女，面臨新舊文化的交替，她們勇敢地出走，以生花妙筆浮出歷史地表，彌補女性文學作家身影空白的一頁。當代影視工作者如何對於華人女性文學家傳記及傳主進行跨界想像與改編詮釋，是值得玩味的議題。五四「啟蒙」、「全盤西化」的呼聲，固然激發華人迎向新潮的勇氣，卻也埋下許多機制，窄化「現代」的多重潛力。國家民族話語籠罩下的五四現代性論述，容易導致我們在閱讀華語現代文學的方法論上產生多重圍限。「傳記電影(電視)」(包括紀錄片及劇情片)這個影視類型形構作家身影，擴及時代變遷及現代性的形塑，女性作家的傳記影像顯現其生命敘事(life narrative)及文學敘事(literary narrative)雙線的敘事結構，通過這個「軟性她者」有助我們在共時性和對話性的閱讀過程中，探索五四思潮現代性想像的其他可能。透過傳記研究的觀點以及女作家生命史的觀照與爬梳，如何被創造性的轉化為影視作品，文學、歷史與影像之間如何交響共鳴、眾聲喧嘩以開展現代性的

越界想像乃是本研究的焦點。鄭尊仁 (2003:11-12)針對當代傳記文學進行研究，他認為「傳記的重點是人，傳記作家的任務也就是如何將一個活生生的人以文字重現在讀者面前。」相對於書面傳記使用文字與圖像的靜態方式，傳記紀錄片則是以影像為傳，運用影像表現手法陳述傳主的生命故事。傳記紀錄片具有視覺影像的直觀性與感染力，連續運動的影像消弭了靜止圖像的現實距離感，更能讓觀者感受到強烈的真實感。(楊正潤 2009)。筆者以女作家紀錄片為主，旁及傳記史料，以探討現當代影視文化如何重構民國時期一代才女形象，以及當時大時代國仇家難，感時憂國與女性生命史之經緯交錯。由於女作家的傳記文本及影像資料龐大，本研究選取幾位兩岸皆關注的華人女性文學家作為個案探討，探析女性傳記書寫與影視文本的互動關係，透過文字與影像的互文性轉化，以進行較細部的文本分析及敘事策略的探析。

本文探析現代女作家傳記書寫與影視文本之間的關係，其目的在於重審女性作家生命史與傳記書寫，如何被轉化為影視文本，形構出怎樣的性別意涵及現代性的想像。紀錄片以求真實為其主要目的，然而近來紀錄片展現多元的面貌，紀錄片也要講故事也要有敘事性，⁹⁹不僅止於文獻史料或口述歷史的樸素客觀紀錄，而是引入拍攝者的觀點，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及詮釋，此時紀錄片的所謂「寫實再現」，其再現的意涵也就遊走於真實與虛構之間，而與虛構傳記電影(電視劇)形成模糊的界線。本文以女作家為分析核心，探析其女作家生命史及傳記書寫，如何改編轉譯及詮釋？傳記書寫與影像形式之間的轉譯及改編關係又為何？文學作

⁹⁹ (美) 希拉·柯倫·伯納德(Sheila Curran Bernard)著，孫紅云譯，《紀錄片也要說故事》，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

家傳記影像作為一種創作文本，如何擇取史料及傳記文本重構女作家的生活、情感世界及文學創作，在影視敘事中又如何傳達影像工作者的觀點與詮釋。

文學作家傳記紀錄片作為一種文本類型，結合傳記與紀錄片兩種特質，形構成複合式的文本，此類型以文學作家為主題，透過紀錄片的形式表述，故文學作家傳記紀錄片乃是文學作家的影像傳記，但囿限於影片長度，平均片長大約 90-150 分鐘展現傳主的一生，故電影工作者必須在文學家一生中擇取其敘事核心及內容，以展現傳主的人生精華。透過傳記研究的觀點以及女作家生命史的觀照與爬梳，如何被創造性的轉化為影視作品？以及文學、歷史與影像之間如何交響共鳴、眾聲喧嘩以開展現代性的越界想像乃是本文的焦點。本文試圖以林海音、聶華苓作為探析對象。林海音的傳記由她的女兒夏祖麗所撰述：《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楊力洲所拍攝的紀錄片《兩地》收錄於《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聶華苓於 2004 年出版自傳文集《三生三世》，後又於 2011 年以自傳體出版《三輩子》，再加上之前她以個人經歷為基礎所撰述的小說《桑青與桃紅》，不斷地重述其流離的生命史及文學事業，可與其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作為互文性參照。本文試圖探究影片如何呈現林海音、聶華苓兩位傳主富傳奇色彩的人生敘事，以及與其傳記作品相互參照，同時側寫近代兩岸在政治夾縫中的流離與抵抗，以及身份的流動。

台灣早期文學作家傳記紀錄片於 1997 年由雷驤執導策劃，春暉影業投資拍攝《作家身影系列一：五四中國》，耗時四年，介紹一系列五四時期中國知名文學家，包括魯迅、老舍、沈從文、張愛玲等十二位作家。追蹤作家一生行跡，遍訪

中國大陸、日本、新馬地區、歐美等地，尋訪其作品故事之源起之處，藉由作家的著作、自傳、回憶錄、日記、書信、手札、照片、圖像、錄影資料等等史料文獻，訪談當代文學研究者、傳記作者及作家之故舊親友等相關人士，以建構拼湊出作家的創作歷程與生活故事。(王慰慈，2006)。此後作家身影系列的相關紀錄片掀起一波製作風潮，陸續有台灣作家身影及各個文學家傳記影像的開拍，形成豐富的影音資料。另外，尚有王傳璞先生所製作的《作家錄影傳記》，他以十多年的時間(1997-2010)，拍攝齊邦媛等近 127 位台灣作家，但並未正式出版。目前所有檔案王傳璞先生捐贈並授權國家圖書館、大陸中國現代文學館，以及英國大英博物館使用。

在台灣所拍攝的紀錄片中，女作家林海音無疑是最多次被拍攝的傳主，她出現於大愛電台所製作的《人生採訪-當代作家映像》系列中，也出現於王傳璞先生的《作家錄影傳記》，同時在最近的文學家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林海音亦赫然在列。故筆者將林海音作為一個重要的個案探討，在不同的紀錄片裏如何重塑與再現林海音的文學及生命故事。在此類型裏傳記與紀錄片之間的對話，產生許多的張力，林海音的傳記文本主要選取其女夏祖麗所撰寫的：《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4年)，並旁及其他資料。紀錄片作為一種文學傳記的表現媒介，可能面臨到傳主已逝的不在場狀態(如楊力洲執導，以作家林海音為傳的《兩地》)，另一種則是記錄在場作者的生活影像與個人表述(如《三生三世》)。面對不在場的傳主，紀錄片創作者必須運用想像性移情的能力，從傳主的生平資料來塑造作者的形象，虛構創作可能的情節來解釋傳主的人生；

另一方面，面對在場的傳主，紀錄片創作者則是從傳主的真實生活與表述中來建構想像中的作家形象。(Benson,2007)事實上，影像中的作家傳主形象，來自於創作者本身對於傳主的主觀性理解，即透過電影創作者想像性移情建構而成。如何形塑一個肖真的傳主生命故事，並且傳達小說創作者的虛構想像，又如何剪裁傳記書寫中的史料，成為紀錄片工作者必須面對的挑戰。

近代中國自傳書寫自五四運動以降，受到西方思潮，以及個性解放，自由民主等風潮影響，再者胡適、梁啟超等人也極力鼓吹，自傳文體開始發展。

羅久蓉認為傳統中國自傳書寫大多是以男性敘事聲發聲，同時男性撰述女性時，將女性視為客體，並將女性置於邊緣的位置，所以文字記載成為男性視域下的女性形象，呈現男性眼中婦女的婚姻與愛情。¹⁰⁰但自五四運動以來，女性寫作呈現自我聲音，透過敘說自我的生命故事，重新詮釋自我及他者之間的關係，同時檢視自己的生命情境，旁觀其他女性的處境。五四時期女性自傳書寫以自我為核心，擴及時代變遷，並進一步描述自我如何回溯過往及掌握現在，「過去的我」與「現代的我」不斷交織對話，揉碎過往又重新形塑自我主體。此種傳主在世，並有自傳作品的女性作家，本文以聶華苓《三輩子》、《三生三世》¹⁰¹為探討核心。

聶華苓於 2004 年出版自傳小說《三生三世》，後又於 2011 年以自傳體出版《三輩子》，再加上之前她以個人經歷為基礎所撰述的小說《桑青與桃紅》，不斷地重述其流離的生命史及文學事業，可與其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作為互文

¹⁰⁰ 羅久蓉〈中國近代女性自傳書寫中的婚姻、愛情與政治〉台北：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07。

¹⁰¹ 聶華苓《三生三世》，台北：皇冠出版社，2004。《三輩子》，台北：聯經出版社 2011。

參照。影片由女導演陳安琪呈現八十多歲的傳主令人感佩而富傳奇色彩的人生敘事，同時側寫近代華人離散歷史，所造成的身份移動與主體流動。影像特別強化聶華苓與夫婿用心策劃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如何在冷戰時期為世界各國作家搭起友誼及溝通的橋梁，以文學止干戈，同時也讓兩岸文學家有第一次的接觸。此類型的探索核心在於，傳主存世，其自傳書寫以文字文本回溯整理其生平，而影音資料則由其現身說法，再加上獨立製片的形式，使得其影片內涵更為自由，無須囿於製作公司的商業考量或者某種意識形態。此節主要探析自傳書寫與獨立製片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字及影像在女作家現身的敘事聲音上有何異同不同媒介形式的表述是否影響其對自我的詮釋及風格的展演。

女性作家紀錄片是一種說故事的影像藝術，其話語所指涉的意義，以及行文方式透露出傳主「說什麼」(what)與「如何說」(how)，傳主如何「形塑自我」、「表達自我」、「展演自我」的論述方式。《兩地》從雙鄉的視角切入林海音的生命歷程，從北京城南的英子到台北城南的「林先生」，成為台灣文壇當時最重要的文學母親及推手，並且在一九六〇年代首創「純文學」的概念，紀錄片以其女兒夏祖麗的敘事聲音帶領觀眾走入林海音的「兩地」，北京的童年到台北的編輯台、生活圈。筆者將透過紀錄片《兩地》與夏祖麗所撰寫的傳記互文閱讀與參照。《三輩子》以時間順序的方式，分為三個部份「故園」、「綠島小夜曲」、「紅樓情事」，貫穿大陸、台灣、美國三個人生時期，架構八十六年的歲月。《三生三世》紀錄片引用大量傳記內容，藉由作家的著作、自傳、回憶錄、日記、書信、手稿、照片、圖像、錄影資料等等史料文獻，訪談當代文學研究者、傳記作者及作家之故舊親

友等相關人士，以建構出作家的創作歷程與生活故事。¹⁰²傳記紀錄片是導演與傳主(文學家)之間的互動與對話，在拍攝者主觀想像移情與客觀傳主人生經歷之間的流動，也在建構 / 解構之間游移交織。如薩依德 (Edward W.Said) 透過書寫《鄉關何處》以保持一個內在完整的自我，並召喚著生命底蘊的身份意識，在回憶錄展開一幅離鄉背井與終生流亡地圖，一段無法復返的過去，一個已經被遺忘的世界。¹⁰³

¹⁰² 王慰慈編《台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台北：同喜文化，2006。

¹⁰³ 薩依德著，彭淮棟譯，《鄉關何處》，台北：立緒出版社，2010，頁40-45。

邊緣 / 弱勢女性之情慾主體的影像建構

—以台灣近年幾部紀錄片為例

郭力昕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兼研發長

影像敘事可以建構身份、認同、主體性，包括邊緣女性的情慾主體。建立或彰顯邊緣女性的情慾主體，可以是通往不同邊緣或弱勢女性群體，實踐其性別政治和階級政治的一個非常重要而有力量的路徑。馬克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經常被引用的名句是「他們無法表徵自己；他們必須被人表徵」。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農民缺乏組織，復被統治者弱智化，因此無法為自己發聲，只能依靠別人代言（例如他們的雇主）。印度裔美國學者史畢娃克（Gayatri C. Spivak）針對印度女性面對西方殖民的歷史脈絡，在 35 年前的尖銳提問「底層能夠發言嗎？」也深刻探討了類似的議題。

底層 / 邊緣者的發言和自我表徵，今日並非已不成為問題；然而在影像生產工具與資訊科技激進地改變著人類溝通和價值的當前，他們的借力發聲或自我表徵，有了很多的空間與可能。過去十幾年以來的台灣，在文字、攝影到電影的不同敘事形式裡，都有許多關於底層 / 邊緣者之社會處境被書寫或自我書寫的生產，讓遊民、移工、失業者、身障人士、性工作者、底層勞工，或二戰時的日軍性奴隸（「慰安婦」）等等不同邊緣弱勢群體的聲音與身影，能夠在一個普遍崇尚中產

階級價值的社會裡，爭奪被看 / 聽見、存在價值與主體意義的一席之地。在這場論壇的發言裡，我僅就台灣近年來記錄不同群體之邊緣女性之情慾經驗的四部影片，作為以影像建構身份認同和主體意義的例子。

這四部記錄影片來自三位女性導演，分別是陳素香的《T 婆工廠》(2010) 與《彩虹芭樂》(2012)、黃惠偵的《日常對話》(2016)、與洪辰嫣的《一伴》(2018)。陳素香的兩部影片記錄同一批曾經是同志伴侶的在台菲律賓籍女性移工，追蹤她們前後八年裡的關係變化。黃惠偵從《我和我的 T 媽媽》短片發展出來的《日常對話》，記錄母親作為女同志的生活方式，也追問自己與母親之間糾纏創痛的母女關係。洪辰嫣的學生之作《一伴》，則克服了層層困難，讓三位年齡不同的女性身障者和一位「手天使」女性志工，娓娓道來她們各自對情慾和性的經驗，或匱乏。我依序略述這幾部作品的影像敘事重點，以及它們在談論被記錄者之情慾與性的話題時，建構了怎樣的底層 / 邊緣女性的主體意義。

陳素香的《T 婆工廠》與《彩虹芭樂》記錄一個要轉往中國投資、惡性倒閉在台灣工廠裡的菲律賓籍女性勞工，通過「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 的協助，要求資方償還積欠薪資的抗爭過程。根據陳素香、也是 TIWA 負責人在影片中的描述，這個抗爭過程，意外的發展成以記錄幾對菲籍女同志移工的情愛關係為重點，抗爭過程則作為敘事線和這些戀情的現實脈絡。這些情愛關係的現實脈絡是，被廠方積欠薪資的菲籍移工，面對的是一個對她們極為不利、雙重標準的台灣外勞政策。而當她們透過 TIWA 協助，自己組織起抗爭隊伍、拼命討回積欠的薪資之後，又得面對不得自行轉換雇主、只能抽籤決定她們的下一個工作地點和雇主，

讓運氣決定她們未來的工作位置、型態和條件。

在這樣的條件下，幾對菲籍女同志伴侶的命運各不相同，只有一兩對能幸運的抽到相同雇主的工作場所，多數伴侶則被拆散到不同地區，天南地北難以相聚。即使在這些不利、惡劣的工作情境下，菲籍女性移工們仍樂天知命，平時常活潑的嬉鬧歡笑，即使面對分別的難過心情，也打起精神面對無法自己掌握的明日。甚至，她們還集體的捐了一大盒錢給 TIWA，當作未來菲籍移工到台灣時的救急使用金。於是，原本在台灣社會裡沒有姓名、面目、人格特質，如機器被使用的工廠外籍移工，讓影片賦予了獨特、多樣、有血有肉、有愛有淚的生命故事。

然而，這些生命故事並沒有一個快樂的結局。《T 婆工廠》記錄 2004 年菲籍移工面對關廠的抗爭，與幾對 T 婆們的情愛關係，但影片最後已來到 2008 年，這幾對伴侶已勞燕分飛。在《彩虹芭樂》，陳素香與 TIWA 團隊到菲律賓各地訪問了六對 T 婆情侶，其中五對是追蹤《T 婆工廠》裡的紀錄對象，她們從 2009 年迄今的情境與變化。這些情侶們後來的變化相當大：有些人另交了新女友，有些人回到異性戀軌道結婚、生子，還有些人已經辭世。她們或抑制不住哭泣、或神情淡然而堅定，舉重若輕的談著傷心之事。她們內心糾結、掙扎、失落，卻又願意坦誠面對困難的生命情境與選擇。甚至，當多已分手的前情侶們因 TIWA 來訪而重聚一堂時，她們回顧彼此情愛關係時，可以開放、自持、平和地交換意見，將彼此的經驗變成公共討論。在溝通、分享、傾聽與對話中，她們理解和寬容了彼此。

這些是菲籍勞動階級的女性，和平凡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情愛故事，在艱

困的現實條件下，她們面對愛情與伴侶關係時，卻沒有太多的佔有、怨恨、計較、或自我中心。影片讓我們見證了這些 T 婆們對情愛的態度，是在難過中不忘包容，在不捨中依然捨得。她們相同的階級屬性和情境，讓彼此能產生同理心，懂得接納和寬諒。兩部影片紀錄邊緣 / 弱勢女性外籍移工的情愛關係，通過這些故事的勞動階級女性，其面貌真實而高貴。她們不但在影像再現中取得了作為人的尊嚴與主體意義，且進一步成為台灣中產社會可資反省或參照的經驗典範。

黃惠偵在《日常對話》裡，通過對母親舊情人的訪談，細膩地袒露了作為女同志的母親豐富的生活私貌和細節，與母親追求快意人生、並藉此擺脫其辛勞痛苦的過往生命記憶。這個生命記憶，包括曾被前夫暴力相向的創傷經歷，以及因而得帶著兩個年幼女兒逃離其魔爪，過著四處漂泊躲藏、以牽亡魂工作為生的日子。當導演的母親努力追求自己的救贖與愉悅時，她卻由於強烈的想要甩脫、切割過去的創痛，而似乎一併在情感上想和自己的女兒劃出界線，這讓作為女兒的導演非常難過。自己有了女兒、在情感裡得到救贖的黃惠偵導演，覺得母親與自己的創傷記憶不可能就此忘懷或切割乾淨，遂讓自己和母親一起入鏡，讓攝影機成為逼使母女能勇敢直視那些糾纏不休之創痛記憶的鬼魅，將心中之痛與愛吐訴出來，方能真正離開苦痛記憶的深淵。

黃惠偵導演經歷過這樣的童年，甚至沒有機會完成小學教育，被迫與母親做牽亡這種社會底層 / 邊緣的勞動，直至成年。她在掌握了影像紀錄的基本能力之後，一方面讓母親的女同志之性別身份認同，及堅定追求同性情慾的意志與生命情調，生動的再現於影像裡；同時，她讓作為勞動階級的自己與母親之間的愛恨

糾葛，通過攝影機的媒介，坦誠、勇敢的陳述出來，成為公共揭露。這樣公共袒露自己與家人的創痛和隱私，絕非一般商業媒介或網路裡為了營利或自戀所進行的自我剝削，而是在通過影像重建著母女關係，並建立情慾、性別、階級的主體性和自信心之際，也同時提供觀眾面對可能長期逃避著創傷記憶或問題時的勇氣。這樣的影像敘事，是自我培力，也賦予觀眾力量。

最後，洪辰嫣的碩士畢業製作《一伴》，可能是台灣第一部由身障女性現身攝影機前，談論她們的性和情慾經驗的紀錄片。導演經歷了重重困難與挫折，花了很長的時間，逐漸取得「手天使」義工團體和幾位女性受訪者的信任與同意，最後以露面或不露面的拍攝方式，取得了她們的訪談材料。影片採訪的三位身障女性，分別是 20 歲出頭的大學生「璃夢」、40 歲左右的「絲襪小姐」和 60 歲的玫玲，另外一位主要受訪者是手天使的行政義工雅雯。她們細節地訴說自己的交友、情慾或性愛經驗，描述一位身體殘障、坐著輪椅的女人，如何經驗著性生活、或無法取得這樣的生活，以及各自的愉悅、匱乏、渴望或創痛的生命處境。

她們或談笑風生，或低迴失落，但是都勇於在鏡頭前訴說自己。透過這些表述，她們共同讓觀眾進入一個有著「好手好腳」的人不太意識到、但其實人數不少的社會邊緣群體，在情慾生活上處於怎樣一種乾涸狀態的世界裡。身障女性的情慾人權，在普遍仍避談性的這個華人社會裡，被迫成為一個「不存在」、不需要的東西，使得面對它、談論它，都成了一種道德上的重擔或壓迫。《一伴》初步的打破了這種缺乏人道或人性的汙道德牢籠，讓邊緣女性發聲，讓無知的社會大眾聽見身障女性的心聲。

女性移工與本地勞動階級的同志情愛，或者身障女性的情慾需要，在紀錄片的敘事裡，不約而同的指涉著同一個重點：女性邊緣群體的社會身份認同與主體意義的建立，首先在於她們作為「人」的位置和價值，必須以各自的真實故事，作為確立這種價值和社會位置的有效進路。紀錄片的影像建構力量，在此確實取得了它強而有力的話語效果。

想象的自我/他者：民國上海電影文化中的南洋敘事

黃雪蕾

愛丁堡大學東亞系講師兼研究生部主任

南洋在中國早期電影史上佔有特別的一席之地，是 1920 至 30 年代上海電影工業的重要市場，但同時在國族主義話語主導的電影文化敘事中，它被譴責為低俗娛樂影片濫觴的源頭。南洋是「他者」與「自我」的複雜交錯：在政治與地理意義上，南洋並非自我/中國，但在文化情意結中，南洋又並非純然的他者。此一糾結之文化形象在晚清以來的文學和印刷媒體上已有充分展現，南洋在二三十年代上海電影文化中的意涵與此大背景息息相關，對南洋低俗電影趣味的譴責即植根於此情結。但在真實的文化場域中，在南洋與上海之間文化產品、人及社會話語的雙向流動之中，南洋扮演著遠為複雜的角色，它是自我與他者的雙重投射，它又模糊與動搖了自我與他者的界限，並指向一種超越單一的「中國性」之可能，使國族主義話語與世界主義文化在雜糅共處中生發出新的張力。

本文旨在探討南洋在二三十年代上海電影文化中的多維面向，除了介紹其電影市場以及在「國族電影」敘事中的他者形象，本文重點聚焦一個案，即女星楊耐梅（1904-1960）的南洋巡演（1928-1931）。楊耐梅是中國最早的電影女明星之一，1928 年自組耐梅影片公司，拍攝《奇女子》一片，影片故事改編自一女子自殺的真實新聞事件，故事中交織著女子解放、「娜拉」出走、墮落與懺悔、道德

與情欲等主題。影片攝成之後，她攜帶該片在南洋巡演，放映電影的同時還表演中外歌舞、戲曲清唱及獨幕劇等。本文將分析演出文本中的文化意涵，以揭示此一「中國」女性身體所攜帶的世界主義符碼如何在南洋被消費。而楊耐梅回滬後上海電影期刊的報道進一步複雜化了此一符碼，在 1930 年代初期主導社會的左翼文化和國族主義以及西方現代性之外，以南洋所代表的另一種世界主義成為耐人尋味的弦外之音。

Nanyang (Southeast Asia) occupied a unique position in early Chinese film history. It was widely known as the most lucrative market for the Shanghai film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made to be the major culprit for the thriving of entertainment films that were believed to be counteracting Chinese nationalist effort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Nanyang* was not “Chinese” in political terms, but *Nanyang* was not completely “the other” in cultural terms. The double ambiguity made the aforementioned nationalistic accusation possible. Bu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mage of *Nanyang* was much more complex in the actual process of exchanges of cultural products, people, and discourses between *Nanyang* and Shanghai. It was a projection of both self and other, but it also unsett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 pointing to a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ing the one-dimensional concept of Chinesenes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the image of *Nanyang* through a close look at its physical market for Shanghai films, its role as the other i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discourse, and a case study of Yang Naimei (1904-1960)’s screening/performance tour in *Nanyang* in 1928-31.

Southeast Asia (*Nanyang*) was a highly coveted market for the Shanghai film industry throughout its early decades of development. Europeans established colonies in much of this reg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lived there, mostly

working as coolies, plantation workers, and merchant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earliest Chinese-made films, including *Nanfu nanqi* and a series of short comedies produced by Zhang Shichuan and Zheng Zhengqiu in the 1910s, had already been seen in Nanyang. For the Shanghai film industry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Nanyang market was divided into five regions: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under British control, including the territories that belong to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oday), the Dutch settlements (chiefly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under American rule), Vietnam (under French authority), and Thailand. For example, between 1 March 1927 and 31 August 1928, one third of the revenues the Mingxing Film Company earned were from this market, while the whole domestic market only generated two-thirds of its revenues. Singapore was the center of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s of Shanghai films in this region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the city. Distributors there imported films from Shanghai and rented prints to exhibitors in Indonesia, Thailand and Vietnam. Shanghai film studios were eager to establish contacts with these distributors. In 1928, for instance, Mingxing appointed the manager of a Singapore-based distribution company as its representative in Southeast Asia. Meanwhile, Shanghai film companies started setting up their own distribution agencies and theatres in this region. The success of Shaw Brothers (Tianyi) and its far-flung influenc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inema in the broadly defined sinophone world is the most well-known example. These entrepreneurial efforts from Shanghai triggered a boom in film distribution businesses in Nanyang in the late 1920s. By 1928 seventeen companies had register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o distribute Chinese films to the whole region. Several leading distributors also established their own movie theaters. For example, the Nanyang Company ran two theaters in Singapore, one in Kuala Lumpur, and one in Ipoh. The Nanhai and Nanhua Companies owned one theater in Penang and one in Yangon.

This is a brief sketch of the image of Nanyang as a lucrative business for the Shanghai film industry. But in th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the late 1920s and 1930s,

Nanyang obtained an image of “backwardness.” The Shanghai film industry was swept by the genre of costume drama/martial arts film in 1926-1931. Tianyi (Shaw Brothers) was believed to be the initiator of this craze. Being extremely successful in its early experiments with this genre (especially in Nanyang), Tianyi’s business thrived and triggered the emulation from other film companies. As a result, costume dramas (with two subgenres: martial arts films/武俠片 and films about immortals and demons 神怪片) dominated the Shanghai film production. Between 1928 and 1931, nearly 250 of the 400 Shanghai-produced films fell into these genres. These genres were banned by the Nanjing government in 1931 partly as a reflec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s nation-building strategy, partly in reaction to the progressive/nationalist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this discourse, Nanyang was the prime target to blame for the market craze for “low entertainment.”

Zheng Junli provided a representative interpretation in his influential study of Chinese film history published in 1936. He stated that the Nanyang film industry (including movie theatres) was a “colonial enterprise by nature” (殖民地企業的屬性) and under control of “imperialist administration” (帝國主義行政). Moreover, over seventy percent of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merchants, coolies, and farm workers who led “a medieval style of life” attached to their homelands and ancestors, and whose worldviews were “not very progressive.” Therefore, as Zheng maintained, costume dramas’ overwhelming success in Nanyang was not only because they could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to connect with their tradition, but also because these films were not against the imperialist principle of creating obedient citizens in their colonies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之奴化教育的原則). This narrative was typical of the Marxism-flavoured nationalist discourse popular in the left-leaning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1930s Shanghai. Nanyang was perceived as a double “other” – an “other” associated

with China's "feudal" past, and another "other" suffering from western colonialism. The intriguing side of this narrative is that by including Nanyang as part of this "brief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lm" (現代中國電影史略,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it was implied that Nanyang was ultimately perceived as an imaginary self in this discourse. The author's lament about its backwardness and suffering from imperialism revealed his sense of "ownership" at least at the cultural level. What was pivotal in this narrative was the perception of a solid cultural entity of Chineseness.

However, in the actual cultural field where cultural products, people, signs and discourses were flowing between Shanghai and Nanyang, the image and the role of Nanyang were much more complex. By exami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film star Yang Naimei's tour in Nanya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female body to a Nanyang audience unsett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 in mal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suggested a challenge to the one-dimensional concept of Chineseness. Yang Naimei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female super stars on the silver screen in China. She joined Mingxing in 1923 and gradually ascended to stardom in the nascent world of film star culture in China. Unbeknownst to many, she was the first woman in Chinese film history who founded a film company. The Naimei Film Company, founded in 1928, produced its only film entitled *A Remarkable Woman* (奇女子), based on a real story about the suicide of a femme fatal type of woman that had made the headline of the day. The story presented a complex web of messages including the May Fourth motif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Nora's" leaving home, as well as the dynamics of debauchery and repentance, morality and desire. Yang played the protagonist, who was said to be Yang's friend before her suicide in real life.

Shortly after the film's premiere in Shanghai, Yang Naimei brought it to Nanyang for a screening tour and it turned out that this sojourn lasted for three years. Touring major cities and towns in Singapore, Indonesia and Malaysia, she was warmly welcomed

by local Chinese audiences. Apart from the screening of *A Remarkable Woman*, her programme included performances by herself, a male partner, and her daughter, with a variety of forms ranging from singing (songs featured in her films; Cantonese Opera), dancing (tango, Egyptian dance, naked dance...), and the Spoken Drama. This programme was quintessentially hybrid and cosmopolitan, centring on the body of the Chinese woman mediated by the modern film medium, and coded in the traditional, exotic, erotic, and progressive guises. In other words, this authentically Chinese female body provided her Nanyang diasporic Chinese audiences with anything but a monolithic and coherent “Chineseness.” This ostensibly disturbing code (for Zheng Junli and his peers), interestingly, was further consumed by a Shanghai readership of fan magazines. After her return to Shanghai in 1931, Yang Naimei was interviewed by a journalist, and an article soon appeared in *Yingxi shenghuo*, a major film magazine at the time. The news report detailed Yang’s appearance, dress, and a graphic account of her Nanyang tour with an adventurous touch. For example, an assault by a tiger in Padang was highlighted in the report. Nanyang was consumed here by the Shanghai readers not as a nationalist self/other compound, but as a hybridity of the exotic, the primitive, and the cosmopolitan imagined via their familiar body of the Chinese female star. By presenting this alternativ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to both Nanyang and Shanghai audiences, Yang Naimei and other female Chinese stars who toured Nanyang (including Zhang Zhiyun, Wang Hanlun etc.), complicated the one-dimensional Chineseness in mainstream discourse. A “frivolous” touch of cosmopolitanism resonated with many marginalised meanings in such an age of nationalist anxiety.

《軌道》的台灣想像與台灣人身份認同

陳儒修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軌道》改編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軌道礦車〉(1922)，小說設定在 1920 年代的伊豆，關於故事主人翁良平的童年往事。在八歲的時候，他對於載運土方斗的斗車有著莫名的熱愛，總想著有一天能夠推它坐它。終於讓他有機會跟著兩個小工又推又騎地把斗車推向山裡，到了終點，小工才對他說，他們不回去了，要他自己走回去。他只好沿著軌道，一路哭著回去找媽媽。這段不愉快的回憶，在他 26 歲成家立業之後，特別是在他工作勞累時，會不時浮現，他眼前浮現的一條道路，跟從前一樣，「是一條細細長長、斷斷續續的道路……」(小說的最後一句)。

這個童年成長的故事，被導演川口浩史擴大篇幅改編，故事時間從過去轉為現在，描述一個年輕的日本寡婦帶著兩個幼兒，回到她先生(台灣人)在花蓮的家，讓兩個小孩會見他們的台灣阿公。導演自述將場景的時空轉到當代台灣的原因，是因為他在日本苦於找不到小說描述的大正時期場景，經由攝影師李屏賓的介紹得知，台灣仍然有森林小火車，於是南來台灣勘景。導演陳述對台灣的印象是「一個令人莫名懷念不已美麗田園風景」的國度。然而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在導演到宜蘭林區找場景時，遇到幾位長者，他們用日語跟他交談，談的是台日之間的愛恨情結，於是他決定將影片故事的時空，都轉換到台灣。

如此的創作緣起，其實具有重大意義。原先導演來台灣取景，是因為台灣仍

然有著舊日本的事物，或者說是殖民遺留的歷史痕跡。卻由於導演碰到會說日語的長者，他們是屬於在日本殖民時期長大的那一代人，他們對日本的認同（或不認同），提供導演得以想像台灣的機緣，特別是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

身份認同是《軌道》最重要的議題，呈現在兩個日本小孩與台灣阿公的身上，他們之間不僅僅是世代（年齡）差距，也不只是族群身份的差距，他們的歷史意識還隔著日本殖民與二戰等議題。對於年紀稍大一點的哥哥小敦而言，他回到爸爸的老家之後，聽到的是台語、中文、日語混雜使用的語言，看到家裡同時擺放日本（富士山畫像）與台灣（爸爸小時候的獎狀）的事物，以及阿公對他說，日治時期有很多日本人在這個地區開採檜木，現在都不見了，這些訊息令他反身思考，於是他用日文問：「我是台灣人？日本人？」阿公當下的回答，也是用日文：「等你長大，再自己決定吧！」

另一方面，阿公則代表老一輩的台灣人，曾經在日本殖民時期受日本教育，皇民化運動時改用日本名字，當過日本兵（派去東南亞與中國地區作戰），以及在二戰結束後，無法接受日本戰敗而撤退台灣的事實。

從小說沿用過來的符號「軌道」，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片中阿公帶兩個孫子尋找軌道，就是當時用來把山裡砍伐的樹木，載運出來的斗車軌道，接著把木材送上火車，再飄洋過海到日本。台灣的檜木被大量開採而送回日本，建造了包括極具爭議性的「靖國神社」。

因此對當時想當日本人的阿公而言，軌道就是日本的象徵，讓他以為可以通往日本。而小敦也寄予軌道同樣的想像，影片快結束時，他偷聽到媽媽有意留在

台灣，就決定帶弟弟去搭斗車，期望如同阿公所說的，可以載他們回日本。然而在現實層面裡，兩個人都面臨到失落。當阿公找不到過去的軌道時，只能感嘆：

「日本怎麼變得這麼遠？」小敦的遭遇就類似小說的內容，只是更改為他跟弟弟共同面臨的困境。跟小說一樣，他們總算有機會推已經變成觀光用的斗車，在時而推斗車、時而坐斗車的過程中，他們非常享受速度的快感，大聲歡笑。等到斗車帶他們通過越來越陌生的環境時，弟弟開始想回家，於是兩個人就跟小說裡描述的情況一樣，懷著焦慮不安與傷心難過的心情，沿著軌道奔跑回家，在他們眼前，就是「一條細細長長、斷斷續續的道路」，等到終於看到媽媽時就放聲大哭。

另一方面，阿公的失落，有如日治時期的台灣國族寓言。在一場晚餐的場景中，阿公說了一段話，他夾雜使用中文、台語、日文。不同的語言，反映他對每件事情的看法：

當時日本人建造很多東西，非常好。所以我認真學日語，想當個日本人。

因為他們告訴我們，禮儀、守信，說這些比什麼東西都重要。但是，我們拼了命為他們打仗..... (中文)

為什麼？(日文)

他們沒辦法像日本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來對待我們？(台語)

想不到戰敗，他們把我們丟下一走了之。到現在已經 60 年了，為什麼連一句你們辛苦了，也說不出口。(中文)

我沒說要他們賠償，我只希望他們把我們當日本人看待。(日文)

本研究認為，當阿公使用中文時，他是以官方的語氣陳述屬於事實層面的情況。當他說台語時，那是他真正的個人心聲。等到他改用日文時，他有如失去主體意識，惶惶然地向日本提出控訴。阿公代表同一世代的台灣人，面臨身份認同的錯亂，他們混雜地使用語言，正因為他們的主體徘徊在這三種語言背後所標舉的意識形態。

在片中另外一個場景，由他的小兒子說出屬於戰後出生的下一代人的心聲。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安排小兒子說出這段對白的場景，是在小學的圍牆邊，圍牆上面畫的是一幅中華民國的官方地圖，也就是在 1949 年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宣稱仍然管轄著包括台灣省在內的三十五省的中華民國，而在他旁邊靜靜地聽他獨白的，是他的日本嫂子：

戰前還有戰爭的時候，爸爸都是被當作日本人受教育，他沒有想到戰爭一結束，爸爸就被日本人給拋棄了。妳想想看，前一天他都還以身為日本人為榮，都沒想到隔一天，就要隱瞞這一切。(中文)

小兒子所謂的「隱瞞這一切」，指的是 1945 年日本戰敗撤離台灣，國民政府入主台灣。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人不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這樣的巨變，對於阿公這種「已成為日本人」的台灣人而言，是無法接受的。也因此，他的大兒子決定留日，並且娶到日本太太，都令他再度與日本產生連結。然而也由於大

兒子去世，使得他再度面臨認同危機。阿公的悲憤，已不只是喪子之痛而已，還包括他個人身份認同的傷痛。

馬丁·路德·金博士曾經說過：「我們不是歷史的製造者，我們是被歷史所製造」。因此，由《軌道》引發的關於台灣的想像，以及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問題，具有歷史命定的因素，而在過去建構這些想像的歷史文化因素，至今仍然影響著當下的台日關係，當然也就影響著生存於台灣的所有人民，關於他們對台灣的想像，以及關於他們的身份認同問題。

國家身份的建構與解構：《花為媒》與《四季花開》的改編研究

林文淇（草稿請勿引用）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劉輝與傅葆石在《香港的中國：邵氏電影》一書的序言中指出：在邵氏電影刻意影造下，「『中國』成為一種影像的符號，不斷在邵氏影片中誇張和美化」（xi）。李翰祥的邵氏古裝片，是在邵氏電影中這個中國符號最主要的投射者。焦雄屏在《改變歷史的五年—國聯電影研究》中提到，「李翰祥在邵氏時期，充分利用大片廠的便利，精雕細琢，從佈景、道具、服裝到擺飾，都堆砌出一個金碧輝煌的幻想中國」(86-87)。李翰祥於 1963 年離開邵氏在台灣成立國聯電影公司，依舊維持同樣的電影風格。國聯電影公司由李翰祥逾 1964 年執導拍攝的第一部片，就是大型古裝片《西施》。大陸電影學者李道新在《中國電影文化史 (1905-2004)》一書中認為，「李翰祥電影在 20 世紀 50-90 年代的香港和台灣重建了一個氣韻生動、意趣盎然、魅力獨具卻又不乏悲情的古老中國的銀幕形象，為缺乏家國歸屬與身份認同的港台電影觀眾，提供了難以取代的情感宣洩與精神撫慰」（332）。國家電影中心網站中的「影人目錄」單元，由陳煒智所撰寫的李翰祥介紹中也指出，李翰祥繼承了中國民族電影的說唱曲藝演義型敘事傳統，徐悲鴻式的古典繪畫美學傳統以及左派文藝寫實精神傳統，他的電影作品透過這些「似悖似迴、相輔相成的藝術手段所呈現出的豐沛「中國感」(Chineseness)，成為 1949 年政局變動後，延續中國電影創作意識與創作正統的重要指標。」

李翰祥所拍攝的眾多古裝片中，黃梅調電影是他在香港所開創，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電影類型。李翰祥熟悉中國戲曲，他在看了永華影業所拍攝的《天先配》後，於 1958 年說服邵氏公司拍攝香港第一部黃梅調電影《貂蟬》、1959 年的《江山美人》票房大賣，掀起香港黃梅調電影的熱潮。1963 年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造成萬人空巷，更是黃梅調電影最廣為人知的代表作。李翰祥透過對於黃梅戲曲調的改編與通俗化，讓中國歷史故事或是翻拍的戲曲在銀幕上大受歡迎，也成功投射想像的中國。李翰祥曾言，黃梅調電影「該是地方色彩非常濃厚的戲。但為了地理環境的限制，我不得不把這地方擴展為『中國』的，一切風俗習慣也普及為『中國人』的」（吳迎君 82）。郝曼寧在〈李翰祥黃梅調電影敘事話語初探〉一文中論及李翰祥的黃梅調電影，直指其敘事核心「體現著濃厚的中國夢想與東方傳奇色彩」（88）。王新菊則更進一步分析李翰祥「幻想中國」的審美形態與特徵：

李翰祥的影片佈景考究，服裝華美，鏡頭運用嫺熟，故事編排巧妙，情緒節奏控制自如，影片所營造出來的中國傳統詩學和畫韻中的古典意境，都使他的電影創作注入了更多中國傳統美學和中國戲劇結構中那種「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韻味，將黃梅調與影像自然地相結合，來突出中國化元素，應該說是李翰祥黃梅調影片的一種顯著的審美形態。（12）

由此可知，李翰祥古裝片的「中國感」，是透過布景與攝影等電影風格所製造的一個意境與形象。然而，每部古裝片拍攝背景不同，故事情節不同，明星與表演方式不同，在不同地方放映面對的觀眾也不同，一部影片如何建構「中國」國家身份認同，無法就此籠統斷定。Graeme Turner 的《電影的社會實踐》指出，電影意義並非是文本自身閉鎖的系統所產生，還牽涉到影片的社會面向，是動態的過程。尤其李翰祥多部黃梅調電影是改編自中國傳統地方戲曲電影，如《梁山伯與祝英台》改編越劇同名電影，《七仙女》(1963)改編黃梅戲電影《天仙配》(1959)、《四季花開》(1968) / 《富貴花開》(1974) 改編評劇電影《花為媒》(1963)。這些戲曲電影本身也是傳統戲曲的電影改編。隨著過去上映不易的中國大陸戲曲影片化成數位檔案，不再有地域限制，可以在 YouTube 或是騰訊等網路平台上透過串流觀看，李翰祥改編的黃梅調影片經常與原戲曲片比較，甚至再與原戲曲不同的表演視頻放入同一觀看列表中，使得影片從一化為二，甚至化為多，影片的国家身份認同意義在此數位環境下，也就有了與過去僅透過膠卷片在各地戲院銀幕放映完全不同的解讀。

本文將討論李翰祥較不為人知的《四季花開》對《花為媒》改編。首先會指出《花為媒》本身就是 1949 年中國共產黨新政府成立後，參與建構新國家身份的影片。蘇詠喜在〈契合與認同：建國初期戲曲改革與國家意識形態建構〉中指出，「戲曲在中國民間有著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且生動形象、通俗易懂，是將黨的政治觀念傳達給民間的絕佳載體和傳播渠道。通過戲曲，廣大民眾被注入了現代民族國家意識，逐漸增強對共產黨執政、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

的認同」(12)。共產黨政府針對傳統戲曲的劇作與演員的舊意識形態透過各種「學習班」與「講習所」的實施加以改造，也大力推動改編來加入新意識形態，「通過戲曲演出影響民眾，達到人民群眾對新國家普遍認同的目的」(13)。《花為媒》的戲曲版本，由成兆才在民國初年自《聊齋》小說故事〈寄生〉改編而來。評劇雖列為中國五大劇種，但乃是由河北農村的「對口蓮花落」發展而來，內容相較京劇與崑曲低俗許多。《花為媒》在 1960 年經過中國評劇院請陳懷平與呂子英進行了重大的整理改編，除刪除低俗的內容外，也增修唱詞，大幅提高劇本文學性。對於劇情最主要的改動，是刪除二女事一夫的舊時代陋習，改為新中國社會提倡的二位女子主動追求自己所愛的故事。本劇於 1963 年由吳祖光编写电影版剧本，請來方荧执导电影版，女主角以演出本劇聞名的評劇名伶新鳳霞擔任，他也配合改進表演方式。影片推出後受到極大的歡迎與讚賞，使得《花為媒》電影版成為本劇最普為人知的版本。

李翰祥的《四季花開》改編《花為媒》，找來甄珍、蔣光超、胡錦、江彬、岳陽、夏台鳳等電影明星擔綱。李翰祥的改編，實際上幾乎是照本翻拍《花為媒》電影版。片中甄珍與夏台鳳等主配角幾乎均為幕後代唱，除了增加幾段唱詞外，本片的音樂部份（唱詞與唱腔）與《花為媒》均雷同。影片最大的修改是將原片的戲曲電影風格，改為大眾喜劇電影形式。然而，本片卻在上映前，遭人檢舉以致禁演。李翰祥在《銀海千秋》中針對被禁演一事抱怨不已：

可惜《四季花開》拍完之後，有人向台灣政府寫黑信，打小

報告，說《四季花開》是抄襲匪片《花為媒》的，所以一直不通過，雖然我找了很多資料，證明《花為媒》早在解放前就經常在舞台上演出，芙蓉花、李小露、白玉霜、喜彩蓮都演過，而且在台灣也演出過，可是儘管你說出大天來，他說不准就不准。

為了使影片得以上映，據聞李翰祥將片中音樂改為黃梅調，並更名為《富貴花開》，才得以於 1974 年在台灣上映。目前在台灣、香港與北京三地的電影資料館並無館藏，應已佚失，因此無法得知影片修改的幅度，以及改為黃梅調後的音樂表現如何。只是《四季花開》從劇情以及唱詞唱腔上來看，雖然與《花為媒》雷同，也有李翰祥華麗的中國味布景，然而，影片的喜劇化風格，以及甄珍以帶著撒嬌表情與肢體動作的「驕女」形象的表演，完全改變《花為媒》原來新鳳霞展現時代獨立新女性的樣貌。《花為媒》電影版的拍攝，強調傳統戲曲的藝術，著重保留評劇表演特色，是一部傳達新中國意識形態的國家戲曲代表。李翰祥的《四季花開》則將在保留同樣的情節，同樣的唱詞與唱腔下，巧妙將影片改為一齣以娛樂觀眾為主的喜劇商業電影。片中李翰祥還穿插具有高度現代感的蒙太奇電影剪接手法，讓《四季花開》脫離原來《花為媒》的傳統戲曲領域，成為具有全新電影風格的影片，凸顯台灣與大陸的差異，等於解構了《花為媒》的國家身份建構。